



2012年第2期（总第29期）

亭语

4月17日，抵吴城镇，登望湖亭，温苏轼诗《南康望湖亭》：“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感慨系之，素描如下：

舟抵吴城驿，回望鄱阳湖。

一片不规则的狭长的湖面，延伸天际，仿佛拖着尾巴的长云；几缕不分明的张扬的片帆，疾驶湖面，仿佛带着乡思的孤雁；一座不明净的隐约的孤山，穿透暮霭，仿佛挟着肃杀的寒气。沙洲的藜蒿、湖盆的烟霭和苍然的暮色，渲染出长湖的萧瑟、片帆的萧疏和路人的萧然。

草坪片片凋伤，绿洲稀稀疏疏的；绿叶片片凋落，树木稀稀疏疏的；原野片片凋敝，庄稼稀稀疏疏的。秋风凋零了山川、凋零了草木、凋零了流人。

接二连三的政治迫害，熄灭不了生命的火种、冷却不了志士的热血、涂抹不了许国的理想，那生命的灰烬里依然埋藏着不熄的火种。空有报国之志、徒有治国之术、虚有政治主张，康时、匡时、治世都不能实现，遑论他时？恐怕到老都不能实现功成身退的愿望了。

岷山、峨眉山的烟云被夕阳的余晖瞬息点燃，那一缕火焰、那一抹秀色、那一片天空、那一片土地，有我影子般的想像、记忆、思念、足迹……万里之外的故乡，还能归去吗？

蘇軾

2012年第2期（总第29期）

研究 SUSHI YANJIU



目 录

-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 主 编：张志烈
- 执行主编：李 酣
- 副 主 编：宋明刚 方永江
-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08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h.cn>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2 年 6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特 稿

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

——在眉山文化讲堂的演讲 张 炜/4

□苏学论坛

“风水相遭”说

——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王启鹏/11

漫说苏东坡惠民的“空手道” 涂普生/18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雷州苏轼符号诠释 刘清泉/21

“乌台诗案”剖视 郑秉谦/25

探索湖州风暴与儋耳海啸的远因原由 江澄格/30

苏轼由黄州至高安的行迹考 吴 健/39

一点灵犀必暗通

——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黄学义/41

亭亭欲立东坡魂

——苏东坡与中国亭文化续篇（三） 吴继路/48

□顾问：李 静 宋朝华 王影聪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王水照 刘乃昌
刘尚荣 苏 灿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希龙 王普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刘清泉 孙开中
李 酣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何家治 周成仕
周裕锴 祝 云 涂普生
熊 英 蔡心华

苏轼寓言今译

林冠群/53

□研究史话

苏轼涉梦诗词探析(下)

刘丽姣/59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七) 池泽兹子/75

□诗文鉴赏

读《东坡志林》(二)

徐 康/64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十)

——王安石的新法

雷金贵/78

□新书序评

天砾斯人——《张志烈文录》序 张天健/67

《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出版弁言 杨胜宽/70

□苏学动态

会长一行应邀访问诸城 超然台/80

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

研究学术会议在广东湛江举行 流 水/80

□苏学专家

敢立潮头亲浪花

——赖正和先生苏学研究述评 孙开中/72

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 ——在眉山文化讲堂的演讲

张 炜

编者按: 2011年12月26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张炜在眉山即兴演讲《数字时代与东坡文化》,《眉山日报》记者刘寅将录音整理成文字之后,经作者审阅、修改,并将题目改为《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现在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我们对于传统文明的敬畏心,随着数字时代和商业时代的来临,也许会慢慢变得淡薄起来。我们平时对一些事物、对文化问题的理解,也很容易表面化,往往只是敷衍和迁就一下,没有什么认真态度,更谈不上求证心。但是这样天长日久,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话题从这儿开始,就找一个切近的例子来谈。

—

昨天是圣诞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涌来了一大帮戴小红帽的人。这是圣人诞生的一天,在西方就如同我们的春节那样的大节。但是与春节不同,那是一个单纯的节令,迎接春天,庆祝大自然的轮换交替:离绿色和鲜花不远了。但圣诞节是一个具有宗教含义的节令。

大家会感觉到,我们这里一年比一年更喜欢过圣诞节了,从个人的观察看起码是这样。这个西方节日是那样被我们所接受,而且心悦诚服。有一个外国人看了这些很是不解,他发现中国这些热衷于过圣诞节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基督徒,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为什么要一腔热情地过这个节日?

显然只是图个热闹,赶个时髦,只把它作一个娱乐的符号使用。但是我们心里仍然要明白,这个节日是源于宗教的虔诚,是基督徒的一个节日。因为西方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也就成了全国的节日。

我们这里如果真的要过“圣诞节”,严格来讲只能是孔子诞生的那一天。孔子哪一天诞生?没有几个人能够回答出来,因为孔子可不是什么新潮人物。我们压根就没有自己的圣诞节,孔子尽管早已

是广泛认同的“圣人”,但我们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宗教人物去顶礼膜拜。他是人,不是神。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商业主义的盛行,我们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往往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下来,这个过程相当迅速。这就带来了一连串正面和负面的东西——特别是负面的东西。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渐渐疏远,不加分析地丢弃。比如说即便在孔孟之乡,诞生孔孟的地方,也没有多少人了解儒家学说。有多少人对这两个充满魅力的文化巨人,对他们一生的事迹有一些了解?没有多少。不光不了解,还莫名地排斥;不光排斥,心里面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感——为自己这片土地上所诞生的伟大人物而感到自卑,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人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片寸草不生的土地一样,那么荒凉贫瘠。他们为自己的这片文化土壤感到自卑以至于厌烦,甚至是恐惧。

如果这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现象倒也罢了,但是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是我们这个时期、这片广大土地上蔓延开来的一个共通现象:对中华文化的不自信,对传统的厌烦。由此产生的那种疏远,从心里产生的情感上的剥离和分离,就一个族群的生存来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谈到孔孟,大家很容易会联想到眉山,想到这片土地之于苏东坡而言又是如何。因为没有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的人,对苏东坡及三苏文化就没有多少发言权,还是当地人更懂。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很难具体地谈论苏东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苏东坡对于眉山这片土地是无比重要的。何止是对于眉山,对于中国和世界也是如此。

如果是一个热爱中华经典并深入其中的人,就会知道那些像星光一样闪烁的文化人物,为何会受到人们永远的景仰。我们常常讲的伟大文学和文化人物,就一定要谈到“屈李杜苏”(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这四个文化巨人在文学史上是公认

的千古不朽。他们的文字刻下了人类所能够抵达的精神高度、无穷的想象力、完美至境的追求心，他们的心灵世界是那么广阔、遥远，那么不可企及。

苏东坡作为一个生命的饱满度，他的丰富性，斑驳灿烂的文字所展现出来的个性魅力，比如说丰沛的诗意、幽默感、趣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进入了苏东坡的世界，我们会感受到人性所拥有的全部完美；我们对于文学的信念，可以变得更为坚毅，各种可能性都在我们眼前展示开来。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开阔地展开自己的生命，可以在天地之间自由呈现瑰丽的想象、倾吐无尽的激情。这个人对置身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既激越不安，又顽强坚毅，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苦难、折磨和颠簸，用幽默，用诗心，用我们的文明所给予的全部能量去加以抵御。

当代人在数字时代里接受的各种刺激是空前的。在这个时代，人类经历了那么多的内心折磨，并常常因为不堪忍受的损伤而痛苦、忧愤和焦虑，日夜不安。无论是富裕或贫困，都有惶惑、不平和哀怨。许多时候我们是无力承受这些现代痛苦的。但如果是一个稍稍熟悉苏东坡的人，了解一点他的人生经历，就会觉得我们时下的这些煎熬还不算什么，我们个人的顽强性和忍耐力还远远不够。是的，作为一个生命的坚韧，比起这位古代大师，我们真是十分惭愧，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简直是不堪一击，有些渺小孱弱。

为什么要阅读大师？就是为了有个对比，有个学习的参照，从而有个觉悟。这有助于理解我们当代的、当下的个人生活，用以抵抗当前的苦痛，解决当下的精神问题。

苏东坡一生可谓充满了跌宕。在现代文化人中，大概还很少有谁经历过苏东坡那样的荣华富贵、志得意满和苦难折磨。他年纪轻轻就进入朝廷，且不是一般的文人，而是从起步之初就踏入中国最高权力阶层、接近权力核心的人物。但就是这样的人，后来蒙受冤狱，差点被杀掉。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贬官、流放，南北迁徙，做了卑微的小官。他即便到了当年那个瘟疫流行的不毛之地，流放即等于死亡的海南岛，也是一个快乐的创造者。哪怕就在遭贬的路上，也能有所作为，留下很好的口碑。

就是这么一个勤于行动、永不自满、宽容乐观、

充满好奇心的人物，活到六十五岁——因为在路上吃东西染病去世。这在当年比平均寿命还是要高出许多，仍然算是一个长寿的人。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讲他如何与命运抗争，具备了怎样的胸怀和境界，怎样对待人生的大起大落，对待精神及物质各个方面的伤害，如何应对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苏东坡是历代文人钦慕不已的人物。大概还没有一个文学人士、文化人士敢于傲视苏东坡。前不久有一个文化狂人，嘴巴很大，一开口就几乎贬低了所有的古代和现代文化人物，但说到苏东坡，他还是表示了自愧不如。

苏东坡之于眉山，其意义已经无法估量。他对于这片土地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具体一点说，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意味着什么，都需要从头好好思索和省悟。他好比一个无穷的宝藏，可以经过无数人的挖掘而难以罄尽。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颗文化和文学的金星，一个文明的永恒的标志。

强烈的西风吹拂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长期处于弱势，身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等待更新和自强的族群之中，有时难免会有一种难以言说、不便言说的自卑感。在这种心理之下，对于强势文化是没有冷静心和鉴别力的，更谈不到抵抗力。我们今天的确就处于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之中。所以而今谈论苏东坡，实际上在谈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和分析的当下文化环境。

如果文化环境出了问题，方方面面都会出问题——特别是自然环境，必将发生一场巨变，变得让我们始料不及。本来任何一种文化的孕育，都源自于山川大地，可是当另一种文化强势进入时，母体也必定遭受摧折。

说到底我们的文化在山川大地孕育的过程中，已经与之不可分离，融为了一体。现在我们硬是要抛弃自己的文化，要更换一种异质的文化，创建另一种文化环境，那就必定有一次痛苦的撕裂。这撕裂的过程，除了自身的巨痛，再就是必要把我们的自然环境——这片山川大地搞得一片紊乱，最后是遍地疮痍。我们为了那个不可指望的“新世界”，一定会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毫无顾惜。这是一个必然的狼藉的结局。

在疯狂的破坏之中，对自己的文化是不需要分析和了解的，只会轻率地漠视和丢弃。对于养育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大地母亲，一定表现出相当的冷

酷和粗鲁。异质文化并非这片土地所生，也就谈不上血缘的深爱，二者之间从来没有那种关系。

我们的大地母亲遭到了漠视和敌视，我们自身就变成了冷血的儿女。

的确，今天人人痛心被破坏的大地自然，可是空余叹息，谁也束手无策。因为这源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一种笼罩的力量。由此，我们不得不从文化上追寻原因了，于是不得不承认，这种破坏首先是从文化的毁坏上开始的：文化环境遭到了践踏之后，自然环境也就不能保全。

今天强势国家的消费文化、商业主义物质主义是十分盛大的，这个不必讳言。强势国家的自然保护主义、宗教和神性主义在它的内部起到平衡和制约作用，一时还不至于溃烂。可是我们不问青红皂白接受下来的，恰恰只是前者。东方的闭塞和贫穷引起的自卑无力，使自己更容易陷入盲目的物质崇拜。而这种崇拜在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原本就是存在的，并非全部舶来。

盲目地过圣诞节只是一个现象，它说明我们是如何地对待强势文化的。这个节日所包含的美好的东西，比如宗教信仰的内质，我们既不想了解也不想依从。这就十分糟糕了。

从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让我们看得更清——在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中国的传统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层面全面消退。说到节令，比如中国最大的节令春节，上上下下都要做春节晚会——这也是一个展示精神内容的窗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晚会上没有一群光膀子的女人，这个年是过不去的。一定要有女人袒胸露臂在那里嚎唱，有花男绿女的伴唱，有喷出的火焰和烟雾，有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人乱扭。几乎没有一个舞台是简朴的，没有一个舞台不是千奇百怪的。

这都来自肤浅的模仿。即东施效颦。

二

商业的强势不等于文化的强势，但是很不幸，文化的强势总是和商业的强势分不开，它们就是这样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说到晚会的那些表现，也不可仅仅视为娱乐小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女子是收敛的，内向的，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光膀子作为男子汉的形象也不能算雅。从出土的一些壁画和雕塑可见，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糜烂的腐败的宫廷舞会中，也没有太多光膀子女人。可现在，哪怕是偏远的一个小城，只要有舞台，就一定有那

样的一套。这跟我们的传统风习离得太远。这表明了一个时代的放肆与泼辣，以及伦理秩序的紊乱和颓丧，绝不是一个吉兆。

对于外部的世界而言，我们不能输出自己的文化，不能输出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输出一些靠极其低廉的密集型的劳动生产的手工艺品，比如低档服装和玩具之类。输出这样一些非常低端的科技含量很低的东西，双手捧回来的又是什么？除了对方的高科技产品，再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

当年一位欧洲的强势人物，谈到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涌来的出口产品的恐惧，只是笑笑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输出的都是一些物质产品，而且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没有输出文化和思想，所以并不值得害怕，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那个人说这话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可是直到今天还是使人警醒。因为一切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们中国至今仍然不是一个文化和思想的出口大国。我们在商贸方面可能是输出顺差，但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输出却十分惨淡。我们从圣诞节的小红帽讲到春晚的光膀子女人，然后就该谈谈文学了。

随便翻开一本杂志，打开一本书，看看作者能够用中国语言来叙述和表达的有多少。写诗的，尽是那种西方翻译过来的气味，写小说的，大致是西化句式、结构方式。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表达力和呈现力。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到今天，从胡适那帮人就开始探索的中国现代汉语，至今还在痛苦的摸索之中、挣扎之中。很可惜，它不仅离成熟十二分遥远，很可能已经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因为我们至今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白话文吸纳了西方拼音文字的特质，但它的演进还是不能离开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胡适到现在，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语言演进方向基本上是朝向西方、背离传统的。我们原有的古文写作废掉了，这很自然，可能今天很少有人还愿意回到“之乎者也”那个时代里去。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白话文运动可以一头栽到西方那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前进路径没有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冷静的不同于现状的选择。

语言的丧失，是最大的丧失。

到今天为止，我们自己的表述方式依然没有形成，更没有成熟。今天的书面语几乎是全盘西化，而思想与语言相表里，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不加

速西化。这个趋向是令人忧虑的。

前不久到南方的一个地方去，在一个游乐点，一眼看去所有的建筑都是搬来的西洋式样。一群被拉到这里来的幼儿园小孩子，老师们带着他们拍照，摄影师刚喊出一二三，这群孩子就一齐伸出小小的食指和中指，比划那个英文字母，然后大喊一声“耶——”

一旁的游客都发出兴奋的“啧啧”声。可见这种事情看多了，不但见怪不怪，而且还会觉得好玩。但仔细想想，从这么小的孩子开始，老师们已经在搞西化文化灌输。这些词汇和动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孩子们不可能理解。一切都要由盲从和无知的大人负责。如果这样下去，他们哪里还会读得懂“屈李杜苏”，再过多少年，提到苏东坡三个字，会觉得简直比外国古人还要遥远。

今天这种无所不在的浮躁心和崇洋心，完全阻隔了通向美好传统的回返之路，与古人对话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有人会觉得苏东坡的华美辞章如同嚼蜡，压根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不能跨越那一点点文字障碍，更不要说进入他的心灵世界了。现在出版的苏东坡全集让人喜欢得不得了，印得也特别漂亮，可惜大半只是架上装饰。不过即便这样也好。大概眉山人都该在家里放一套这样的全集吧。

如果能够循着古代经典所指示的文化路标走下去，那我们的社会气质就会完全不同。现在随便到一个地方，大街上的人是怎样一副面孔，很难让人感受文化传承和滋养所带来的自信和从容，而是野疵疵的，急切切的，慌里慌张的。大街上行走的人，大致都是一些物质的追逐者。这样的群体当然难以产生意志顽强、心气高远、非常笃定的人物。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会因为一个人物而自豪，比如眉山，有了苏东坡就有了文化的底气，就永远不会自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理直气壮。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因为这仍然需要建立在深刻的认识上，需要拥有对杰出人物的爱与知。有人问起对眉山的印象，那么我们首先可以说这里有这么好的一片湖、一条江，沿湖有这么好的环境，其他声名显赫的大城市要找类似的地方都非常难——可是本应无所不在的苏东坡在哪里？他已经化在人们心里、化在这片美丽的山水之间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一切该有多么好。

我们去过一些大城市，常常是满怀希望而去，大失所望而归。这除了因为那些地方格外拥挤，还

有蓬头垢面。再想一下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现要找到像我们的大城市这样脏的，还真的比较困难。那里绿色是绿色，墙壁是墙壁，屋顶是屋顶，干净清爽。可是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有绿也要蒙上一层灰尘，墙壁总要挂一片污浊，好像随时都需要大量的肥皂和水去清洗才行，这太让人沮丧了。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说起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追问管理者，追问其他，但最后还要归结到我们的文化上去。价值体系变了，对于文明的那种敬畏心已经没有了，野蛮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普及。也许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太苍老，它没有了生长和更新的能力，最好的部分奄奄一息，最腐败丑陋的部分就茂盛地生长起来，最后这种文明也就走到了崩溃的地步。

所以我们也就不再惊讶于这种极度的紊乱。我们已经不知道珍惜什么保护什么，不能正常地判断我们的生活，所以只能四处拼凑思想，拼凑文明，学一点印度，学一点日本，学一点欧洲，学一点俄国，最后主要还是学习北美。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榜样？不知道。

挂在嘴边的回答是：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吸取，都要为我所用。可是我们总还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之根基，失去了这个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了传统的根基，一定会走到六神无主的可怜地步。

接下来就是实用主义，是机会主义，是文化上的近视眼。传统文化中的劣根部分，我们却一点都不会丢弃，而西方文化中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就会被我们当成最宝贵的东西接受下来。这将演化为一场民族的悲剧。

从城市建设再到自然环境，到文学到人性，无不因为失去了文化根基而变得一片狼藉。

正因为文化传承的核心部分可能是文学，所以自然而然地还是要剖析这个标本。今天的写作人有一个惶恐，就是电脑上涌来的信息太多，我们几乎无法独自思索和判断。小说已经没法讲述一个崭新的故事，因为网络及整个传媒系统每天都会送来大量的故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耸人听闻的程度上，小说家似乎都不占上风。

生活中发生的那些千奇百怪的东西，远远超越了当代人的虚构和想象能力。当所有的光怪陆离一齐涌来，小说家的虚构优势也就被剥夺了。从故事上讲如此，从语言上讲是如此：数字上滚动的各种

言说方式，已经惊人地趋于一致化，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语调和词汇，大致都被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筛子细细地筛过了一遍。如果有人想做一个惊人之举，即在个人的著作里运用自己的语调讲话，那将非常之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每天都在接受这种平均化的表达，都在使用同一种腔调和同一些语汇，个人性已经全部退出，再也没法恢复。

在数字化的时代，要真正回到个人的语言环境，这似乎是极难的。因为这种语言的平均化，是和所谓的全球化一起到来的，是全球商业资本主义浪潮下的产物。这种平均化大致也是现代商业主义游戏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创作者没法讲故事，也没法运用个人语言，更有甚者是没法产生个人的情感——爱和恨的依据大多也要来自纵横交织的媒体。这种情感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产生情感的那个源头不是来自个人的现实经历和体验，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细部，而是来自虚拟的生活。这些经过别人加工选择过的事物，就这样一股脑儿堆积到了面前。我们的判断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不是很危险吗？

当大量的信息像沙尘暴一样涌来的时候，每个个体都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它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遭遇。它们没法让我们有从容的时间和空间做出反应，因为一波接一波的信息蜂拥而至，毁掉和淹没了我们。

三

我们今天的人比起过去，实在是变得比较冷漠了。数字时代是冷冰冰的，这首先从人际关系开始。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开会，遇到多年不见的朋友自然会兴奋，因为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不容易，见面以后心头发热，很有一些话要说，还要相互询问一番。过去都是这样的，朋友相见总有无数的话要说，离开时还要依依不舍。这都是很自然的。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十几年没有见面的人，见了面竟然只是一阵敷衍，变得不愿意交流。住在同一个宾馆里，几乎没有串门的热情，都关着门看电视或自己玩。偶有交谈，也绝不往深里谈，绝不交心。到了分别的时候——这一别又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相见，可奇怪的是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各自走掉了。这不是礼节不周的问题，也不是情感不睦的问题，而是数字时代形成的崭新的人际关系。

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看来我们人类真是变得陌生了，变成了这样一种动物：情感稀薄，

或者说即便还有一些情感，但不再轻易地袒露了；为了安全或其他，已经变得冷漠和麻木。如果有谁正常一些，见了人依旧热情、真实和诚恳，就会被视为乡下老赶，还会遇到说不清的麻烦。

有一个朋友看到自己的孩子总是很热情地跟别的孩子一起玩，马上感到有些隐隐地不安。最后他不得不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对人那么好。孩子问为什么？他说你对人太好，会有麻烦的。孩子问为什么会有麻烦？他叹气，苦于没法跟孩子解释。这个细节让人听了心里难过。这就是我们现代人际关系的走向，是尴尬而可怕的现实。人人需要戒备，需要提防，需要时刻保护自己。

可是我们既然热衷于模仿西方，那么在比较文明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呢？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在那里，陌生人见了面都会点头微笑。那么让我们模仿一下试一试？在我们这里照此办理，大多数人会觉得你脑子有病，或者有不良的图谋。

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诗书之国，走到今天真够悲哀的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定含有什么极坏的东西，它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滋生茂长起来，以至于走入了今天的颓丧和绝望。只要睁开眼看看人际关系，弱肉强食的市相，就会有一种彻骨的悲凉。我们从公认的礼仪之邦变成了这样的境地，必须有几代人接力般地毁坏才能办到。我们的确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毁坏文明的施工，不幸的是这个工程到了今天，可能已经接近完工了。

许多人谈到时下思想与文化的悲哀，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坚持的勇气和力量，没有了那样伟大的忍耐者与创造者。这个说法有点武断和过于悲观。因为这样的人物是在磨难中成长起来的，并且需要时间去检验和鉴别。我们没有经历漫长的时间，就不会拥有这个判断力。我们没有能力去认识他接近他。同时这种鉴别也需要一个很高的文明指标，只有人的认识力与宽广的心胸相匹配的时候，才有可能与同时代的天才同行。不要说我们，就连当年的梵高，那么一个西方的艺术大师，当年也要贫穷潦倒，走到了自杀的地步。他在世的时候，很多平庸的画家以画致富，名声大得不得了，可是梵高到死几乎连一幅画都没有卖掉。这是西方文明的尴尬一页。

我们今天也同样可能误解了文化和思想的巨人，只让他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生长，直到被数字的沙尘暴淹没的一天。而我们每天都在颂扬的某

些专业里的人和事，很可能只是一些把底层智慧运用得娴熟、紧紧跟随时代浊流的那一类庸人。

另一方面，现在也确是一个不利于产生文化巨人的时期。有人说今天的精神环境何等宽松，可以读到大量国内外的各类文字，表达的忌讳减少了，个人空间也增大了，所以不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各种文化人物，是大大地不应该、大大地对不起时代的。先不说这种环境存在与否，即便真的如此，思想与艺术之域的事情也不会那样简单。人的生存和养鸡仍然不同：鸡只要吃了好的食物，大概用不了一两天就会下更多的蛋。但思想与艺术的产生却不会这么快捷。心灵的酝酿和成长是一个极其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它需要个人生命中的艰难归纳、总结和沉淀。

这个漫长的过程也许要几十年，也许会更长。

以前说国家不幸诗人幸，即动荡的时代会刺痛心灵，使人的表达变得锐利深刻——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讲文化与艺术的产生规律。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大批专业的思想与艺术家是近代才有的。古代的苏东坡李白屈原杜甫他们，写作不是换钱来用，而是在生活中经历了欣悦和痛苦，在心里聚积和沉淀之后不得不倾吐出来。所以这样的文字才自然天成，才具有感人的力量，成为千古不朽的诗章。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表达当成一种专业。

就此看来，对于专业化的过分认同，会对我们的思想与艺术造成损害，这种损害是隐性的，也是巨大的。那些最好的写作总是依赖感动的，有了大感动就倾诉不停，甚至写个通宵；没有写作欲望的时候，很可能一个月都写不出一个字。

有些专业人士让人羡慕，人们看到这些人士每天可以在一个地方写作，从容不迫的样子。岂不知这种专业属性对人的伤害。每天坐在那个地方感动，到了吃饭的时候再让感动暂停……而我们明白，源于心灵的冲动不是这样发生的，它是莫测的，从不按时而至的。

四

单纯讲西方文学的引进，现在和过去也大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会多么审慎地选择，引进之前先要把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吃透，了解哪一些是经典作家，具有何种地位和文化意义。即便是翻译那些当代作品，也要掌握大量信息，做一个综合的评估和判断。决定翻译哪一本书之后，还要找一个性情与

专业水准适合的人去做，所以翻译的作品就可靠。今天就大不一样了，世界上大概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翻译队伍比这里更庞大更芜杂，也更加商业化。

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汇成的巨大河流，涌向哪里都是一场涤荡。我们制造了数字时代最大垃圾，也搬来了世界上最多的垃圾。几乎国际上稍微畅销一点的书都被译过来了，目的只为赚钱，而且出版物上总要标明这本书曾经卖了多少，得了什么奖等等。他们的目标简单而明确，只有一字：卖。

畅销与得奖当然不是坏事，那是来自他人的鼓励和欣赏，写作人士应该感谢。但是这些不可能成为标准，而只能是部分人在一段时间里达成的共识或妥协。

任何一个奖项都会是一个纺锤状的：两头尖，中间粗，即极其杰出和极其糟糕的都会比较少。歌德和托尔斯泰没有得过大奖，鲁迅也没有。思想和艺术这一类，一时获得多少读者，印出多少册，有多少人喝彩，不该是什么重要指标。

在现代商业时代，出版者的操作似乎无可指责，这只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的；在更高的道德准则那儿，这种操作是经不起推敲的。

真正深爱艺术、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的一生只能是一场剧烈的燃烧。那就燃烧下去吧！不要相信写得越少越好，那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神话。勤奋更是才华的组成部分，一个激越不安的灵魂，其天才的敏感与深入的追究力会让其一生不得安歇。

他们真的是比较特殊的生命。

一个生命有这样的表达机会，也是一种幸运。这些人天生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世俗目标而存在的。他认识了最高的志向和使命，也不为现在或未来的荣耀——而这一切，都与商业主义格格不入。

一个真正从事心灵之业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善良，也更加宽容。他的勇气深深地潜入了心底，而不是丢失。一个杰出的作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他一定会比昨天更好，总之，他的生命不是沉沦，而是提升。

对于诗性的追求，那种深爱，有时真的好像没有什么来由，它非常神秘地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目标遥远而又单纯，他所要做的，只是用一生去表达这无法言说的一切。名与利的诱惑也会侵蚀他，但不同的是他最终会战胜这些诱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思想者。

始终不能摆脱世俗利益的诱惑，陷得越来越深

并沉迷其中，最后的一点诗意也会被淹没。所以对所有人来说，这种挣扎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修课。没有办法，这也许是非要发生不可的事情。

一些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没有来由地爱上了文学，专注于精神生活，并没有多少功利心。后来慢慢有了影响，这才发现所做的一切原来跟名利和事功连在一起，这就有了另一种冲动和痛苦。只是他一直走下去，会有所觉悟，发现自己对文学所付出的劳动，那种痛苦和喜悦，与获得的这点世俗功利是完全不对等的。就这样，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童年的自然和淳朴。

倾诉的欲望是纯粹的。而物质主义对我们的腐蚀，就是让我们身在物欲之中自得其乐，认为一切的商业规则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当的和有益的。

这是最可怕的认同。我们承认了艺术与思想之域的商业主义规则，彻底的败坏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规则从此左右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写作将追逐娱乐主义，以博得乌合之众的喝彩而自鸣得意。其实真正的艺术不是不需要民众，而是需要更加真实的在漫长时间里形成的民众。

强势的商业文化的覆盖力是远远超出预料的，因为这种文化基因就在我们自身，而不仅是西方的传入和移植。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中曾经有两大主流，一是儒家文化，一是齐文化。儒家后来成了正统，影响极为深远。齐文化就是一种商业文化，它的物质主义最后毁灭了自己的社稷，引来了可怕的后果。但那也只是形灭而已，其魂魄一直是存在的，因为它源于人心的贪欲。齐文化一直潜在传统文化河流的底部，所以一旦有了适宜的气候和机缘，也就更加猛烈地翻腾起来。

而现在的全球一体化，不顾一切的物质主义时代，就是齐文化和西方重商主义游戏规则合而为一的时代。传统儒家文化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中华文化呈现出紊乱无序的状态。

在这种情形之下，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关于时代和生存这些根本性的追索和思考，将会集体退出。实用主义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行为尺度，成为鉴别生活的最高准则。这就是悲剧的诞生。

我们常常忧心于空气与水流的浑浊不堪，面对各种污染痛心疾首。也许治理河山、重整大地的宏志并不欠缺，可怕的是这一切努力都会被毁坏所抵

消。因为我们踏上的是逐物欲的不归路。

如果中华文明慢慢走向垮塌、松散和崩溃，那么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必将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这绝不是什么虚张声势和耸人听闻。

我们对于物质主义的俯首贴耳，很像是再次返回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返回了那个糜烂荒唐的时期。重商主义的管仲已经成为理想的标志性人物——没有多少人对他的选择加以怀疑，认为这是一个千古良相——精神和真理的探求是虚妄的、短暂的，只有物质的获取才是永恒的和实在的。

谁来质疑这些“经过了实践检验”的东西？

如果我们还有点理性，即可追问：谁来确定实践的范围、深度和广度？在怎样的时间里实践？在怎样的范围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和理性会构成一对矛盾吗？实践与理性又在多大程度上统一和并行？这些问题朴素自然，一点也不深奥。

难道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不是实践，而只有本世纪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才是实践？

我们需要个人的坚持与忍耐，在最困苦的境遇下仍旧追求心灵的自由。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这方面，最好的榜样就在身边，就是我们眉山的苏东坡。前边说过，很少有哪一个人比苏东坡的命运更跌宕更坎坷，更顽韧更饱满。像苏东坡一样度过了这般艰难历程，作出这般辉煌、这般酣畅淋漓的人生表达，这真是一个奇迹。他的强大的精神战斗力、永不屈服于命运的事迹，就镌刻在那里。

当然，也许几部苏东坡全集还远不足以呈现他整个的生命，不会是他全部生存的记录，但这却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个心灵窗口。

透过这些汉字符号，我们来还原那个真实的苏东坡，走进他的世界。

当我们把苏东坡变成了一个鲜活的人物时，才算是读懂了苏东坡。

有人曾说，在国外，人们对逝去千百年的经典作家，仍然比对自己的邻居还要熟悉。因为邻居之间很可能是冷漠的，近在咫尺却永不交流。但是透过那些大师的文字，其喜怒哀乐尽在眼前。文字是生命的符号，是用来还原生命的生动与神秘的。

对一个外国人可以这样，对于离我们的文化更为切近的苏东坡呢？一切都不言而喻了。他属于眉山，也属于我们整个的民族、整个的人类。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
《你在高原》获第八届矛盾文学奖）

“风水相遭”说

——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王启鹏

内容提要：“风水相遭”说的核心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的“不能不为文”的思想，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有为而作”的思想。三苏父子一直坚持这一理论和创作实践。苏轼兄弟还对“至文”标准、创作过程以及创作主体素质的提高作了发展。

关键词：三苏父子 风水相遭说 家学精髓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有些家族成员甚至是家庭成员均为著名的作家，如“三曹”、“三张”、“两陆”、“两潘”、“三苏”等。尤其是“三苏”，他们父子三人均居“唐宋八大家”之列，朱德元帅赞之曰：“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为什么一个家庭中能够同时出现几个著名作家呢？我以为，除了时代开放、统治者开明、个人禀赋之外，家学渊源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现以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家学思想分析之。

一、三苏为文的家学精髓：“风水相遭”说

“风水相遭”说虽然源于《易》经中的“风行水上，涣。”但苏洵在《仲兄字文甫说》中，从他的仲兄易字为“文甫”说起，借题发挥，拿“风水相遭而成文”作比喻，尽情地叙说了他对为文过程的看法，并把“风水相遭”的情形写得非常美：

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渟渟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太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陂也，纡余委蛇，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故曰：“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

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曰，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①

这就是著名的“风水相遭”说，其核心就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的“不能不为文”的思想。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本来是无意于写文章的，但是，受到外物的刺激，灵感来了，一篇好的文章就写出来了。他强调，写文章就是要有所感而发。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还谈到了他读书与写作的体会：他选取了《论语》、《孟子》等圣贤的文章读了七八年后，“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②苏洵强调的就是“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的写作心态，和“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的意思是一样的。

由“不能不为文”的思想而派生出来的，就是“有为而作”了。所谓“有为而作”，就是强调写作要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一思想虽然在苏洵自己的文章中没有直接的表述，可在苏轼的《晁公遡先生诗集序》中说得非常清楚：

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晁公遡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③

苏洵说这一段文字的本意是，反对当时在文坛上广泛流行的那种“贵华贱实”的浮艳文风的。但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苏洵是非常看重文章的社会功利性的，他是把文章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之一。以上引用的这两段文字，分别从“有感而发”和“有为而作”来说明苏洵为文的原则，其基本点就是作者要受到外物的刺激，有感而发。

自从苏洵提出了为文的这两个基本原则后，苏轼兄弟就一生遵循着。早在他们父子三人出仕前，苏轼在《〈南行前集〉叙》中就说：“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④这就明确标示出他们父子三人为文的指导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三苏父子一生都没有“勉强为文”，每一篇文章都是“有触于中”才“发于咏叹”的。

《宋史·苏轼传》说：“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⑤苏辙亦多次说到，他和哥哥少年时期都是一起向他的父亲学习作文的：“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⑥“惟我与兄，出处皆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再祭亡兄端明文》）^⑦甚至在晚年时还对其父充满着感激之情：“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藏书室记》）^⑧因此可以说，“风水相遭”说影响了苏氏三父子一生的为文活动，是三苏父子为文的家学精髓。

二、“风水相遭”说的基本内涵

苏洵的“风水相遭”说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认真考究起来，起码包含着这三层意思：

（一）为文的必备条件：“风”和“水”

“风”和“水”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这里，“风”比喻外在的客观事物；而“水”则是比喻作者的素质或是创作修养。从现代写作学来说，这个“水”就是创作主体，而“风”就是创作客体。创作主体能否进行创作，就看他能否受到外在的客观事物的刺激而产生创作冲动和灵感。所以，这两个比喻是唯物主义的，符合文学创作之实际。

（二）为文的过程：“风水相遭”

具备了为文的必备条件后，那怎样才能写出文章来呢？苏洵说得非常形象：“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遇，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这一说法非常中肯，非常严谨。在这里，苏洵强调，单有创作主体，或是单有创作客体，不能够写出文章来。两者都具备了，也不一定能写出文章来。只有当作者受到某种事物的启发，突然有所领悟，才能写出文章来，这就叫“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这里面还涉及到创作的灵感问题。苏洵的比喻很形象，说灵感是汹涌而至的，很符合写作的实际。苏洵在这里强调的“不能不为文”，实际上就是“有感而发”。

（三）“至文”的标准：自然而然

所谓“至文”，就是最好的文章。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思想性强和艺术完美的作品。苏洵认为，好文章的标准有两个：一是作者不能勉强为文，要在“不能不为”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是“至文”。其二，文字要从作者的胸中自然流出，不能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要像风吹水产生的波纹那样顺畅、自然，这就叫“无营而文生”。苏洵还强调说：“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苏洵是反对人工的雕琢美，提倡自然美。所以苏洵认为，“天下至文”的标准是自然而然。

需要指出的是，苏洵提出的这一为文思想除了正确地解决了作者的素质与社会生活问题外，还道出了文学创作的真谛：有感而发。这一思想已跳出了我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藩篱，把文学创作看作是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之一。

三、三苏对此学说的恪守与实践

根据“有感而发”和“有为而作”这两大原则，三苏父子一生的写作活动都恪守着，绝不写那些“浮巧轻媚”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所谓“文章”。在写作实用文章方面，他们在还没有为官之前，就能够针对表面是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而实际上是“内忧外患”的北宋社会现实，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方略，形成了一系列的《策论》。在诗歌和散文这些文学创作方面，每个人都写出了好些脍炙人口、流传千年的不朽诗文。现对他们的写作活动作一个概要的分析。

在“有为而作”的实用文体写作方面，苏洵写

有《几策》2篇，专门研究当时的形势问题；写有《权书》10篇，专门研究“用仁济义之术”来用兵问题；写有《衡论》10篇，专门研究人才的使用和制度的建设问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六国论》中借古讽今，指斥北宋王朝对外的妥协投降政策。在《上韩昭文论山陵书》中批评宋仁宗死后厚葬，规谏宰相韩琦“改令以救百姓之急”。⑨

苏轼更是不甘其后，先后写了《进策》、《进论》共50篇，具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治国安邦思想。在《进策》中，又分别用“策略”和“策别”来陈述。尤其是“策别”，则分为“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和“训兵旅”来论述，提出了“敦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去奸民”6项主张，具有现代管理思想和才能。

而苏辙受文章要“有为而作”的影响更深，他除了把自己撰写的50篇《进策》和《进论》呈献给朝廷外，在嘉祐五年八月参加由仁宗皇帝主持的应制举试中，他认为：既然考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那就要说真话，说实话，才能有补于国事。于是，他在《御试制策》中就以赤子之心，毫无保留地对当时朝政得失提出尖锐的批评，对仁宗皇帝宠幸后宫疏于朝政的行为进行批评，以致引起了考官和宰执们的激烈争论和惶恐不安。

在“有感而发”的文学创作方面，他们都写出了不少传世之作。苏洵的创作以议论文为最好，他亦以写作史论和政论为多。但是，他的杂说写得很有特色。如上面引述的《仲兄字文甫说》，他就是有感于风吹水而成纹，从而悟出了作者在外物的刺激下产生创作冲动的美妙情景。这篇文章文思泉涌，跌宕多姿，文字优美，是一篇非常好的散文。

《名二子说》虽然短小，但澹宕自然，意旨隽永，活现出作为父亲对两个儿子远大前途的殷切期望和忧虑担心。诗歌虽不是苏洵的强项，但写得也很不错，正如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⑩如《游陵云寺》：“长江触山山欲推，古佛咒水山之限。千帆万舸膝前过，仰望绝顶皆徘徊。足踏重涛怒汹涌，背负乔岳高崔嵬。……蜀江迤逦渐不见，沫水腾掉震百雷。山川变化禹力尽，独有道者尝闵哀。琢山决水通万里，奔走荆蜀如长街。……今余劫劫何所往，愧尔前人空自咍。”⑪蜀江雄姿如在眼前。

苏东坡是一个文艺全才，诗词文赋精通。他能够写出千古绝唱式的文学作品，也是源于他对客观

事物有感而发的。如《记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⑫寥寥80多个字，就活画出一幅清逸秀美的月夜图。再如《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既是写景，又是说理。而所写的一切，都是由眼前所见所感而生发出来的。

苏辙散文成就最高的是记叙文，汪洋淡泊，疏荡酣畅，典型地体现了其特点，《黄州快哉亭记》和《武昌九曲亭记》是其代表作。前者的主要部分围绕着亭名“快哉”二字着笔，在对亭周围的景色作了极力的描写后，然后扣住“快哉”的出处而生发议论：“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将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伤性，将何适而非快！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将蓬户瓮牖，无所不快。而况濯长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穷耳目之胜以自适也哉！”这是苏辙有感于黄州快哉亭的胜景和他兄弟两人都遭受到贬谪而发出的感慨。全文有描写，有议论。描写处生动逼真，寓情于景；议论处融情于论。再加上辞采绚丽，文势汪洋，难怪清代储欣说：《快哉亭记》汪洋若干倾波，是次公（指苏辙）集中第一乘文字。⑬至于诗歌创作，更有其特色：不少诗歌都是和苏轼唱和的。如《次韵子瞻吴中田妇》：“……丈夫强健四方走，妇女龌龊将安归？榻然四壁倚机杼，收拾遗粒吹糠粞。东邻十日营一炊，西邻谁使救汝饥？海边唯有盐不旱，卖盐连坐收婴儿。传闻四方同此苦，不关东海诛孝妇。”⑭这首诗歌写出了吴中农民生活的贫困，当然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感而发的了。

四、苏轼兄弟对其父理论的发展

苏轼兄弟中，对其父理论发展最为充分的，乃是苏轼。苏轼一生不仅作品多，且潜心研究为文之道，有关为文的心得体会也特别多，不少理论乃是对其家父理论的发展。最能够代表苏轼文艺创作思想的，是《与谢民师推官书》，其中就说到：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

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⑬

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从事文艺创作的经验总结，为文的思想结晶。在这一段话中，就有好些思想是对其父为文思想的发展。具体来说是：

（一）“至文”的标准：辞达

虽然说苏洵的“至文”标准是自然。但，他对“至文”只是作了形象化的描绘，没有在理论上给予阐释。苏轼虽然在书信中没有标明是谈“至文”的，但从他所说的“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来看，应该是“至文”的标准。那苏轼的“至文”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辞达”。因为苏轼认为：“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意思是说，如果认为言辞只是表达思想感情的，似乎不讲究文采，这是十分不正确的。那怎样才能达到“辞达”的要求呢？苏轼认为必须做到下面三点：

1. 在文字表述上是“行云流水”般的流畅

这一“行云流水”式的流畅，就是苏轼本人所说的“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要有生动活泼的文笔，该奔放的时候让它尽情地奔行，该停止的时候就一定要它收敛。并且，他的表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不拘一格。所谓“初无定质”，就是说没有固定的模式。而要达到文字上的“行云流水”，那作家在创作思想上一定要先做到行止自如。苏东坡在他的《自评文》中就说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⑭作者如果能够在思想上做到“文思泉涌”，在艺术手法上做到“随物赋形”，那写出来的作品当然就能够达到“行云流水”的艺术效果了。这种艺术效果，当然就不是苏洵批评的那种“刻镂组绣”的人工雕饰了。

2. 在文字表达效果上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所谓“文理自然”，就是文采和思想要活泼自然，符合自然规律。“姿态横生”，就是指笔下的人物或者事物活灵活现，具有形象性，并达到了千姿百态的艺术效果。要达到这两点，作者的素质当然

要高，要具有敏锐的思想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3. 不要以“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

所谓“艰深之词”，就是令人难以读懂的词语，也就是苏洵批评的那种“刻镂组绣”雕饰过度的文字。“以文浅易之说”，就是说用这些让人难懂的词语来掩饰浅显的道理。苏轼还以扬雄的《太玄》、《法言》为例，说明写文章不能够故作艰深，用难以让人读懂的词语来写。那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呢？苏轼主张用“常言”来写。

在周紫芝的《竹坡诗话》中有这样一则材料：有明上人者，作诗甚艰，求捷法于东坡。东坡作两颂与之。其一云：“字字觅奇险，节节累枝叶。咬嚼三十年，转更无交涉。”其一又云：“冲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乃知作诗到平淡处，要似非力所能。^⑮

平淡的语言，是写作技巧成熟的标志。而“常言”，就是平常的语言，不加修饰的语言。但它绝不等于一般的口语。苏东坡说过：“街谈市语，皆可入诗，但要人熔化耳。”^⑯由此可以看出，苏东坡所说的“常言”，其语言形式是普通的、平淡的，没有故意雕琢的。但，其思想内涵应该是丰富的、深刻的。如果用这样的“常言”来描摹客观事物，那当然就内涵丰富了，就能够达到“辞达”的效果。

（二）对为文的过程作了具体的阐述

苏洵在谈为文时只是说到：风水相遭，“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而“风”和“水”究竟怎样才能“相遭”？“相遭”时作者的心理又是如何活动的？苏洵就没有说了。苏东坡对为文的过程就作了具体的阐述，强调了创作主体的重要。他认为，要写出一篇好文章，必须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求物之“妙”。即是作者对客观事物要作细致的观察，抓住其特点。苏东坡在他一生的创作生涯中，非常强调捕捉形象。他曾多次谈到捕捉形象之难：“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⑰那怎样才能抓到有意义的细节呢？就要在平时养成细心观察的习惯。苏东坡的许多作品就具有这个特点。如写景的，“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念奴娇》），寥寥十三个字就把黄州赤壁的险峻地形写出来了，有形有色有声。写人物的，方山子“庵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往来山中，人莫识也。见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岂古方山冠之遗像乎？’因谓之方山子。”（《方山子

传》) ⑩三言两语便把方山子的特点写了出来。这就是苏轼在观察时抓住了事物特点的结果。

第二阶段：作者要用心体会，对客观事物“了然于心”。当作者在观察时抓住了事物的特点之后，作者还要用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事物，用艺术家的心灵去体验它、感受它，才能进一步掌握客观事物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形成独特的审美感受，从而把客观事物反映得更为准确。苏轼是这一方面的行家里手。据《诗人玉屑》记载：

东坡曾评论王平甫的诗句，说：尝见王平甫自负其《甘露寺》诗：“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余应之曰：“精神全在‘卷’字上，但恨‘飞’字不称耳。”平甫沉吟久之，请余易；余遂易以“横”字，平甫叹服。大抵作诗当日锻月炼，非欲夸奇斗异，要当淘汰出合用字。⑪

为什么“卷”字用得好，而“飞”字用得不好；而将“飞”改为“横”又好呢？因为“横”字塑造出在一阵骤然而起的风烟中勇敢搏击的白鸟形象，而“飞”字就体现不出来。这等情形，要靠作者用心去体验才成。

第三阶段：“了然于口与手”，即作者要用口和笔把所要表述的人物或事物表达出来。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当作者对客观事物有了深入的了解后，要把它准确地表达出来，也是一件难事。这就涉及到如何构思的问题。从现代写作学的观点来看，艺术构思是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它涉及到人物和事物形象的塑造问题，涉及到谋篇布局的大问题。

艺术构思，要从艺术整体来考虑，不能“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说道：“写竹者必须成竹在胸，谓意在笔先，然后着墨也。惨淡经营，诗道所贵。倘意格闲架，茫然无措，临文敷衍，支支节节而成之，岂所语于得心应手之技乎？”由此可见，“胸有成竹”是构思的重要方法，也是使辞能达意的重要方法。⑫

苏东坡认为，任何一个作者，只要他是按照这三个阶段写出来的文章，也就可以达到“辞达”的要求了。这样的文章当然也就是“至文”了。

此外，苏轼在其他文章中还就作者的素质问题作了阐发，这是他对其父“风水相遭”说中“水”的发展。他认为，作者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做到“道技两进”。“道”除了指作者的品德之外，更主要的

是指万物之理。他在青少年时期《上曾丞相书》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⑬在这段话中，苏轼明确地说出了他是以万物之理作为事物判断之标准的，而不是以个人的好恶为标准的。而“万物之理”，当然就是指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了。这是作者能够写出好作品的首要因素，这是“道”。

而“技”，当然就是指“写作技巧”了。苏轼认为，写作技巧对于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曾自我解剖说：文与可曾经告诉他，画竹子必须“成竹在胸”，先构思好才下笔。但是，“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故凡有见于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视了然，而临事忽然丧之，岂独竹乎！”(《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⑭所以苏轼主张作者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故轮扁行年七十而老于斫轮，庖丁自技而进乎道，由此其选也。”(《书黄道辅品茶要录后》) ⑮苏轼认为，像轮扁、庖丁这样技艺高超的人，都是终生练习的结果。所以，要想在文学艺术上有所成就，就必须“道技两进”。

苏辙对其父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强调作者修养上，这亦是对苏洵所说的“水”的阐发。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养气”说：

……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⑯

首先，苏辙所说的“气”和韩愈所说的“气”概念是相同的，都是指作者的精神状态和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其次，苏辙认为作者的这种“气”，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靠后天培养的（“气可以养而致”）。再次，作者的“气”旺盛，写出来的文章自然就充中溢外，气势磅礴。最后，作者怎样来养

“气”？苏辙强调了社会阅历的重要，认为作者应该像司马迁那样，“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就能达到“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的效果。苏辙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谈及读书与广泛接触社会这两种行为的效果比较，认为广泛接触社会比只读书有益：“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决然舍弃，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②苏辙的这种通过增加社会阅历来养气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仍不失其正确性。

五、三苏“风水相遭”说家学理论的价值

(一) “不能不为之为工”：文章价值的真谛

“工”者，工巧之谓也，引申为“出色”。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作者究竟在怎样的心态下写出来的文章才“出色”，才有价值？是“能为之”？还是“不能不为之”？三苏父子认为，只有在“不能不为之”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才有价值，才“出色”。他们所说的“能为之”和“不能不为之”，虽然只是在句式上有些不同。其实，在意义上是大不相同的。“能为之”是一种有主动性的意识状态，这种状态没有摆脱“患得患失”的个人功利思想的束缚，心灵没有达到自由纯净的境界，因而不能写出“工”的文章。反之，“不能不为之”则是作者在外力的逼迫下，感到有压力；或是情绪非常兴奋，而觉得非把这种感受写下来不可。这是一种心灵积郁的自由抒发，是与命运抗争的表达方式之一。它摆脱了现实功利的束缚，是作者心灵的袒露，写出了他人不可能有的独特感受，故文章就会“工”，就会有特色。

“不能不为之”还包含了“无意于为文”的思想。这里的“无意于为文”，指的是作者把“做人”放在首位，而不是靠文章来炫耀自己。苏轼在《子思论》中论述圣贤经典的产生时说：“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③在苏轼看来，经典产生于“非有意于为文”，经典只是圣人言行的反映，圣人注重的是自己的人格，而言论只不过是圣人生命的自然流露。所以，抱着“无意于为文”的心态来写作，才能写出不朽的文章来。

另外，“不能不为之”的思想，和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和韩愈的“物不平则鸣”说是

同义的。早在春秋时代，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了文学的心理宣泄功能。屈原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楚辞·九章第四》）^④到了司马迁，则将这种创作方式上升到了理论形态，他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⑤将一切文学乃至学术著作都看成是“发愤”之所为。所以，我国从古到今都有“文章憎命达”的说法，认为好文章都是出自社会地位低微，且在生活道路上遭遇不幸的人们所为的。而“不能不为之”这种写作行为，当然就包含在“物不平则鸣”的范畴之中。所以，在“不平则鸣”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作品，往往闪现出某种思想的光辉，从而使作品有可能成为流传千古的不朽之作。

(二) “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创作灵感之价值

“灵感”(inspir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两千年前的古希腊文中，而在我国最早出现在唐代王勃的《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中，他写道：“以法师智遗人我，识洞幽明，思假妙因，冀通灵感。”这里的“灵感”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灵感”不同。但是我国古代作家对灵感表现的描述不少，如：“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惚恍而来，不思而至。”（李德裕《文章论》）^⑥“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谢榛《四溟诗话》）^⑦苏洵《仲兄字文甫说》中的“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实际上就是创作灵感的产生。

那什么是灵感呢？从现代文艺心理学来说，乃是文艺、科学活动中因思想高度集中、情绪高涨而突然表现出来的创造能力。它的发生条件是：创造者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文艺或科学方面的酝酿思考的紧张阶段，思路忽然断了，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可是，在闲暇的时候，突然间受到某一有关事物的启发，原来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并且获得意想不到的巧妙效果，这就是“灵感”。所以，周恩来总理说：“长期积累，偶然得之。”道出了灵感发生的条件和情形，非常中肯和简洁。

而苏洵所说的“无意相求”，就是说“灵感”是在“无意”中获得的。老是想得到“灵感”，那

它是不会来的。“不期相遭”，是说“灵感”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来的。由此可见，苏洵是有丰富的创作体会，深得创作灵感突然而至的真谛。苏轼又是怎样看待灵感的呢？他对灵感的描述更为精彩和富于启发意义，如：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⑬

唐广明中，处士孙位，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尽水之变，号称神逸。其后蜀人黄筌、孙知微，皆得其笔法。始知微欲于大慈寺寿宁院壁作湖滩水石四堵，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日，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作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书蒲永升画后》）^⑭

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⑮

苏东坡在诗文中不仅写出了灵感的突发性、偶然性和瞬间性的特点，而且还提出了要及时捕捉和马上记下来的要求，如孙知微作壁画，“营度经岁，终不肯下笔”。一旦有了灵感后，便“仓皇入寺，索笔墨甚急，奋袂如风，须臾而成”。而艺术效果呢？“输泻跳蹙之势，汹汹欲崩屋也”，苏东坡称之为“活水”，认为是“至妙”。可见灵感乃是文艺作品达到不落俗套的重要途径。

（三）“求物之妙——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超前的写作理论总结

在我国古代，有关写作理论的文章和书籍不少。苏轼之前影响比较大的，有陆机的《文赋》和刘勰的《文心雕龙》。《文赋》开头虽然谈了写作的条件：要观察万物，钻研古籍等。但全文主要是谈创作构思，并没有谈及整个创作过程。《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体例周详，论旨精深，其下篇对文学创作的方法、原则作了具体而且深刻的论述。但对于整个创作过程的归纳还是不够的。苏东坡虽然没有对一个完整的写作过程作详尽的阐述，但他提出“求物之妙——了然于心——了然于口与手”这三个阶段，就非常超前的了。因为在高校写作教材中，“面向 21 世纪课程教材”的《现代写作教程》（2000 年以前出版的），在谈及“写作行为过程”时，也还是把一个完整的写作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写作感知；写作运思；写作行文。《教程》说：“‘感知’、‘运思’、‘行文’

与写作行为的发生、进展和归宿基本对应。需要指出的是，感知→运思→行文，在写作行为过程中构成了纵向发展系统的核心，三者是一个整体，互相交叉、包容。不仅在写作感知的初始就有运思的心理活动，而且作为心理的要求和语言试探行为的行文早期（或叫潜在期）活动也已存在。”^⑯这恐怕还没有苏东坡说的形象、深刻。苏东坡的一个“妙”字，就把观察事物时要捕捉住事物特点和构思要巧妙这两个要求说得非常到家。事实上，我们的写作，不论是写什么样的文章，只要是好的文章，就离不开“新”（新颖）和“深”（深刻）这两点，而苏东坡早就具有这样的意识了，这就是他理论超前的具体表现。

论文注释：

①、②、③《韩愈、苏洵散文全集》，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17、323、330 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313、323、2260、1418、2069、420、1379、365、2067、92、365 页。

⑮、⑯、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828、318、318 页。

⑱、⑲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71、61 页。

⑳、㉑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 1990 年版，第 1238、81 页。

㉒金国永《苏洵》，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93 页。

㉓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六册），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 页。

㉔吴小林《唐宋八大家》，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34 页。

㉕、㉖、㉗、㉘、㉙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301、283、301、305、188 页。

㉚、㉛牛宝彤选注《三苏文选》，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41、242 页。

㉜朱熹集注《楚辞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73 页。

㉝司马迁《史记》，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742 页。

㉞、㉟贾文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类编》，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492、495 页。

㉟董小玉主编《现代写作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0 页。

（原《惠州学院学报》主编，编审）

漫说苏东坡惠民的“空手道”

涂普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苏东坡在其三个贬谪地惠民之作为颂扬了苏东坡坚定的惠民之志、过人的惠民之术、巨大的惠民之实的崇高精神和殊世建树，为从政为官者提供了太多太大的思维空间。

关键词：手无寸权 惠民 空手道

在苏东坡身上确乎有许许多多的可圈可点的殊世业绩：比如说他徐州抗洪，比如说他定州治军，比如说他杭州治湖，比如说他黄州著文（二赋一词）……所有这些，举世皆知。然而，苏东坡贬谪期间所作的诸多惠民利国之举，却少有论及。我以为，苏东坡“手无巨斧亦劈山”、“其身戴罪亦惠民”的精神境界、殊世作为，是值得弘扬的。研究苏东坡惠民的“空手道”对于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对于认知、理解和定位苏东坡其人，对于今之以民生为重的各级为官从政者何以惠民，对于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都是极具意义的。

1101年，苏东坡蒙恩获赦北返，途中拜谒金山寺时，看到李公麟给他画的一幅肖像，联想他自己毕生坎坷经历，遂题写了一首六言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据记载，苏东坡题写这首诗时，距他的仙逝之日，只有一个月。可以说，这首诗是苏东坡对他自己的一生的总结。诗中点到的黄州、惠州、儋州三州，正是苏东坡人生最受煎熬、最感痛苦、最觉绝望的三个贬谪地。而在苏东坡的心目中，恰恰是这三个州为其人生创建功业最多、最大的三个地方。有人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内心痛楚的发泄，是苏东坡满腹牢骚的发泄。我倒不这么认为。我以为苏东坡在这首六言诗中道出了他的人生的真实，道出了历史的真实。翻开北宋历史，我们不难看到，苏东坡一生在宦海里飘游了40个春秋。大体上是12年在朝廷为官，其中有

些个年头是官居高位，令人仰视。在苏东坡宦海40年中，有28年是在地方上任职。其中，苏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任的是虚职。即名义上挂个小职，但不准签署公事。实际上，苏东坡是以其戴罪之身，挂个小小的虚衔。是一个手无“寸权（指公共权力，下同）”的钦犯、罪人。至于苏东坡的这种身份问题，我们可以从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时所发生的《夜归临皋》事件中得到证实。北宋元丰五年（1082）九月的一天，苏东坡邀了几位好友泛舟黄州江面，然后到东坡处饮酒数巡。苏东坡半醒半醉归临皋家门。门敲不开，只好复回江边。面对长江，生出许多感慨。在醉意朦胧中他填写了一首词《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第二天一早，太守徐君猷接到报告，说苏东坡写了一首词不见踪影了。“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同时派人全城搜查。这就足以说明当时的苏东坡不是“官员”，而是真正受监禁的钦犯，是个未戴枷锁的“罪人”。苏东坡在黄州是如此，在惠州、儋州更是如此。这是毫无疑问的。也就是这么一位身为“钦犯”的罪人的苏东坡，在其贬谪地之黄州、惠州、儋州，玩转了他的惠民“空手道”，造就了他的“平生功业”：东坡名号蜚声古今，二赋一词横空出世，拯救溺（弃）婴功垂青史，献方灭瘟德馨九州，发明名点美食传世，修桥便民利及子孙，倡导军垦传承千载，传授牛耕进化农业，兴教荒蛮推进文明……就一个地域的某个层面而言，苏东坡其功业建树，堪比神农、孔丘。然而，让人肃然起敬的是，苏东坡在其贬谪地所作出的诸多惠民建树，是一般在职在位的当权者很不容易做到的，却是苏东坡在手无“寸权”、身戴“钦犯”罪名的情况下做到的。可以说，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鲜见的。

这就不得不为世人瞩目了，为世人所研究、所探觅了。那么，苏东坡在其人生最悲怨、最低谷时期，在其贬谪之地，在其不仅无权，而且戴罪的人生境遇中，做出惠民建树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一，强烈的惠民意愿和志向。据记载，苏东坡小时候读书时，从师张易简。而张先生易简是修炼道教的高徒，且得道颇为高深。在张先生易简的学生中有两个学生对道教颇有感悟。一位就是陈太初，一位就是苏东坡。其中陈太初学道已走火入魔。当时，年少的苏东坡与陈太初是非常要好的学友，从张易简先生修道很是认真，达到了入迷的程度。虽然苏东坡的母亲程老夫人见此状况，毅然决然地将苏东坡弄回家里，就读于苏洵执教的“家塾”，但是，苏东坡对道教仍割舍不了，并且也有一些心得。道教的“赐福、赦罪、解厄”的教旨在苏东坡的心灵中种下了富有一定的生命力的种子，这是可以肯定的。及至苏东坡步入青年时代，自东汉初传入我国的佛教，经隋唐、宋朝，逐渐与我国道、儒等思想合流，中国人将佛教尽量向现实与人生靠拢。中国知识份子习佛中具有非常重义理的倾向，以致中国文人的文学创作往往周流三教。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对苏东坡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些宗教思想，无疑是苏东坡的思想、精神和理想追求的内核。因为苏东坡有了这种思想、精神和理想追求，所以在其入仕之后，换而言之，在其具备了地位、权力等一定的条件后，便使得“赐福、赦罪、解厄”道教教旨以及其习佛中重义理的倾向，变成了他的处事为人、行政惠民的理念和行动。乃至在其失去了为仕地位、权力等条件后，仍然恪守不怠、践行不懈。苏东坡在贬谪黄州、惠州、儋州期间，虽手无“寸权”，仍以戴罪之身，为百姓谋福祉、解厄难，究其实质，委实是苏东坡接受道教、佛教和儒教教旨，所形成的思想、精神和理想追求的继续和深化。是苏东坡这种思想、精神和理想追求在另一种条件下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实践。

其二，超凡的惠民之术。如果说在封建士大夫中，在任何境况下，都有着惠民之愿、惠民之意，而不止苏东坡一人的话，那么，能在贬谪之地，以戴罪之身做出如此之大、如此之多的惠民建树的，恐怕寥若晨星，甚至唯有苏公东坡一人了。苏东坡在其贬谪地超人的惠民之术，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借权惠民。苏东坡被贬到黄州，钦定其不得“签署公事”，其身份仍然是一名“钦犯”。当时

的黄州乃至整个鄂东，社会上都严重地存在着“溺婴”、“弃婴”，尤其是“溺女婴”、“弃女婴”的恶习。初来乍到的苏公，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决心除此恶习。然而，此时的苏东坡，手无寸权，何以为之。无奈之下，他在黄州安国寺“竹林间”，在安国寺大和尚继莲的支持下，请来黄州太守徐君猷、鄂州太守朱寿昌，一起品茶，商讨此事。经过几番商讨，定下四条举措：募捐救助多子女贫困家庭，苏公及太守们带头募捐；成立类似于当今的儿童福利院那样的收养弃婴机构；倡导富人领养弃婴；惩治“溺婴”者。商定之后，由州衙布告实施，收到明显的、可喜的成效。解决“溺婴”、“弃婴”恶习问题取得成效不久，徐太守君猷奉旨调任湖南。这时，苏东坡又请太守们一起在“竹间亭”品茶，为感谢借权惠民之举，提议将“竹间亭”改名为“遗爱亭”，并亲自捉笔，题写了千古名篇《遗爱亭记》。可以说，这是苏东坡在其贬谪地借权惠民的一个典型的十分成功的实例。二是请佛惠民。惠州是苏东坡人生中第二个贬谪之地。当时的惠州城被一条河流所分割，城民们隔河交往只能靠泅水过河。每到山洪暴发季节，肆虐的洪水都会冲毁城中房屋数十间，吞噬生命数十条。苏东坡得知这些惨痛的情况后，萌发了修建桥梁的念头。可是，修桥得好多的钱，而惠州当时又是荒蛮贫瘠之地，即使由州府出面，一时也难得筹集所需之款。怎么办？苏东坡当时想到了佛的影响力。他在主动与时任提刑的姐夫程之才、惠州太守、县令会商后，跋山涉水，登上罗浮山，找到罗浮山的大和尚，请罗浮山大和尚以佛法为号召募资之帜，动员僧人、官家、富商募捐钱财。大和尚和苏东坡带头把自己的一些值钱的物品，包括一些朝廷赐品，或卖出，或典当，筹资募捐。不仅如此，苏东坡还劝说弟弟子由之妻捐出不少当年朝廷赏赐的金币，作为建桥之资。苏东坡与罗浮山大和尚一起，借助佛的名义，以拯救生灵为旨意，动员和引导社会各方捐资，硬是在当时的惠州城内修筑了两座石桥：一座建在河上，一座建在惠州湖上，曰东新桥、西新桥。时至今日，仍在使用，真可谓功德无量。三是把教惠民。所谓把教惠民，就是手把手地教黎民百姓做有利之事。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从惠州再贬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苏东坡谪居时，儋州是“天祸尔土，不麦不稷。民无用物，珍怪是植。播厥熏木，腐余是穢。贪夫污吏，鷹鹫狼食。”（苏东坡《和

劝农》)说的是“贪夫污吏”们不仅不劝导黎民从事农业生产，反而一味要农人采沉香，以便利用采沉香、贸(易)沉香牟取暴利，搜刮百姓。正因如此，儋州的黎民百姓都不会驭牛用犁，挥锄破土。农业生产劳动主要靠刀耕火种。苏东坡来儋州看到这种落后的生产状况后，为了帮助黎民百姓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使用内陆农民早就使用的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苏东坡找来犁、牛和锄头，亲自扶犁吆牛进行耕地，亲自挥锄挖土。一边做给黎民百姓看，一边给黎民百姓讲解使用这些牛、锄、犁的基本技能和技巧。经过反复地示范教学，终于使儋州的黎民百姓掌握了这些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劳动工具和技能，使当地的农业文明大大地向前跨进了一步。不仅利及当代，而且惠及子孙。这算得上苏东坡把教惠民的一个突出的典型例子。苏东坡把教惠民的例子，在他的谪居地还有很多。比如，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看到农人扯秧时，使用秧马能够大大地减轻劳动强度，他就向农人学习制造秧马、使用秧马的技能和技巧。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后，看到当地农人扯秧时弯腰弓背，十分劳苦，他就手把手地教惠州农人制造秧马；手把手地教惠州农人在秧田里使用秧马。经过苏东坡如此这般地把教，黄州农人使用的秧马，就传给了惠州农人。至今，惠州的农人还在使用秧马扯秧。真可谓功莫大焉。

其三，苏东坡深孚众望。我们知道，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了政权，建立宋朝后，一个良好的愿望就是息刀戈、施文治。因此，在宋朝发展进程中很长一短时间内，都是推崇人文，重视文人。苏东坡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一位出类拔萃的文人。他21岁中进士，被当时的宋仁宗皇帝作为“储相”而加以储备。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推崇苏东坡的文才，说三十年后，人们只读苏东坡的文章，而不再会读我欧阳修的文章了。在当时，宋朝的中央直管州、路。且朝廷大臣到州、路任职的情况也很普遍。所以苏东坡在朝廷如此赫赫声名，各州、各路无所不知不晓。也因为这个原因，苏东坡到地方上哪个州，都倍受官、民所推崇、所景仰。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贬谪到黄州后，当时的黄州太守徐君猷待苏公如“骨肉”，便是一个佐证。所以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时，向徐太守君猷借权惠民能够如愿以偿，且大有其效果，也就不那么费解了。加之，苏东坡在谪黄期间，创作出了“二赋一词”等在当时的文坛上属上乘极

品之作，其文才之高，更为人所仰慕。朝野上下，苏东坡的影响力便是不言而喻了。非但如此，在佛教界莫不亦然。再一个，苏东坡在其人生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爱好，就是喜欢交游。他在交游中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有些是朝廷的，有些是民间的；有些是和尚，有些是庶民；有些是读书人，有些是杂流名士……在诸多的朋友中，有些尚属两肋插刀的朋友。如佛印、巢谷等。苏东坡谪黄期间，正碰上鄂东地域流行瘟疫。治好这种瘟疫的“药方”正是巢谷所传。一事当头，朋友襄力，就可以化险为夷、化难为吉了。这样的例子并非鲜见。再加上苏东坡经常与社会底层的民众交往，眼路宽，耳路聪，对社会基层民众所思所想、所喜所怨、所需所求、所爱所恨都比较了解，所以，苏东坡在黄州、惠州、儋州等谪居之地，所做惠民之事，一般都是当地存在的突出问题，都是老百姓所喜所爱、所需所求之事，同时也是州衙难以推脱之事、佛界乐为之事。苏东坡在黄州期间所作的解决溺婴弃婴之事，治疗传染病之事；在惠州修建东新桥、西新桥之事，为民减免税费之事；在儋州教黎民使犁用锄之事，兴办教育之事，等等，无一不是如此。由于苏东坡才高超群、朋友相拱、深谙民心，因而他深孚众望。又由于苏东坡深孚众望，因而他在其贬谪之地所举惠民之事，往往能顺行其道，获得硕果。

苏东坡在其贬谪之地，在其手无“寸权”的情况下，以其戴罪之身，作出如此之多、之大的惠民建树，这一历史的闪光的陈迹，给人，特别给我们的为官从政者，留有了太多、太大的思想空间。是很值得体鉴品味的。应该说，这也是苏东坡这位世界千年英雄、中国文坛巨擘给我们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富有深远意义的文化遗产。

参考文献：

林语堂《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3版。

王水照《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2次印刷。

吴仕端《惠州西湖艺文丛谈》，1983年5月版。

儋县文化馆《苏东坡在海南》，1981年12月版。

何学善《苏东坡与黄州安国禅林》，鄂黄图内字[2009]第79号2010年4月版。

(黄冈职业技术学院研究员、原党委书记，黄冈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雷州苏轼符号诠释

刘清泉

内容提要：苏轼流徙海南，旅居雷州，留下了诗歌、书牍和遗迹。其中《和陶止酒》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形成了雷州苏轼符号，其象征意蕴集中体现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象征义无反顾、旷达潇洒和重情重义的苏轼精神。本文以苏轼在雷州作《和陶止酒》为基础，从“止酒”的不可止酒、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三个方面，诠释了苏轼的价值选择、人生姿态和社会取向。

关键词：旅居雷州 和陶止酒 苏轼符号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和陶止酒并引①

苏 轼

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正矣。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
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
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
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
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
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
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
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
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
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毫无疑问，这是苏轼流徙海南途中旅居雷州时写作的，诗“引”交代得很清楚。《和陶止酒》历经沧桑岁月，在典型化、抽象化和现实化的过程中，

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历史到现实，提炼、概括和升华，从而形成了雷州苏轼符号。

周成仕主编的《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说：“东坡符号是东坡文化超越时空、衍生发展并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多重象征、文人情结和品牌效应的文化符号。”②“从对象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物质符号、东坡非物质符号；从生态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原生态符号、东坡衍生态符号；从形态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语言符号、东坡肖像符号、东坡遗址符号、东坡书画符号、东坡数字符号。”③雷州苏轼符号属于物质符号、原生态符号和语言符号，象征“道不行，乘桴浮于海”④所蕴涵的义无反顾、旷达潇洒和重情重义的士气文心、苏轼精神，表现了苏轼的价值选择、人生姿态和社会取向。

一、从“止酒”谈苏轼的价值选择

诗、引中“止酒”的词句颇多。诸如：“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意思是因而朗诵陶渊明的诗歌《止酒》，劝戒我止酒。“庶几真正矣”，“庶几”表示可能或者期望，可能真的要停止饮酒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劝我量力而行，多为自己考虑，学习陶渊明什么呢？止酒，岂知渊明是否一时止酒无须考究，也无从考究。袁行霈教授说“诗题《止酒》，意谓停止饮酒。渊明或曾一时戒酒，或从未戒酒，无须考究。但此‘止’字，颇可玩味，人之祸患或因不知‘止’所致也。”⑤“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言病皆由饮酒而起，戒酒病即愈。“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望道：追求真理。结合渡海使用济（渡）、津（渡口）、涘（水边），意谓追求的真理已经隐约可见。“从今东坡

室，不立杜康祀”，杜康，古代善酿酒之人，指代酒。从今天开始我东坡的居室，不再有祭祀杜康的牌位，意谓不饮酒，戒酒。

事实上，苏轼可能一时戒酒，但时间不长。东坡不曾戒酒，渊明也不曾戒酒，酒岂可戒哉？

魏晋文人喜欢饮酒，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⑥，以此来说明酒与陶潜和苏轼生命的关系，颇为中肯。与其止酒，形神分离，成为行尸走肉，不如死于酒而后快。与其放弃追求更有意义与更有价值的人生，不如无所畏惧地乘桴浮海，向死而生，浪迹海外。这就是苏轼的价值选择。

陶渊明嗜酒，说“酒中有深味”，其《止酒》虽为戏笔，犹耐玩味，写酒之不可止，诙谐风趣：

“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意思是平生不肯停止饮酒，停止饮酒就会心里郁闷。晚上停饮就不得安睡，早上停饮就起床迟延。天天都想停止饮酒，停止了则营卫二气不顺。饮酒不仅是他身体的需要，而且是他心灵的需要，酒岂可止耶？

苏轼嗜酒，不逊渊明，他在《饮酒说》^⑦中说：

嗜饮酒人，一日无酒则病，一旦断酒，酒病皆作。谓酒不可断也，则死于酒而已。……吾平常服热药，饮酒虽不多，然未尝一日不把盏。自去年来，不服热药，今年饮酒至少，日日病，虽不为大害，然不似饮酒服热药时无病也。今日眼痛，静思其理，岂不然耶？

意思是：喜欢饮酒的人，一天没有酒就难过，一旦断了酒，酒病都会发作。认为酒不能断，就只好死于酒了。……我平常服热药，饮酒虽然不多，但也不曾哪一天不饮酒的。从去年以来，我没有服热药，今年饮酒特别少，天天生病，虽然没有大的妨碍，但也不如饮酒服热药而无病的好。今天我的眼睛疼痛，静想一下其中的道理，上述说法可能是对的。喝酒对于苏轼来说，已经成为人生的态度、生命的情调，已经渗入骨髓、融进灵魂，“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

（苏轼《浊醪有妙理赋》）^⑧，酒岂可止哉？

苏轼走入仕途之后，宦海沉浮，为什么就是不辞官归隐呢？读此诗可见端倪。酒象征道、象征儒家文化。就像酒融进他的灵魂一样，从小接受的儒家文化也融进了他的灵魂。嗜酒之性与浩然之气，均不可移易。正如《宋史》所说：“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

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⑨韬：遮掩，隐藏；戢：收敛；柄：权柄。有人说苏轼只要自己稍微收敛锋芒，即使不获得权势，也不会有祸患。如果这样，让苏轼因此而改变他的行为，还是苏轼吗？苏轼一生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积极从政，宽简爱民，为了实现他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甚至“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⑩。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他积极参与政治变革的博弈，反对王安石变法和司马光尽废新法。实质上是与“同好”之间的“对话”，期望与“同好”共同创造一个“好局”，目的是使北宋朝廷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安定。汤一介教授说：

“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里的‘道’就是‘天道’（当然也包括体现‘天道’的‘人道’），人是应该把‘天道’的要求推行于社会；如果人不能把‘天道’推行于社会，不如乘木船到海上去。”^⑪这就是苏轼的价值选择。

二、从“止酒”谈苏轼的人生姿态

“止酒”的主观原因是嗜酒引发了疾病、伤害了身体，苏辙诗云“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次韵子瞻和陶公正止酒雷州作》）^⑫，苏轼诗云“微疴坐杯酌”，痔疮之病是由于饮酒。苏轼诗“引”云：“余时病痔呻吟”，意思是我那时痔疮发作，很严重，不停地呻吟。“病”常指病得很重，象征人生的坎坷、祸患、磨难。就像嗜酒引起对身体的伤害一样，由于秉性难改而罹难，宦海沉浮，坎坷一生，贬谪黄州、惠州，直至儋州。

下边我重点谈谈苏轼面对磨难的人生姿态。

即将渡海的苏轼并不悲观，而是安时处顺，随缘自适，旷达潇洒。正如诗云：“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所谓“萧然两别驾”即苏轼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辙贬为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如此残酷的迫害，苏轼亦颇为乐观，可谓“黑色幽默”也。虽然贬谪岭海，但行有稚子相陪、家有妻室相守；虽然在流徙途中，但有相逢、相伴之喜；虽然相隔茫茫大海，但生活所需基本可以满足。由此可见他超越苦难的智慧。

苏轼《与杨济甫二首》^⑬其一云：

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

意思是我处境狼狈，劳苦万状，但胸中仍自有怡然之乐。今日所到海岸，地名叫递角场，明天顺风就能抵达琼州。回望故都，真在天涯，只有留书作别。即使到了地角、到了绝境，他也绝不沮丧，扬帆渡海，水天一色，苍茫浑然，壮观奇绝，岂不快哉！

除了苏轼在雷州的相关诗文之外，其他一些史料中的奇闻轶事亦可见他的诙谐乐观。

陆游在《老学庵笔记》^⑭记载苏轼、苏辙共食汤饼之事：

吕周辅言：东坡先生与黄门公南迁，相遇于梧、藤间。道旁有鬻汤饼者，共买食之。粗恶不可食，黄门置箸而叹，东坡已尽之矣。徐谓黄门曰：“九三郎，尔尚欲咀嚼耶？”大笑而起。秦少游闻之，曰：“此先生饮酒但饮湿而已。”

黄门公、九三郎皆指苏辙。“饮酒但饮湿”见《岐亭五首》^⑮其四，饮湿：饮淡薄如水之酒。这段话的意思是吕周辅说：苏轼与苏辙贬谪岭南途中，在梧州、藤州的山谷相遇，路边有卖汤饼的，买来一起吃。汤饼粗糙劣质，根本吃不下去。苏辙放下筷子叹气，而苏轼已经吃光了他的那一份。慢慢地对苏辙说：“九三郎，你还想细细地咀嚼吗？”一边说一边大笑着站起身来。秦观听说这件事，说：“这就像先生在黄州饮酒，只不过淡薄如水之酒诳一诳口罢了。

王象之《舆地纪胜》^⑯记载了苏轼在雷州徐闻县递角场渡口，即将渡琼州海峡与苏辙告别之事：

轼初与弟辙相别渡海，既登舟，笑谓曰：“岂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

你看！苏轼登上渡船，与苏辙开玩笑说：“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主张行不通了，便乘坐一个木船到海外去吗？”渡海前夕，临行赠别，面对汪洋，心境显然与曹操观海的壮怀激烈迥异，那么苏轼渡海是怎样一种心境呢？是慷慨悲壮吧！面对渡海的危险、面对死亡的威胁，苏轼显得超然。试想，能够投身于孕育万物、包容万物的大海的怀抱，又何必“托体同山阿”呢？

可见，苏轼“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人生姿态。

三、从“止酒”谈苏轼的社会取向

苏轼诗云：“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由于我们兄弟俩一意孤行，才落到同时贬谪到岭南的境遇，并且已经到了“路穷非我止”的境地。“路穷”没有路可走了，“非我止”我仍然不能停止，往哪里去呢？往海外去，“乘桴浮于海”。

“止酒”的客观原因其实并不是他们兄弟俩到了穷途末路，是情同手足的弟弟苏辙的屡次劝戒，让苏轼感动，而苏氏家风是非常重视人情的。苏辙诗云：“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次韵子瞻和陶公正酒雷州作》）^⑰意思是他们兄弟俩连床而卧，一听到哥哥有动作或者呻吟，便起床看看，再三起来，整夜不能够安睡。苏轼诗“引”亦云：“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在这种情况下，弟弟诵陶渊明《止酒》诗，哥哥和陶渊明《止酒》诗，止酒互勉，重情重义，情真意挚。

他们的兄弟之情可感动千古，就是朋友之情亦堪为师表，并不是像他在《与杨济甫二首》^⑲其二中所说：“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苏轼兄弟同时贬谪到偏僻的岭南，是不善处世吗？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吗？非也。下边我们来看他在雷州的几则短简，可见与人相处的和谐融洽，对别人的滴水之恩，总是心存感激。

苏轼渡海前夕，得知堂兄不危（子安）之子登第中举，致信其妻史氏《与史氏太君嫂一首》^⑳：

某谪海南，狼狈广州，知时侄及第，流落中尤以为庆。乃知三哥平生孝义廉静自守，嫂贤明教诲有方，天不虚报也。明日当渡大海，聊致此书，嫂知意而已。

意思是：我被贬谪到海南，流落在广州时，得知侄儿苏时中举，辗转流落之中，更觉得这是咱们家的大福。可见三哥平生忠孝仁义，廉洁清静，独守节操，嫂子贤惠明理，教诲有方，上天也不虚报。我明日便要渡过大海，暂把此信送去，好让嫂子知道我的心意。

至徐闻，得到雷州官员冯大钧的帮助。苏轼有《与冯大钧二首》^㉑致谢。

某启。经由烦溷铃下，佩荷深矣。比惟起居住胜。某来早发去，自是岭海阔绝，怅然。所冀以时自重。谨奉手启布谢。不宣。

——其一

某有广州市舶李殿直书一封，烦附递前去，复不沉没，为荷。勿讶淹读
——其二

其一意思是：苏轼致言：我路过时打扰了您，途中深为感激。想必您近来一定生活安好。我明天一早动身离去，从此以后远隔岭海，想来令人惆怅不已。愿您顺应天时多多保重。谨上此信致谢。其二意思是：我这里有一封给广州市舶司李殿直的信，麻烦您给他捎去，请别让中途有失。恕我打扰。

苏轼兄弟将至雷之境，雷守张逢以书通殷勤；至雷州，到门首接见，并延入馆舍。苏轼渡海至琼之后，书信致谢，有《与张逢六首》（其一、其二）②。

其一有：“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遗，眷待有加。感服高义，悚息不已。别来未几，思仰日深。比日起居何如？某已到琼，过海无虞，皆托余庇。”意思是：我们兄弟流落他乡，同到贵地，蒙您不嫌，殷勤招待。感念您的高德大义，惶愧不已。别后不久，思慕之情日渐加深。近来生活怎样？我已抵达琼州，渡海时没有遇险，全都是托您的福。

其二有：“海南风气，与治下略相似。至于食物人烟，萧条之甚，去海康远矣。到后，杜门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极得力，感谢。”意思是：海南的风土人情，与贵地大致相似。至于说食物人烟，却极其萧条，比海康差得远了。我到之后，闭门静坐，外界的喧嚣与寂静对我来说都一样。蒙您派人渡海相送，十分得力，感激不尽。

从以上几则与雷州相关的短简可以看出，苏轼兄弟对人际关系的处理可谓充满人情。苏轼以亲切仁爱待人，自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③这就是他的社会取向。至于说他的“治国”之本、“改革”之策、“为官”之道，与那些执政之间的“不同”，似乎与物多忤、不合时宜，那又另当别论。

总而言之，酒象征道、理想、信条，止酒象征放弃真理、动摇信念、背叛信仰。止酒的主观原因是伤身、罹难，苏轼的姿态很潇洒；止酒的客观原因是亲情、感动，苏氏的家风重人情。《和陶止酒》意境与《论语》语录的契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便成为雷州苏轼符号高度概括。苏轼面对绝路的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面对磨难的随缘放旷、潇洒自娱，面对亲朋的感恩之心、真挚之情，面对死亡的泰然自若、超然物外，就是“道不行，乘桴浮

于海”的意蕴诠释，就是《和陶止酒并引》的苏轼精神。

论文注释：

①、②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839、2521 页。

③、④周成仕主编《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 页。

⑤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42 页。

⑥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00 页。

⑦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659 页。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8449、97、2870、6533、6533、6624、6422、6425 页。

⑰《苏东坡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432 页。

⑱汤一介著《儒学十论及外五篇》，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64 页。

⑲、⑳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 16 集），语文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46 页。

㉑、㉒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1268、1271 页。

㉓师雅惠编著《苏东坡说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5 年版，封二。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



（2012 年 4 月 2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与广东海洋大学联合主办“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学术会议”分组讨论会现场。刘清泉 摄）

“乌台诗案”剖视

郑秉谦

内容提要：针对研究“乌台诗案”论文情绪化过强、真实性不足的问题，先将分散的有关资料剔抉爬梳进行罗列，然后剖析诗案不因诗、书狱不以狱的缘由，最后分析苏轼的磊落胸怀、浩然正气。

关键词：苏轼 乌台诗案 剖析 襟怀

新排流水账

近年报刊所发“苏学”研究文章，涉及“乌台诗案”者颇多。这些文章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然间亦有情绪化过强、真实性不足者。昔日读王元化先生有关韩非子的论述，有感于中，也愿一叙对诗案的看法。为了说话有证据，先将分散于各种古籍中的有关资料剔抉爬梳，排成下列流水帐：

北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也是王安石议行新法的第五年。这年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京官沈括奉朝廷之命相度两浙农田水利，“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近诗一通，归（京）即签劄以进，云词旨讪怼”。朝廷未予理会，但宋人认为其后李定、舒亶之徒兴乌台诗案，实本于此。这个沈括便是著名的《梦溪笔谈》的作者。

六年之后，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罢相闲居钟山已三年，吴充、王珪为相。吴充不是新法的拥护者，王珪则是对皇帝唯唯诺诺的、百依百顺的“三旨相公”。这时一个被史书称为“皆因起狱夺人位而居之”的蔡确却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他由御史中丞擢为参知政事(副相)，并推荐何正臣为权监察御史里行。而御史台的任务为监察官吏。苏轼这年新知湖州事；此前他已成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不仅《钱塘》、《超然》、《黄楼》三集镂版印刷，风行天下，并且号称“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诸人已齐集在他的文艺大纛之下。六月二十七日(农历，下同)何正臣向皇帝上书，劾苏轼《到湖州谢上表》罔上，并取苏诗印本进呈。

五天之后，即七月二日，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

继之上表云苏轼《山村》诸诗欺君，并将苏诗印本“谨具进呈”。

这期间，一个御史台外的，也不与苏轼同地区为官的淮东常平官李宜之，据灵璧秀才张硕的检举，状告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侮上。

与舒亶同日，御史台头头、御史中丞李定上章弹劾苏轼。此章是个“总结性发言”，以综合上述诸人奏札为主，但也附带揭发苏诗“或有燕蝠之讥，或有窦梁之比”，增添了新内容。

次日，李定奉旨将以上诸劄加上“罪证”诗册，交御史台根勘所严办。诗册为四卷本《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即苏轼钱塘集元丰增订本)。

在此同时，熟谙宫廷内情的驸马王诜(画家)，通过“高干子弟”王巩(诗人)，把朝廷决定严办苏轼的消息，派人快马加鞭密送湖州。

七月二十八日，台吏(御史台办事人员)皇甫僎带人赶到湖州，收逮苏轼。此时苏轼已经移交州事，静待事态发展。他从容就捕。为了减轻夫人王闰之的担心，临行，还回头同她开了个玩笑。使夫人破涕为笑。

台吏押送苏轼，循运河到太湖鲈香亭。苏轼为避免牵连他人，思欲沉水自杀。由于台吏看守严密，长子苏迈随行服侍，未能如愿。

八月十八日，苏轼到达汴京，下御史台狱勘问，皇帝命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在苏轼被押解抵京前后，他的学生(也是轼弟辙之婿)王子立，护送苏轼全家乘舟离湖州向南都(商丘)进发。但“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迁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御史台同时向苏氏数十友好，逼取“所收受苏轼讥讽文字”。二者俱为进一步搜罗罪证，以成大狱。

两天后，苏轼自书供状，说“除《山村》诗外，其余文字并无干涉时事”，采取了后世所谓“挤牙膏”态度。

又十天后，即八月三十日，在众多物证下，苏

轼不得不“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但还隐瞒了黄庭坚诸人，其后，“再勘方招”，不愿“竹筒倒豆子”。

十月十五日，圣旨追问“内外文武曾与苏轼交往，以文字讥讽政事”的名单。在这近两个月中，苏轼已屡受刑辱。当时以另案系狱，后来当了宰相的苏颂曾有诗云：“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

十一月廿八日，奉圣旨依御史中丞李定奏，收坐王诜、王巩、苏辙、参寥、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孙觉、李常、曾巩、陈襄等二十九人。

十一月三十日，御史台拟出判决初步建议，上奏皇帝。因为此系台吏以瓮片磨墨所书，文理不通，重复错乱；加上文中多处出现宋代法律专用语言，颇不易懂。但尚可略知对苏轼的处罚为：一、以同王诜往来与《到湖州谢上表》不恭，“合杖八十”，“加一百”，再加“徒二年”；二、以诗赋讥讽，合“徒一年”；三、以诗赋寄送王诜等数十人，合“徒二年”。以上三项合计，以官职抵徒杖，“其苏轼合追两官，勒停放”。此时苏轼已系狱三个月又十天。

十二月廿九日，苏轼继续系狱一个月后，奉圣旨：“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苏轼原任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事，是六品官；现在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充团练副使，检校即兼官，水部员外郎是兼官十九阶中的最末一阶，从八品。王诜的处分同他一样，也是追两官、勒停。王巩则比他流放得更远，到岭南监宾州盐酒税务。苏辙贬到离黄州稍近的筠州监酒税。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二十二人，则各“罚铜二十斤”。

七月廿八日苏轼被捕到十二月廿九日正式判决的五个月中，李定、张璪、舒亶、何正臣等四方罗织、百般刑讯，“傅谋致轼于死”；王珪等人亦落井下石。而同时，张方平、范镇等勇敢地上疏营救，苏辙向朝廷请求纳官以赎兄罪，吴充、王安礼更面奏神宗为苏轼转圜，曹太后(神宗祖母)也力主苏轼无罪释放。

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在台吏押解下，带了长子苏迈，离开汴京，由陆路向放逐地点进发；二月初一抵达黄州，开始了他长达五六年的第一次放逐生涯。这年他四十五岁，实仅四十三岁。

人们把以他为主角的这一事件称作乌台诗案。《汉书·朱博传》：“是时御史府……中列柏树，常

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后世因称御史台为乌台。诗案即诗狱，也即文字狱。乌台诗案就是下御史台狱的文字犯罪案件。宋人朋九万，曾将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之的揭发材料，苏轼的供状，以及有关的请示报告和上谕，编成一书，径名《乌台诗案》。

诗案不因诗

从表面看，既称诗案，总是因诗兴狱。坡公在狱中自书供状近二万字，绝大多数也与诗有关。但为什么说“诗案不因诗”呢？

有人说：诗案不因诗，而因对王安石新法的批评，因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但考诸史实，坡公同王安石一样，久思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现状，只是在变法的主张中有与王不同的侧重点。首先，王置三司条例司拟置新法条例，想在短期内全面推开，改变一切；而苏则主张渐进，提出要从择吏、丰财与强兵三方面逐步进行改革。他批评神宗“求治太急”，主张“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智者所图，贵在无迹”。其次，王的变法重在法制，苏则重在吏治。王认为今“多不合先王之政”，天下“患在不知法度”；苏则以为“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今“天下之患，法令虽有未安，而天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其三，王求同心切，巧进之士便通过大捧新法猎取美官，吕惠卿、邓绾、蔡确、李定等莫不如此。苏则主张官员“必使积劳而后迁”，反对“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他谏神宗不可“进人太锐”。从这三点看，王苏间的矛盾是改革主张上的不同，并非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因此不能说诗案是这种斗争的产物。

有人说：诗案不因诗，而因王苏二人间的个人矛盾。他们或称诗案制造者蔡确、李定、舒亶等都是“王安石的人”，或称王妒忌苏的文名，并以这些为诗案的成因。这种说法，比前者更离谱。不错，李定“早岁从王安石学”，又以颂扬新法使“安石大喜”而得美官；舒亶擅杀轻罪者以示执法严格，博得“王安石闻而异之”；王安石荐蔡确，蔡确荐何正臣均史有明文。但诗案发生时，王安石失宠已三年整，以今视古，这些巧进之士此时已不会买他的帐，更谈不上以成大狱来保卫一位前相公。何况，王安石即使在亲任正副宰相期间，也从未设法起狱打击与己政见不同的士大夫，更不必说罢相之后

了。至于说王妒忌坡公的文名，那就更无根据了。他们同为北宋古文、诗词大家，苏对王刻薄取笑、王为苏困窘恼怒则有之，但二人实相推许，未搞“文人相轻”。王曾在人前称赞：“子瞻，人中龙也。”有一次，他读苏诗时不由赞叹：“老夫集中，更无此等诗。”而苏也颇推重王的道德文章，后来还曾以“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样的诗句赠王。因此，很难说他们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个人矛盾。

那么，乌台诗案的发生，原因究竟何在？窃以为真正原因要从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与体制中去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社会号称以儒治国；但实际上，道德伦理、仁义揖让不过是封建统治方法的外表，其内里则为建立在利用人们自为心理基础上的法、术、势，以及建立在“人性皆恶”的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分析方法。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从来就是“儒表法里”的。历代最高统治者所孜孜以求的，是韩非所谓“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天下不得不为己听”。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主要靠“匿罪之罚重而告讦之赏厚”。君主利用臣下的自为心理，煽起人们恶劣的情欲；然后再以自己的好恶示之，使臣下不顾法律、不问曲直、不论是是非地昧着良心去“告讦”、“举发”。君主只要掌握赏罚二柄，臣下便会为“利庆赏”、“畏诛罚”而将旁人推入炼狱。这种思想模式、行为准则、政治体制，才是乌台诗案发生的真正原因。

宋神宗不是个坏皇帝，他倾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甚至在安石去位后，仍坚持推行新法。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在推行自己崇奉的主张时，必然采取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态度。而苏轼偏偏不识相，十年来就没少以诗文、以表章、以言语嘲讽推行新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且出语刻薄，态度固执。御史台的这批人，素善揣摩上意，他们都是尝到过以告讦、兴狱而得厚赏的甜头的。御史台头头李定从秀州推官任上调京，到谏官李常处拉关系，李常问：“君从南方来，青苗法如何？”他答：“民便之，无不善者。”常云：“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他立即赶到王安石处出首，并且装痴卖傻地说：“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于是安石大喜，破格擢用。舒亶治狱，素来“株连考竟，以多为功”，现在遇上钦案，岂能不一显身手！而张璪则一向“深交舒亶，数起大狱”；蔡确更屡“因起狱而夺人之位而居之”，由小官而中丞，由

中丞而副相。这些尝过甜头的人，一见有机可乘，便都摩拳擦掌，一拥而上了。

另一些人则与他们有程度上的差别。这类人虽知整人是猎取富贵的终南捷径，但只不过初试锋芒。他们或在成狱前不甘落后，告讦揭发，如秀才张硕、常平官李宜之与相度两浙水利的那位沈括；或在成后情不自禁，跳将出来，同打靶子，如宰相王珪。这位王相公当了十六年正副相，一贯“道谀将顺”，人称“三旨相公”。他每天上朝只做三件事：向皇帝请示时曰“请圣旨”，皇帝表态后曰“领圣旨”，出朝则向部下曰“已得圣旨”。就是这样一个人，此时突然跳出“三旨”迷雾，一露狰狞。

但如果把以上两种人，看成是新法的信仰者、拥护者，那就大错特错了。以蔡确来说，他在推行新法的熙丰之间，大显身手，“冤狱苛政，首尾预其间”，混到了副相以至宰相地位；但到废除新法的元祐年间，却又“稍语人曰当时岂敢言之”，仿佛当时他就反对新法，只是不敢明说而已。不仅此也，其时司马光废除新法，“蠲除烦苛”，他却对外说成是自己向皇帝建言的，公开把自己打扮成“反变法”派。再以上面提到的沈括来说，他在王安石当政时积极检举苏轼反对新法，一等安石罢相，他却向时相吴充大论安石新法的不便了。至于张璪，用一位御史后来劾他的话来说，则“初奉安石，旋附惠卿，党章惇，谄蔡确。数人之性不同，而能探情变节，左右从顺，各得其欢心”。这些人不过是毫无政治操守、善于从左右逢源中捞取私利的官僚，是对新法作积极奉行状的腐败分子而已。如果以宗教作譬，他们说不上是信仰者，而只是鲁迅所批判的“吃教”的而已。

可见造成此案的动力，是人们出于争赏避祸心理的彼此监督与互相举报。这种机制，实在比明代“锦衣卫”、“东厂”制度更严密有效。后者虽耳目众多，心腹遍置，但范围毕竟有限，未若前者那样人人自觉地充当君主的爪牙。这种思想模式与行为准则，最终成为封建体制的一种基因，为后世人打开了炼狱之门。这便是“儒表法里”的专制思想与制度之可怕处。乌台诗案只是一个普通案例而已。

书狱不以狱

在以上这些只为一己厚赏、不顾别人死活的人们集体努力下，“乌台诗案”狱成。当时，人们就

纷纷发问：东坡何罪？

东坡何罪？东坡并没有罪。但无罪怎样成狱呢？这就要靠专制体制中系统化的冤狱设计了。按照这种设计进行操作，便可使无罪变有罪，小罪变大罪，普通的一言一行到头来无一不成了反对皇帝、颠覆社稷的“恶攻”罪。近代进步思想家龚自珍曾云：

“古之书狱也以狱，今之书狱也不以狱。”书狱以狱，就是按照狱讼的实际情况去书写案情；书狱不以狱，便是离开事实与法律，阿附君主个人好恶，去罗织案情、枉定罪名。

据现存的有关史料，当时这些人“书狱不以狱”的操作手法，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是深文周纳，无限上纲。王珪见狱成，便抄了东坡的咏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唯有蛰龙知”，上呈神宗，说：“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另一业余打手李宜之，则对东坡《灵璧张氏园亭记》鸡蛋里面挑骨头。东坡文中有句：

“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李宜之批云：“天下之人，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轼独有‘必不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他并且把苏轼的这半句话，上纲成“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的杀头罪名。

二是无中生有或光扣帽子。它更易于操作，只要移甲作乙甚至向壁虚构就行。李定劾轼诗“或有燕蝠之讥，或有窦梁之比”，即是此类。按东坡原意，不过说燕以晨为晨，蝠以夕为晨，物性不同；不过说自己不愿如汉代学者马融、班固那样依附权臣梁冀、窦宪。但李定却移花接木，指轼为攻击神宗不知晨昏、将神宗比为听任梁窦专权的昏君。而较此更省事的，则是李定指轼有“可废者四”，光列四大罪状之名，而不实以事例。

三是以“过从交往”论罪。舒亶劾轼与人往来，过从甚密，是“公为朋比”。对于那些集中在苏轼周围、收受他讥讽文字的人，他向皇帝说：“可置而不诛乎？”此类定罪方法，颇能反映专制体制的“外儒内法”特色。韩非提倡“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舒亶则以为不破当时以苏轼为中心的一批诗人作家之“聚”，他们必将聚成集团、联盟，反对朝廷。

四是使被劾者“一倒百倒，一了百了”。他们先将苏轼在政治上打成“犯上作乱”，然后顺势把他在学术上批得一钱不值。他们平日妒忌东坡名高

但无由发作，此时便“合理合法”地一吐为快。舒亶上表说苏轼“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谬得富贵；李定更说他“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说他“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但“虚名浮论足以震骇众人”。反正一句话，苏轼其人不过是个假权威、真骗子而已，伪装应当剥去，流毒必须肃清。由政治而学术，正是“书狱不以狱”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以上操作，苏轼便成了反对皇上、颠覆社稷的社会公敌，不学无术、滥得高名的猥琐小人。这样的人不杀，又杀谁呢？何正臣云：“今法度未完，风俗未一，正宜大明诛罚以示天下。如轼之恶，可以止而勿治乎？”舒亶则云：“（轼）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应该“用治世之重典，付轼有司，以谢天下。”李定更以为苏轼仅四罪之一，就“按先王之法当诛”了。

所以可以说：不以事实为据，不按法律论罪，书狱不以狱，治狱不以狱，乌台诗案也。

本来，按照这种操作方法，苏轼是非掉脑袋不可的。后来幸而曹太后、吴充、王安礼竭力营救，神宗方卖个人情，说：“朕无他意，只欲召他对狱，考核是非耳，行将放出也！”苏轼得以脱身炼狱，重见天日——这是文字狱史上的一个例外。

东坡的襟怀

苏轼尽管出狱了，但当时封建士大夫主流社会对他仍有看法。固然，这些人并不赞成那些反复小人的“书狱不以狱”，但却认为东坡其人比起他们这些“正人君子”来，身上总少了点什么。或者不如说，总多了点什么。东坡历来抨击非理，放言无忌；一向挥斥评点，以诗忤物；虽然名高一世，但遍交田夫野老——他拥有的大多是越出封建规范的品质。早在诗案之前多年，常受苏轼谑困的王安石就说：“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宕至此。”名相韩琦亦早以东坡不够温存敦厚为憾，说：“苏轼学工，文学过人，然岂享大福德人也？”

在封建主流社会看来，东坡虽绝无诗案所书之“莫须有”罪，但却“确实有”其他错误；虽绝未欺君罔上，但却确有失正人身份。在他们看来，如东坡者，岂可不“从主观上总结总结教训”乎？

苏轼在《到湖州谢上表》中，反面文章正面写，

说自己“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在诗中也大写“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东海若知明主意，应叫斥卤变桑田”之类尖刻句子；并将此类“讥讽文字”广为扩散，书赠友好。但说到底，这些只不过是他发挥个性，坚持独立思考、爱好自由交流思想而已。可是这在儒表法里的专制体制下，却处处犯忌。这同先秦法家所谓“愚者畏罪不敢言，智者无以讼”的“无辩”社会，同“欲为国，必伐其聚”的专制思想，都是尖锐对立的。

北宋当时，固然尚无建立在商品经济大发展基础上的对自由平等独立精神的追求，但也不能说毫无这种思想的萌芽存在。甚至在主流社会中，也不乏不将言语、写作、交友、发挥个性当作罪行的人。张方平、范镇营救东坡的表中，就明确表示不要把文学创作与讥谤犯上混为一谈。王安礼也从容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罪人。”甚至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告诫孙子：“据至于诗，其过微矣，宜熟察之。”

东坡身上这种“多出来”的东西，正是他的优点与应有的权利。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一个诗人，正合本色。现代有些论者，如林语堂，因此径称苏轼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古代人”，认为他的思想模式与行为准则超出了北宋时代的。

东坡在台狱中，在贬地黄州，虽曾一再说“白发累臣正坐诗”、“平生文字为吾累”、“自笑平生为口忙”，甚至“醉中狂言醒后怕”；但另方面却仍然宣称“试拈诗笔已如神”，一出狱就挥斥自若，吟咏不辍，大写“如今风俗那堪画，县吏敲门夜捉人”之类抨击现实阴暗面的作品。到黄州后，他一头沉到下层社会中去感受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还“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不以为忤，反以为喜。他以儒家“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传统观念，学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学战国处士颜蠋“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的居贫方法，甚至还辟黄州东坡荒地数十亩种麦自食。他按儒家“达则政事，穷则文章”的传统，自觉对社会承担更大的文化责任，专心著述与教学。他在给文同信中云：“念有生之归尽，虽百年其必至，唯有文为不朽，与有子为不死。”他视读书教学为穷困中的

至乐，以创作自娱为回归自我，说“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

于是，坡公终于如南宋王十朋所谓“再闻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奇”，在黄州推出了他文学创作的高潮。这对苏轼终于以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个能够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师形象出现于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乌台诗案，是一次体制与灵魂的大展示，人说没有赢家。

苏轼没赢自不必说。

成狱的“积极分子”们也并没有赢。他们虽一时升了官，但后来命运个个不济。舒亶仅以“受厨钱越规”（即公费吃喝过度），而追两官，勒停，正好与坡公黄州之贬所受处分一样。蔡确更以他的车盖亭诗，被仇家“笺释以闻”，说他用武则天影射高太后，以至流放岭南。李定与沈括也仕途不济，在苏轼贬而复擢后，抓住他过青州、镇江的机会，极尽趋奉、弥缝之能事。而张璪则落得个“天下共知其为大奸”的结局。

最高统治者也没有赢。乌台诗案不仅暴露了表面雍容熙和而内里刀枪剑戟的封建专制体制的可怕，也暴露了人们互相“告讦”“举报”以将对方推入炼狱的灵魂的黑暗。乌台诗案开了朝廷各派以兴狱打击对手之端。以后，不是甲派流放乙派，就是乙派流放甲派，互相攻击对方为“小人”为“奸党”，造成朝中真正的奸佞当道的局面。于是外敌便乘虚而入，金人占中原，陷汴京。其后赵家子孙，一改“抗金”方略，偏安东南，到成为“销金锅儿”的杭州西湖“销金”去也。

那么，诗案真没有赢家了吗？不，有！真正的赢家可能还是苏轼，不过不是作为北宋官员的苏轼，而是作为文化大师的苏轼。他在这一诗案中及其前后，展示了他的浩然正气，展示了他的灵魂，使当时与后世人懂得什么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他的最好的作品，绝大多数写于这次荆楚之贬与以后的岭南、海南之贬。没有这三次放逐便没有文化大师苏轼。这对于中国与后人来说，固然是幸事；但对于东坡与他的家人来说，又是什么呢？毕竟生命对一个人来说只有一次啊！

我不禁掷笔三叹！

（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温州大学兼职教授）

探索湖州风暴 与儋耳海啸的远因原由

江澄格

内容提要：北宋末年，由于政见不同，形成两个阵营，革新者主张“富国强兵”。保守者强调“民富国强”，前者以强国为先，后者以养民为重，两派阵营对立，朝政左右摇摆，苏东坡于是做了挡箭的靶子，被投进御史台监狱。时过已近千年，试就控告所提罪状作重点呈现，想要为“乌台诗案”翻案平反诚然不足，但可以释注部分存在于盲点阴影之下的疑点与诬陷。

关键词：百日冤狱 乌台诗案 黄州养晦 惠州自省 僮州厉炼

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首用字简洁、意涵深远、风格别致的六言绝句，是北宋末年苏轼自海南历劫归来，游金山寺，见壁上李龙眠所绘他的画像，即兴濡墨挥毫，题诗一首于画上，以增其趣。至南宋干道年间右丞相周必大，在他所著《奏事录》中，也收录刊载有这首诗作。现在坊间仍旧可以见到这首诗的石刻拓本。

诗的末句用三个地方署衙地名，也是当时所用的一般通称，常被看成是这首诗作最明显的特色，许为难得一见的表现方式。其实三个地方，若是论其功名事业，都不是最有成就、创有政绩、树有官声的衙署，根本就谈不上建功立业。反而是历经这三个地方在身心上的考验，与三个长短不同时段生活和精神上的淬炼，这是他终其一生绝对印象深刻

不容忘怀之地，也是他累仆累起，站起再又迈步向前新的起点。不独是时常唤起他的回忆，同时用为自己言行的警惕，所以在字里行间见不到自大自夸的语气，而是用自我反省谦卑的笔调。为他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作了一个应该说是：咸谓公允堪称妥切的总结，但并非定论。

试看他初次所遭遇到几乎性命不保，贬谪黄州的起因与经过，应该是研究苏东坡的学者，一直在努力不懈，从未间断过的工作。

近千年以来，为文坛一致所尊崇的全能文学大师苏东坡，是被社会大众谈论得最多，可是知道得却是相当有限，尤其是关系着他一生毁誉的黄州流放和儋耳远谪。

“乌台诗案”是宋代政策路线斗争最具体的一个实例，对苏东坡一生的历程有绝对性的影响作用。缘起于元丰二年三月，苏轼奉命自徐州移知湖州，按照往例常规，到任就职后应上表谢恩，苏轼也不例外，上《湖州谢上表》：

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①

监察御史何正臣就谢表所书文字，断章取义，摘录其间部分字句再以一己之意加以曲解，凭空捏造并妄下论断，从而诬谪谢表之中明显含有对皇上不敬之意、对朝政不满之词，指责苏轼：

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为，道路之人，则又以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于新法，喜功颜色，惟恐不甚。

今更明上章疏肆为诋毁，无所忌惮矣，夫出而事主所怀如此，世之大恶何以复加；昔成王戒康叔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不可不杀。盖习俱污陋，难以丕变，不如是不足以作民而新之，况今法度未完，风俗未一，正宜大明诛赏，以示天下。

如轼之恶，可以止而勿治乎？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伏望陛下特赐留神取进止。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垂拱殿进呈。②

何正臣：宋新淦人，字君表，九岁登童子试及第后又登进士第，元丰初因蔡确荐举，为御史里行，遂与舒亶、李定论劾苏轼，得五品服领三班院，历任吏部侍郎，铨拟多有抵牾，事闻于朝廷，则以法制未善为解，寻辞加以搪塞，王安礼曾在御前斥其推拆曰：法未善妥完备，有责之司，理所当请，岂得归咎于法。乃出知潭州，历刑部侍郎，因案出知宣州，卒于任上。

按：宋鸿儒陈振孙：江西吉安人，字伯玉，号直斋，端平中为浙西提举，曾在福建莆田为官，着有《直斋书录解题》，其间刊有《乌台诗话》十二卷，为蜀人朋九万所录东坡下御史狱公案，附以初举发章疏，及谪官后表章书启诗等而成之者集中所载：《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劄子》，应为何正臣，《宋史新编》柯维骐著，列有何正臣传，但无何大正之记载，料系笔误或侵版者之失。

由于主张“富国强兵”那些人，早已把着眼在

“裕民强国”的苏轼，视为反派当作公敌。古谚有谓：“一犬吠影，众犬吠声”，何正臣是继太子中允集贤殿校理权监察御史舒亶早在同年一月二日就在崇政殿上过一道奏疏，他是首先指责苏轼的先驱者。

舒亶：宋江西慈溪人字信道，善诗文，试礼部第一、调临海尉。御史张商英称其材，用为审官院主簿，迁奉祀郎。时有福清人郑侠字介夫，王安石知其名擢为进士，官光州司法参军，侠感为知己之恩欲图报，每上书言新法之害，侠乃绘所见之苦况为图上神宗，皇上观后颇为感动，乃诏罢新法，安石去职，吕惠卿执政新法复行如故，侠又上书论之斥吕为朝奸国贼，惠卿指为讪谤。亶承命往捕搜索得名臣谏草章奏论新法事，悉按姓名治罪，窜侠岭南，擢升亶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劾苏轼称：

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颂，忠义之士无不愤惋，且陛下自新美法度以来，异论之人固不为少，然其大不过文乱事实，造作谗说以为摇夺沮坏之计，其次又不过腹非背毁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无成而已。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謗慢骂而复无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好音，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诏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轼在此时以苟得之虚名，无用之曲学，官为省郎职在文馆典领寄任又皆古所谓二千石，臣独不知陛下何负于天下与轼辈？而轼敢为悖慢，无所畏忌以至如是……按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情理深害，事至暴白，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岂特在不收不宥而已，伏望陛下体先王之义，用治事之重典，付轼有司，论如大不恭，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不胜忠愤，恳切之至。

元丰二年一月二日崇政殿进呈奉。③

这个参劾的奏本，是在苏轼还在徐州知府任

内，由舒亶首先发难呛声。但是并没有发生立即性的效应，皇上御批：“送中书。”

继后又有国子监博士李宜之，也上了一道状纸，加以攻讦，听起来，也好像是不无道理，李宜之是这样说的：

昨任提举淮东常平，过宿州灵壁镇，有本镇居士张硕秀才称：苏轼与本家撰《灵壁张氏园亭记》内有一节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详上件文字义理不顺；言不必仕，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心，以乱取士之法，又轼言：必不仕则忘其君，是教天下之人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详此即知天下之仕与不仕不敢忘其君，而独轼有不必仕则忘其君之意，是废为臣之道……显涉讥讽乞赐根勘。①

继后于七月二日又有时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的言官李定，也应声而吠，随声附和，上了一道言词狠毒，极尽诬蔑的劄子：

臣切见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及上圣兴作新进仕者，非轼之所合，轼自度终不为朝廷奖用，衔怨怀怒，恣行丑诋见于文字，众所共知，或有燕蝠之讥，或有窦梁之比，其言虽属所憾，其意不无所寓，讪上骂下，法所不宥。臣切谓轼有可废之罪四，臣请陈之：

昔者尧不诛四凶，而至舜则流放窜殛之，盖其恶，始见于天下。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稍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此一可废也。

古人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而傲悖之语日闻中外，此二可废也。

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辩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坚，言伪而辩。行伪而坚先王之法当诛。此三可废也。

书刑故无小知而为，与夫不知而为者异也。轼读史传，岂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谋，肆其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庆奖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恕不用己，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此四可废也。

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臣伏惟陛下动静语默惟道之从，兴除制作肇新百度谓宜可以于变天下，而至今未至纯著，殆以轼辈虚名浮论，足以惑动众人故也。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其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且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有补于世，岂细也哉，取进止。

元丰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进呈奉。②

经御览批示：送御史台根勘闻奏。

这本劄子，辞锋犀利无比，锐不可当，拣字用词，皆有独到之处，但多用的是一些强词，故难免失之夺理，原因是：李定在为王安石喊冤鸣屈，因为李定是由王安石一手提拔起来的。

李定：宋江苏扬州人，字资深，少时受业于王安石门下，嘉祐进士，历秀州判官，熙宁初，孙莘老知谏院荐之，召至京师，王安石立即委命任用，遂拜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后因庶母病逝，恋爵不服母丧未辞官守制，被曾公亮举发，御史薛昌朝进言“不宜以不孝之人，居劝讲之位”，于是去崇殿说书之职。元丰初，又召为宝文阁待制同知谏院，知制诰，而兼御史中丞，劾苏轼湖州谢表，对上侮慢不敬，逮赴柏台系狱，拿问终无实据，却又贬窜下放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或许是苏轼在劫难逃，流年不利，但也是他命不该绝；逢慈圣光献曹后不豫祈福赦囚获释，得以保住一命。自始至终李定都参与其事。

历史的悬案，很难求得真相大白，要翻历史的旧案，加以平反，也绝非易事，少有人具有这种功力本事，对于这种找不到结果的事有兴趣的人，本来就不多，因此，许多存在的事实尽管照章原本保留下来，只要稍加拼接组合就会另行陈现出一个新的具象，具备了一个新的形态外观，让所有的见证者，产生不同于往昔，而又更深入并且更真切的观感。就“乌台诗案”而言，若是从另外一种角度，

以绝对超然客观的立场，或者是着眼在史料所保留下来的相关数据来看，这件历时已近千年，根本不属于官衙诉讼程序的案件，早已被历来的社会大众，视为历史公案来看待：对于这件以“讥讪犯上、伤教乱俗”的重大案，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向来谈论其事的人不少，可是详知其来龙去脉尽知其实情底细的人，并不是太多，因为可供参考能提供线索的现存数据实在有限，获得更是不易，现存常见的信息，则是可信度不足多有可疑。

与苏轼同一时代，而与苏氏兄弟皆有深交，极为契合并且时有往来的人，也是受到“乌台诗案”牵连，列名“党人碑”之首的王巩：字定国，自号清虚居士，山东省莘县人，有隽才，工诗善文，从苏氏昆仲游，苏轼因诗获罪，巩亦贬宾州，数岁始得还，以跌荡耿介，着有《闻见近录》、《随手杂记》、《甲申杂记》等书。他是工部尚书王素的儿子，王素曾任成都知府，与欧阳修同在谏院任谏官。王巩颇有父风，论人是非，不计个人利害；在他的翰墨之中，就留有真“迹”实话，转述了李定当时所说过的几句“良心话”；王巩在他所写一本名其为《甲申杂记》载有：

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从班，李定资深鞠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已。”⑥

苏轼受命担任新职，于赴任途中被捕就逮，是前所未有的奇闻，自然是震惊朝野上下百官，民间彼此之间也多所谈论，多有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具有相当程度的佐证价值，文字的作者留下翰墨，也多少是具有留存后世作为实据的意味，试看曾任惠州别驾孔平仲所撰《谈苑》一书之中，对苏东坡被追捕就擒其经过情之略述，指称：

苏子瞻随皇甫僎追摄至太湖鲈香亭下，以柁损修牢；是夕风涛倾倒，月色如昼。子瞻自惟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

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窄身入水，则顷刻间耳。既为此计，又复思曰：“不欲辜负老弟。”言已有不幸，子由必不独生也。由是至京师，下御史狱。李定、舒亶、何正臣杂治之，侵之甚急。欲加以指斥之罪。子瞻忧在必死，常服青金丹，即收其余，窖置土内，以备一旦当死，则并服以自杀。有一狱卒，仁而有礼，事子瞻甚谨。每夕必然汤为子瞻濯足。子瞻以诚谒之曰：“轼必死，有老弟在外，他日托以二诗为诀。”狱卒曰：“学士必不致如此。”子瞻曰：“使轼万一获免，则无所恨；如其不免，而此诗不达，则目不瞑矣。”狱卒受其诗，藏之枕内。后子瞻谪黄州。狱卒曰：“还学士此诗。”子由以面伏案不忍读也。既出，又戏自和云：“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既作此诗，私自骂曰：“犹不改也。”⑦

《谈苑》紧接着在后，对皇上睿智天聪宽厚臣下，又有所赞颂：

皇甫僎追取苏轼，乞逐夜所至，送所司案禁，上不许。以为只是根究吟诗事，不消如此。其始弹劾之峻，追取之暴，人皆为轼危。至是乃知轼必不死也。其后果然，天子聪明宽厚，待臣下有礼，而小人迎望，要为深刻，如僎类者，可胜计哉！⑧

如果御史台谏那些指摘苏轼“讥讽时政，讪上不恭”的言官，当时有所警觉，或者是智虑所能顾及，是不可能让“乌台”这两个含有相对讽刺意味，几近侮辱语气的名辞，用在像这样一件重大案件上，并且大明其白地用为案名：主要的原因是黑白二字原为五色的名词，两者合用是相对辞，代表的意涵是指事情的“是非错对”而言，成语有“真相大白”，对话谓“对白”，自述为“自白”清廉洁身自好曰“清白”，自汉代以来，御史府中即规定列种柏树，用励廉能清白的情操，后世遂名御史台为“柏台”，又称“柏府”《燕子笺开试》载有“森森柏府晓风寒”。及至清代按察史亦称“柏台”，沿用至今，监察院以及肃贪防腐的机关和官员，仍被大

众传播媒体据古时旧名而称之为“柏台”。所以“乌台诗案”采用此名作为纠举苏轼诗作指其为讪上讽政案件的名称，其本意原来就含有相当浓厚的讽刺意味，也是极尽调侃戏谑的诮词谤语，长时以来常出自大众口头，时至今日，在闽南语系以及同属一个语言系统的台湾话当中，仍旧还通用流行着“乌白讲”这样一句意指言不及义“乱讲不通”、“胡说八道”的俗语，若是拿来与“乌台”一辞作一对照，“鸟”字其意涵究竟是甚么，自然就更明显了。

《国语周语》有谓：“众口烁金”。异口同声所讲的话，无论是真是假对于接受讯息的人，在信念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久已醉心图强热望革新，并且信赖王安石入迷的神宗皇帝赵顼，当然也不例外在所难免，其人亦正如其名，贪得而无所获，因为《庄子·天地篇》，早就这样说过，果然就应验在神宗身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部名著谈论的重点多是治道，就是为这位皇帝写的，也是特别写给他看的，更是他在位执政时期（元丰七年）完成的，但没有看完全书，他便驾崩了，留给后世的遗憾：是他把前后劾奏苏轼的四个劄子，亲手批给：“送御史台根勘闻奏”，于是造成了“京师百日冤狱”、“黄州五年流放”的“乌台诗案”。

根据孔平仲在他所撰《谈苑》中的描述，重现了苏东坡被逮的经过与现场概况，让阅览者有目击耳闻的临场感，侧身其间的自觉性，例如：

苏轼以吟诗有讥讪，言事官章疏狎上。

朝廷下御史台差官追取。是时李定为中书丞，对人叹息，以为人才难得，求一可使逮轼者少有如意。于是太常博士皇甫僎被遣以往。僎携一子二台卒倍道疾驰。驸马都尉王诜与子瞻游厚，密遣人报苏辙。辙时为南京幕官，乃亟走作往湖州报轼，而僎行如飞，不可及。至润州，适以子病求医留半日。故所遣人得先之，僎至之日，轼在告，祖无頫权州事。

僎径入州厅，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狞恶，人心汹汹不可测。轼恐，不敢出，谋之无頫。无頫云：“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轼议所以为服，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无頫云：“未知罪名，当以朝服见也。”轼亦具靴袍秉笏立

庭下。无頫与职官皆小帻列队轼身后。二卒怀台牒，柱其衣若匕首然，僎又久之不语，人心益疑。轼惧曰：“轼自来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始肯言曰：“不至如此。”无頫乃前曰：“大博必有被受文字？”僎问谁何？无頫曰：“无頫是权州。”僎乃以台牒授之，乃开视，只是寻常追摄行遣耳。僎促轼行。二卒卒就扎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此事无頫目击也。◎

这种处置决定，也正是后续发展的转捩点，问题的关键所在：倘若神宗并不是那么醉心于“革新”，头脑稍微清醒一点，未曾全然被王安石一伙所蒙蔽，能体会到事关重大，不容稍有轻忽的警觉，自始就将这四本无中生有的劄子，断然压了下来“留中不发”，虽非就此天下太平，但最起码会暂且平息无事，不致于满朝闹得如此沸沸扬扬，喧哗不堪，给自己（神宗）留下一点徐图善对的空间，也让那些急进激动的狂热分子，也有一段冷静下来的时间，果能如此，“暂不发落”有了一段缓冲的时空，则以后事件的发展，可能就完全不同，自当另作别论了。

可以断定的就是：苏轼定然不致因案身系大狱，遭受到百日监禁，枉蒙莫须有的冤狱之灾；大牢之中挣扎于生死边沿，求生于存亡之间，身心饱受折磨精神深受打击，狱中痛苦惨况，岂是监牢之外所能尽知，断非过来人，所能言其惨况于一二，再加之时长多达百日历时已逾一季，真是汴京最长最难熬的一个严冬，苏轼却在待决重犯的黑狱中，悬念苦等，急盼当朝是生是死的判决。其内心之中的煎熬，精神的痛苦，实为笔墨所难以形容。

这是当时详知本案内情，或是略闻其事的有识之士，一致的共识，同样的也是后世但知苏轼其人，而不知其事的社会大众，普遍怀有的同感。被释放出狱之后，正好是在岁末年暮，奉旨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于十二月二十九日首途上路，从汴京赶赴黄州责管衙门报到，以免旅途之中因故耽误行程再生枝节，于是拖着全家在路店客栈之中，送走了一个凄清而又充满惊险的除夕，也迎来了不知何去何从一

个崭新的未来，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新年，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居住在定惠院，开始了有身以来从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自耕而食”的农耕生涯，恬然自得地务于农事，心甘情愿地作个称职的农夫，真正的步着陶渊明的后尘，自享田园之乐；从原来以翰墨为务的儒人，转变成以耕为业的农夫，安顿之后，他安之若素地写下留传千古的《寒食帖》与《赤壁赋》。

直到元丰七年，也就是在司马光上《资治通鉴》的同一年，神宗在谕示：“国史大事，可命苏轼主编”，没有结果之后，觉察到事件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单纯，必须讲求一点技巧策略，才能避免外界和相关部门的干扰与不必要的阻挠；于是神宗亲自下了一道“手诏”，又称“皇帝手札”，也就是御令交办的事项。这道手谕是这样写的：

告下黄州，特授苏轼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为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以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忏悔之心殷切，法教无非规过重励自新。况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一任荒废咸非所宜。

幸蒙圣恩不究，得以免罪脱困，苏轼内心之感激，真是深铭五衷，无以名状，所以他在《谢量移汝州表》中称：

稍从内迁，示不终弃，罪已甘于万死，恩实出于再生，只服训词，惟知感涕……臣向者名过其实，食浮于人……旋从册府，出领邵符，既无片善，可纪于缘毫，而以重罪，当膏于斧钺，虽蒙恩贷，有愧平生。⑩

像这样一位赏识其才华，而又宽恕其过错的皇帝，是苏东坡一生难以再得的机缘与恩典，可是不幸神宗英年早逝，于元丰八年八月驾崩，享年三十八岁，在位十九年。继由年龄不过九岁的幼帝赵煦嗣位，庙号哲宗，苏东坡曾经担任过迩英侍读，与哲宗有过一段时间的师生关系，但是并不是十分融洽，两者之间存在有一些误解；原因是哲宗把太皇太后早时严加管束，与长时听政等诸般的怨懑，都归罪于负责教导、身为侍读的苏轼，都记在他的帐

上，一旦有机会让他这位正值“轻狂”年代的皇帝，一吐心中积怨的时候，自然就随之张口吐出心头的不快，其实哲宗早就有意将苏轼外放，免得他在身边遇事都有意见徒生事端，当其在争论失据，无言以对情绪失控的气头上的时候，曾经亢声说：“把他（苏轼）放出朝廷，放得越远越好。”以后所发生的“儋耳海啸”，未尝不是源自这一发生在京师强烈地震所产的效应；一波接一波的狂涛巨浪连接起来，将他一直冲击到南疆的尽头，远飘到国土边界才停下来。识者不禁要问：苏东坡究竟犯了甚么滔天大罪，以致非得置之于死地不可，并且穷追不舍步步紧逼，迫其走上穷途步入绝路，其手段之狠毒，较之“乌台诗案”更毒辣，也更“乌龙”的事件，当时朝野，少有人知个中内情，以致后世社会也就更是难以了解实际的真相实况了。不过“难以了解”并不等于无法了解。

过去有人认为，现在也有人具此同感，说是：苏东坡自元祐八年九月十四日奉诏以端明侍读二学士被贬出知定州，继而在第二年（绍圣元年）复又奉谕：落两职追一官知英州。还没有到职上任，再又奉命贬谪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因而得暂时栖息于惠州，寄居两年之后，时在绍圣四年五月再贬，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昌化县属崖州隶琼州府（在海南岛东为珠崖西为儋耳），地近东南国界绝域孤岛，地瘠民贫，物质奇缺，再加之以逐臣贬官，位卑薪低，生活更是艰困，正如他在到达之后写给友人的信《答程大时书》见明郑瑄着《昨非庵日纂》卷九）中所说的：“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极尽生活之困苦。凡此种种造孽，步步迫害；无不是章惇一人一意所为，一心而行，也是他一手所造成。原因是：章惇心中暗藏着一个鲜为人知，更不愿人道，而为众所不耻的身事，长时以来，章惇都是在设法掩饰尽可能地否认规避，倾全力防止朝野之间与街头巷尾谈论，讳之犹恐不密，防之惟恐不严。希望能杜悠悠众口于不言之中；借时间的消逝星斗的位移，来冲淡过去存在的事实，渐至消灭于无形。

可是没有料到苏东坡竟然在不经意之间，触碰到章惇那一根最敏感的神经，棘刺到最脆弱的痛处。不过对于这件“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意外，苏东坡可能全然不知，或许是终其一生也未觉察到

的失误过错，因为误解的造成，是缘于章惇对苏东坡和诗的错读误解而起，因为在诗句之中，存在着一些启人疑窦的用辞，与另有所指的字句。

被后世解读为造成苏章二人友谊绝裂，从而演变成两者同受其害的诗，是由于熙宁八年十月，因御史中丞邓绾举发接替王安石为相的吕惠卿在江苏省松江县的华亭买田置产，贪赃营私，吕被撤去其相出知陈州，章惇以同党被牵连坐，论其与吕同恶，贬为湖州太守。就任视事之后，曾经给苏东坡写过一首《出守湖州》的七言古诗，对当地的景物有所描述，就他自己的心情也略有着墨，显然有些心灰意冷思归求退的念头，流露于笔下，存迹于纸上，诗是这样写的：

君方阳羡卜新居，我亦吴门葺旧庐。
身外浮云轻土苴，眼前陈迹付籧篈。
涧声山色苍云上，花影溪光罨画餘。
他日扁舟约来往，共将诗酒狎樵渔。①

自古以来学者仕人的交往，其关系的亲疏远近，尝以书信往还的密度来衡量，诗作的酬答唱和，是礼节上的需要，也是友谊浓淡的一种量度显示，苏轼有《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②：

方丈仙人出森茫，高情犹爱水云乡。
功名谁使连之捷，身世何缘得两忘。
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
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
——其一
绛阙云台总有名，应须极贵又长生。
鼎中龙虎黄金贱，松下龟蛇绿骨轻。
雪水未浑缨可濯，弁峰初见眼应明。
两卮春酒真堪美，独占人间分外荣。
——其二

王明清：宋汝阴（今安徽阜阳县）人，字仲言，官至朝奉郎，善文工诗有史才，著有：《挥尘前后录》、《挥尘三录》、《清林诗话》、《挥尘余话》等书。弥足供史学研究者作为旁证引据，颇富参研考证价值，少有不经怪诞之说与穿凿附会之辞。在《挥尘余话》卷一载有：

章俞者，郇公元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产之时，杨氏欲不举，杨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贮水，缄置其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既长登第，始与东坡缔交。后送其出守湖州诗，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犹爱水云乡。”以为讥己，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无恙。尝犯法，以年八十勿论。事见《神宗实录》。绍圣相天下，坡渡海，盖修报也。所谓“燕国夫人墓，独处而无祔”者即杨氏也。（章房仲云尔）③

另外在《吴兴备志》当中，也有相关的资料记载，谨一并录记供参：

惇任湖州太守，尝以诗寄东坡，坡用其韵和之，子厚得诗，不乐数日。

这些相关资料分别留存在当时不同的文献之中，后世则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另作不同的解读诠释：

盛清乾隆年间，王文诰：字见大，浙江仁和人，善文工诗，著有《韵山堂集》与冯应榴合作辑注《苏轼诗集》，他在这部书的卷十三，提出了他自己从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也设定了别有论点的议题；认为以上所称各节，不无值得商榷之处，据他个人的观点，或者说是判断，他是这样说的：

“诰案”：公如知有其事，惟当怜惇之不幸，何忍揭其所生，且公陷台狱，惇力解之，公谪黄州，惇力劝之，凡此皆可明惇之心，不得以元祐国是为雠，而牵涉之也。此乃元符以后受惇害者，特扬其丑，借公为传播地耳。惇父子固不足惜，但公自海外还，闻惇谪雷，惊叹弥日，且嘱黄师是开慰其母，以是知必无此心矣。本案凡论元祐变法党患诸事，皆悬衡以待物之轻重，非衡之自为轻重也。衡失其平，虽忠贤典奸邪同科，不能稍为宽假，与此事正相类。④

较王文诰为时稍早的查慎行，海宁人，名嗣琏，字夏重，性颖异工诗善文，康熙进士授编修，著作甚丰，有《周易玩辞集解》、《经史正为》、《江南通志》、《敬业堂集》以及《苏诗补注》等书。由这些著作来看，可见他是一位着重考据的鸿儒，不会轻断是非遽下定论的读书人。他在《苏诗补注》一书中曾指称：“于公（轼）人品心术，殊有关系，不可诬也。”查慎行呼吁世人：必须慎重看待苏东坡和诗的真义，而不是章子厚身事的真伪。这种持平之论，是颇有见识的指点与提示，追求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的精神，实属难能。

基于查慎行典王文诰二位同为盛清时代，先后享誉康乾时期文坛人物的论点，再向外扩充作其它方面的求证：另据翁方纲所著《苏诗补注》也载有一段相关的文字：

鄂县草堂寺，留有石刻。其内容有谓：
惇自长安至终南，谒苏君轼，因与苏游楼观、
五郡、延生、大秦、仙游甲辰正月二十三日，
京兆章惇题。

后世之所以镌刻留了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是希望能永志不忘故而立碑纪事，原因是苏东坡曾伴同章子厚到此一游，留墨是以资纪念，刻石则是在用志名人行踪，其经过概况大致如碑所记：时在英宗治平元年岁在甲辰（1064），当时苏东坡是以京官职称：大理寺丞，派地方政府服务；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知府是以严厉闻名的陈希亮。在这年的正月二十三日，苏轼邀同从洛来陕西的商州令章惇同游终南山大秦岭的风景名胜，游山玩水，沿途曾题诗十多首以记其行，其间有《仙游潭》：

翠壁下无路，何年雷雨穿。
光摇岩上寺，深到影中天。
我欲燃犀看，龙应抱宝眠。
谁能孤石上，危坐试僧禅？⑬

苏东坡自注曰：“潭上有寺二：一在潭北，循黑水而上为东路至南寺。渡黑水西，里余，从马北上，为西路至北寺。东路险不可骑马。而西路隔潭，

潭水深不可测，上以一木为桥，不敢过。故南寺有塔，望之可爱而终不可到。”

由此可见苏章二人之间的私交，不能断言说是如何深厚，最起码可以看得出来两者常有往还，对于仙游潭一行同游的经过实况，宋人曾慥在他所著的《高斋漫录》一书之中，有如下的叙述，对“仙游潭”这首诗提供了侧写：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同试永兴军进士，刘原父为帅，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甚欢，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学海类编》亦有刊载。东坡意谓：不惜己命，焉重人生。⑯

再从更深一层来看苏章二人的友谊，非仅只存在子瞻与子厚两人之间而已，同时更及于子由等文人雅士之间，因为在苏辙所著《栾城集》中，也载有《次韵李公择以惠泉答章子厚新茶二首》：

无锡铜瓶手自持，新芽顾渚近相思。
故人赠答无千里，好事安排巧一时。
蟹眼煎成声未老，兔毫倾看色尤宜。
枪旗携到齐西境，更试城南金線奇。
新诗态度靄春云，肯把篇章妄与人。
性似好茶常自养，交如泉水久弥亲。
睡浓正想罗声发，食饱尤便粥面匀。
底处翰林长外补，明年谁送霅溪春。⑰

根据这些在公务之外，属于个别人际关系私人来往的“诗”交，可以显示出苏氏昆仲与章惇的私交，应该是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深厚，并非仅限于一面之缘的泛泛之交，更何况章惇与苏轼在进士候选馆职的考试中又是同年同榜，因为有了这层关系，所以在“乌台诗案”案发的初期，章惇基于过去的

故谊旧情，替苏轼伸张正义说过几句公道话，也是人之常情顺理成章不足为奇的事了。

基于这些存在的种种事实，如果认为苏东坡被贬放至英州之后又再累遭放并且渐行渐远，竟然远至南疆之极的荒野。想置其于死地的罪魁祸首就是章惇。衡情而论，这种说法和认定是有待商榷，缺乏佐据的一种臆测，和不周延的推论。可是章惇却是个目无伦理心无道义，言行既无原则，遇事不择手段的强人，持此观点有此一说的人不少，其依据是：苏轼自元祐八年突然被谪，且累次遭贬，就是章惇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在相位掌国柄之际，一手所造成。

可以作为见证的佐据是：元祐七年岁在壬申苏轼在扬州任知府，朝廷以兵部尚书召还，不久迁礼部尚书，这是苏轼在仕途上步入巅峰阶段。能不次升迁扶摇直上，未必是件幸事，官运亨通有时会引人侧目，也免不了令人嫉妒，带来不少困扰，造成许多祸害；就在同年十一月又被迁任中书舍人任试馆职并直史馆，典进士试，策问的考题，分由试官拟呈三道，经御批定用苏轼所拟：“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苏轼缮正后躬自进呈内廷。但被程颐的得意门生时为左司谏大夫的朱光庭断章取义，从摘录字句加以笺注，举劾苏轼，上疏诬称：

臣以为：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为大，
汉文不足以比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
不测，宣帝不足以过也……今学士院考试官
不识大体……反以媿刻为议论……乞正考试
官之罪。

以诬蔑之词鸟有罪名指摘苏轼：“为臣不忠，讥议先朝：诽谤仁宗神宗两代先帝”之大罪。以文字曲解，陷诬罗织，驯至发展成学说的对立，学派的排斥，从而演变成党同伐异的群斗。朱光庭弹劾苏东坡的劄子，导引起尔后的学派攻讦，由于洛、濂、关、闽、蜀等学派，长时以来都是：各说各话，自是其是，但大致都归论在革新与保守两大主题之下，分属于两大阵营之中，各有不同的政见主张和明显的政治立场，由于意见不同难免有所磨擦，甚至冲突，在朝廷之上皇上面前自然就有权势之争，争之必定有胜负得失，随着斗换星移，局势有所转

变，形势也就随之有所消长。

章惇由王安石拔擢而起，受介甫知遇之恩颇深，所沿由的也是王安石坚持的“富国强兵”不惜民命的革新路线。因此，他在绍圣元年被任为宰相之后，便大力复行“新政”，于是在整顿朝政口号下，把元祐年间在朝任职的国柱重臣，先后削职降等有的则流放边远穷苦地区，意在铲除朝中异己，消除反对新政的阻力，其实章惇是借力使力，借朱光庭的刀追杀苏子瞻，直到儋耳，这也就是史家所称“元祐党人之祸”造成上百彦硕菁英蒙难被贬的种因基缘，亦即是先贤所谓：“政人所重者，利害；儒人持重者，是非。”章惇在相位，其所重所趋，自然是以利为重。

论文注释：

①、⑩、⑪张志烈等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8、2590、409页。

②、③、④、⑤《乌台诗案》，国家图书馆001586154，第3085、3087、3090、3092页。

⑥、⑦、⑧、⑨、⑩颜中其编注《苏东坡轶事汇编》，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62、57、56、56、18页。

⑪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0、651、651页。

⑫《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577页。

⑬陈宏天等点校《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12页。

(台湾著名学者、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客座教授)

苏轼由黄州至高安的行迹考

吴 健

内容提要：本文以宋人笔记、方志、族谱等为依据，考证元丰七年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期间建昌至奉新的行迹，以补孔凡礼《三苏年谱》之缺漏。

关键词：黄州 高安 行迹

元丰七年，苏轼由黄州量移汝州，四月离黄后，曾到江西高安过访弟辙。据《三苏年谱》所载，苏轼曾行经兴国军（今湖北阳新县）、庐山、瑞昌、建昌（今永修县）、奉新①。但在建昌与奉新之间的行迹，则渺不可考。

据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记载，苏轼曾行经修水②，但孔凡礼先生在《三苏年谱》中未采信该记载，理由主要是“自庐山至筠，由分宁迂回过大，无暇至彼”③。笔者在2008年拜访孔凡老时曾就此献疑，认为罗大经是南宋初年人，去坡公未为远，且又是江西人，这则记载怕是不能轻易否定。孔凡老说需得有新材料的发现才能定论，并鼓励我从方志和家乘等方面挖掘资料。而我此后也时时留心这个问题，现根据已收集的材料对苏轼在建昌至奉新的行迹考辨如下。

一、李常（公择）故居何在

苏轼此行有《书李公择白石山房》及《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诗④，白石山房是李常少时在庐山的读书处及藏书室，据诗注即为庐山含鄱口的楞伽院白石庵。后诗题云故居，则显见与山房别是一处。

《宋史·李常传》仅记载李常为南康建昌人，未详言其故居所在。根据苏颂的《龙图阁直学士知成都府李公墓志铭》⑤及王明清在《挥麈后录》所引秦观的《李公择行状》考察⑥，李常系唐宗室后代，其远祖李涛是五代名臣，入宋后曾任户部尚书、

封莒国公。对照“磨刀李氏宗亲网”的谱牒资料，李常的谱系出自永修的“磨刀李”，其聚居地在今永修县三溪桥镇横山村磨刀自然村⑦。此推测与苏轼在《过建昌李野夫公择故居》中指明的故居在“庐阜西南麓”的位置亦吻合。

如李常故居在此，则苏轼的行程并没有自瑞昌直接南下行经德安、南昌，而是折向西面（磨刀村在瑞昌西南，柘林水库北）。

二、苏轼曾到武宁

如苏轼经由磨刀村至修水，则必然经过武宁县。经查道光《武宁县志》，卷二十三载：“苏轼……尝访山谷于分宁，复由武宁如富川。邑西乡有三贤墩，以濂溪、东坡、山谷得名。旧有三贤堂，今废”。

需要指出的是，引文所云访山谷并不确，因黄庭坚在元丰七年由安徽太和令移监山东德州德平镇，其赴任的行程历历可考，岁初即已到金陵，然后北上，没有回修水的记载⑧。此外“复由武宁如富川”亦不确。苏轼是经富川（今湖北阳新）到高安，离开高安后，没有再回富川。

虽则如此，仍不可轻易否定此记载的史料价值。引文中的“濂溪”即周敦颐，曾任分宁主簿；而黄庭坚出入修水，多次经过武宁也自不待言，修志者云坡公曾到武宁，自应有所据。故苏轼曾到武宁，应属可信。

三、苏轼曾到铜鼓

据同治《义宁州志》卷二十六载，坡公曾行经铜鼓带溪，晤处士胡安鼎，并赠诗。志载：“胡安鼎，字调元，号傅岩……宋治平间自吴仙里迁带溪隐居。乐道不求闻达，爱山水之胜……行谊高洁，

一时文人硕彦慕之。宋神宗七年，苏颍滨谪任筠州税使，长兄东坡由兴国经分宁适弟迁所，闻公名，造庐信宿，谈咏欢洽，临别赋诗以赠。其首章云：带水清，泉石透。中有高人自在居，耳可洗兮齿可漱。今里有游苏巷”。

志未录苏轼赠诗全文，杨方箴先生在《铜鼓重见〈眉州苏子瞻赠傅岩公诗〉》一文中摘录了此诗全文⑨，据云是清《胡氏家乘》自《余蝶庄集》和元人抄谱残帙中辑录。另根据铜鼓县于1983年文物普查时在游苏巷发现的一残碑（碑现存于铜鼓秋收起义纪念馆，蒙铜鼓史志办惠赠笔者拓片影印件），亦收录此诗，惜漶漫不全，文字也有少异。另《宜春诗存》亦收录此诗⑩，文字也有少异。此诗未见诸苏诗通行诸本，是苏轼佚诗，为广其传，现以上述三个版本互参整理如下：

带水清，泉石透。
中有高人自在居，耳可洗兮齿可漱。
行穿曲巷瞻阿陆，喜见台峰出远岫。
我闻此间胡居士，陆浑家风今再覩。
有如庞公鹿门山，芳躅留宇宙。
又如严君富春溪，遁迹绝尘垢。
竭来过访道逶迤，山川好处烟云逗。
篮舆暂憩诣造门，竹马儿童欢迎候。
超超高轨挹风仪，气味仿若芝兰臭。
人生适志有余乐，为爵何须腰组绶。
蜀客馨欵企庚桑，一朝倾盖如故旧。
况复坐膝有文度，千里驹骝今在厩。
异时兰玉植庭阶，南郡冠盖绍华胄。
穷愁似我方轚轲，棲迟孰与君无疚。
安得飘然脱讥諆，旬日驭风希御寇。
遄行将慰陟冈思，歌子粲兮还予授。

带溪乡的“游苏巷”至今尚存，另铜鼓县有一名小吃叫做“东坡米果”，这也可以算作苏轼曾到过铜鼓的一个有趣的佐证。

四、结语

现在带溪至奉新县的公路为省道S308号，苏轼到了带溪后，大略也是沿此线路东行至奉新，然后南行至高安。

由苏轼的前后行迹来看，可以确定其曾到修水，《鹤林玉露》的记载真实可信。苏轼瑞昌至奉新之间的主要行迹为：瑞昌—永修—武宁—修水—铜鼓—奉新。

论文注释：

①、③孔凡礼《三苏年谱》卷三十四，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72~1483、1481页。

②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1页。“来苏渡”条云：“修水深山间有小溪，其渡曰来苏。盖子由贬高安监酒时，东坡来访之，经过此渡。乡人以为荣，故名以来苏”。来苏渡，在今修水山口镇来苏村。

④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二十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214、1220页。

⑤苏颂《苏魏公集》卷五十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841页。

⑥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页。

⑦磨刀李宗亲网页面，
<http://www.modaoli888.com/ldzy.aspx>，2012年4月9日访问。

⑧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44~151页。

⑨杨方箴《铜鼓重见〈眉州苏子瞻赠傅岩公诗〉》，《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第35页。

⑩苏轼《赠胡安鼎》，舒建勋主编《宜春诗存》，宜春市2012年内印本，第375页。

（广东亚太时代律师事务所律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

一点灵犀必暗通

——试论李商隐诗对苏轼词的影响

黄学义

内容提要：风格多样的苏轼对李商隐诗产生的类似“一点灵犀必暗通”（苏轼《南乡子》）的共鸣使其词受到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据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统计，苏轼词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方式包括集句、变化揉合其诗句及借鉴其词语等。苏词所涉及的李诗有艳情、咏物、无题、准无题诗等多种题材，有抒情、议论、描写等多种表达方式；艺术上有“辞采清丽，情韵双绝”者、“用白描”者、“实境与幻觉揉合交融”者等等，不一而足。正因为充分吸收了包括李商隐诗在内的诸多前代文学的思想艺术精髓，再结合时代特点进行自己的天才创造，所以苏轼不但有“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的词，也有“清丽纤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的词，而二者都显示了苏词的个性，都是词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关键词：李商隐诗 苏轼词 影响 以诗为词

自陈师道在《后山诗话》里评“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以后，人们对苏词争论很大，有赞之者，有批之者。但对苏词“以诗为词”这一特点，大家意见则基本一致。至于苏轼如何“以诗为词”，似乎还需深入探讨。而晚唐李商隐诗有向词移动的趋势，对后代词影响很大，故缪钺先生云：“义山虽未尝作词，然其诗实与词有意脉相通之处。盖词之所以异于诗者，非仅表面之体裁不同，而尤在于内质及作法之殊异。词之特质，在乎取资于精美之事物，而造成要眇之意境。义山之诗，已有极近于词者……盖中国诗发展之趋势，至晚唐之时，应产生一种细美幽约之作，故义山以诗表现之，温庭筠以词表现之。体裁虽异，意味相同，盖有不知其然而

然者。长短句之词体，对于表达此种细美幽约之意境尤为适宜，历五代、北宋，日臻发达，此种意境遂几为词体所专有。义山诗与词体意脉相通之一点，研治中国文学史者不可不致意也。”①刘学锴先生云：“词，作为一种具有严格音乐形式的抒情诗，它的成熟，本来就跟汲取五七言诗，特别是李贺一派主观化特征突出，内容风格绮艳的诗歌创作的经验密切相关。词在成熟以后，仍然不断地从五七言诗中汲取营养。由于多种原因，在很长时期内，词的风格一直以婉约绮丽为主，因此，李贺、温庭筠、李商隐等中晚唐绮艳诗风的代表也一直成为婉约词学习继承的对象。”②而风格多样的苏轼对李商隐诗产生的类似“一点灵犀必暗通”的共鸣就使其词受到李诗的广泛影响。据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统计，苏轼词有32处涉及李商隐诗，方式包括集句、变化揉合其诗句以及借鉴其词语等。苏轼吸收了李商隐诗的多方面优长，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表达手段，拓展了苏词的意境，丰富了苏词的内涵。而前人对此尚未作深入探讨，本文试图作一分析，欢迎专家批评指正。

—

苏轼有一些集句词，所集的都是唐人诗句，其中就有李商隐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对李商隐诗是关注的。如《南乡子》（寒玉细凝肤）③：

寒玉细凝肤吴融。清歌一曲倒金壶郑谷。冶叶倡条遍相识李商隐，争如。豆蔻花梢二月初杜牧。年少即须臾白居易。芳时偷得醉工夫白居易。罗帐细垂银烛背韩偓，欢娱。豁得平生俊

气无杜牧。

“冶叶倡条遍相识”，出自李商隐《燕台诗四首》其一《右春》：“蜜房羽客类芳心，冶叶倡条遍相识。”此系艳情诗。“冶叶倡条”，犹言野草闲花。刘学锴、余恕诚（以下简称刘、余）在《李商隐诗歌集解》中按：“四句追忆往昔陌上寻春。……四句盖谓，春光冉冉而至，春色遍布陌头，我之芳心，似蜜房羽客，冶叶倡条，遍皆相识，独伊人之芳踪，遍寻而不可得。”苏轼用之作词，亦属艳情类，情调则偏重“欢娱”。又如《南乡子》（怅望送春杯）④：

怅望送春杯杜牧。渐老逢春能几回杜甫。花
满楚城愁远别许浑，伤怀。何况清丝急管催刘禹
锡。吟断望乡台李商隐。万里归心独上来许浑。
景物登临闲始见杜牧。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李
商隐。

这一首词有两处引用李商隐诗，其中“吟断望乡台”，出自李商隐《晋昌晚归马上赠》：“征南予更远，吟断望乡台。”刘、余云：“或谓：……五六写别情，兼伤己之身世遭遇。七八则谓己将南行，而异日登蜀中之望乡台而吟诗，以寄去国怀想之情也。”“一寸相思一寸灰”，见李商隐《无题四首》其二：“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唐诗鼓吹评注》：“末则如怨如诉，相思之至，反言之而情愈深矣。”刘、余：“写幽闺女子风雨怀人之情思与相思无望之痛苦。……贾氏窥帘，宓妃留枕，或爱少俊，或慕才华，皆情之发乎中而不可抑制者，诚所谓‘春心莫共花争发’者也。我之‘春心’虽亦随春花而萌发，然屡次想望，屡次失望，直似香销而寸寸成灰，翻不如泯此春心为愈耳。诗虽千回百转，而终归于相思之无望；然于绝望之悲哀中，又复透出‘春心’之不可遏止与泯灭。”而苏轼虽怀瑾握瑜，但一生仕途坎坷，命途多舛，深感“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而今吟“渐老逢春能几回”，恐大才终无用武之地矣，可于心何甘？由“怅望”“花满楚城愁远别”“伤怀”“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等可见其羁旅思乡之痛。故苏轼与处晚唐“牛李党争”之尴尬境地、难展平生抱负的李商隐颇有共鸣之点。当然，苏轼并未指实所写内容，但正如刘、余评李商隐诗所云：“蓬

山重隔之恨，相思无望之叹，可望不可即之感，或亦略有所寓焉。惟此种寄托，只可于形象之总体自然联想，不可斤斤计较于字句比附。作者虽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正缘创作中有非自觉性之一面也。”因此，我们也可依“知人论世”及相关艺术原则，对苏词试作“同情之理解”。再看其另一首集句词《南乡子》（何处倚阑干）⑤：

何处倚阑干杜牧。弦管高楼月正圆杜牧。蝴
蝶梦中家万里崔涂，依然。老去愁来强自宽杜甫。
明镜惜红颜李商隐。须著人间比梦间韩愈。蜡烛
半笼金翡翠李商隐，更阑。绣被焚香独自眠许浑
(实为李商隐诗，苏当许浑诗用)。

本词引用李商隐诗达三处之多。“明镜惜红颜”，出自李商隐《戏赠张书记》：“危弦伤远道，明镜惜红颜。”刘、余谓：“写张妇伤离”“题曰‘戏赠’，而无寻常调侃戏谑之词。直似代张抒写离思。……或义山此时亦别偶孤居弘农，故抒情写景，均有同病相怜意趣。义山短篇五排，每有辞采清丽，情韵双绝者。此篇纯用白描，不用藻饰典实。”“蜡烛半笼金翡翠”，出自李商隐《无题四首》其一：“蜡烛半笼金翡翠，麝香数度绣芙蓉。”刘、余云：“金翡翠，以光线绣成翡翠鸟图案之帷帐。帷帐上部为烛照所不及，故曰‘半笼’。……或曰金翡翠指有翡翠图样之罗罩，眠时用以罩在烛台上掩暗灯光”“翡翠、芙蓉均为男女欢爱之象征。”又云该诗“用逆挽法，先从梦醒时情景写起，再将梦中与梦后（次联）、实境与幻觉（腹联）揉合交融，最后点明蓬山远隔，归结到远别之恨。”“绣被焚香独自眠”，出自李商隐《碧城三首》其二：“鄂君怅望舟中夜，绣被焚香独自眠。”刘、余云：“腹联描绘欢爱之情状。”“此三首究系自叙艳情，抑从旁观角度写女冠艳情，不易确定。细味之，似含讽意，则自叙艳情之可能性较小。”苏轼借用唐诗来构造词的意境，所写内容当然不可能完全相同，但他对所引唐诗思想艺术之优长进行咀嚼、吸收自是不言而喻。尤其李商隐诗因“辞采清丽，情韵双绝”、“用白描”、“实境与幻觉揉合交融”、“任主观的内向化，取象的内心化，以及意象组合的非逻辑化”等卓越技巧而形成的“深婉朦胧”⑥的风格应为苏轼格外重视，不然不致在一首词中引用三处。至于苏轼此词所表达的具体内容，则不易，也不必指实，然可作大略之

解。观“蝴蝶梦中家万里”“老去愁来强自宽”等语似久处迁谪之地、年老思乡之作。作者羁旅“万里”之外的异地，乡愁无限；且岁月不饶人，辗转漂泊之中，不觉已经“年老”，而愁却更深，欲强自宽解，又何其难也！梦里总算得以与家人团圆，往日之幸福场面俨然又在眼前，但梦醒之后则平添更多的孤独。

金王若虚云：“山谷最不爱集句，目为百家衣，且曰：正堪一笑。予谓词人滑稽，未足深诮也。山谷知恶此等，则药名之作，建除之体，八音列宿之类，犹不可一笑也？”（《滹南遗老集》卷三九《诗话》）明沈继飞云：“二词（指‘寒玉细凝腹’及‘怅望送春杯’）遇铁堪铸，不露一痕”“是词非诗而实诗，尊诗而贬词者合作何解？”（《草堂诗余别集》卷二）潘游龙云：“二词熔铸之妙，几夺神功。”（《精选古今诗余醉》卷七）卓人月云：“集句有六难：属对一也，合韵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题四也，意思接续五也，句句精美六也，其谁兼之？”（《古今词统》卷八）可见，苏轼集句词曾受到不低的评价。而在其现存三首集句词中，苏轼共引李商隐诗六句，占所引11位唐代诗人24句诗的四分之一，足见苏轼对李商隐诗关注程度之高。

二

仅从上述集句词即可看出，苏轼对李商隐诗是仔细琢磨过的，李商隐诗的巨大成就对苏词有不小影响。当然，这种影响不只限于集句词；我们从苏轼变化、揉合李商隐诗句入词的情况可以进一步看到，如《南乡子·沈强辅雯上出文犀、丽玉作胡琴，送元素还朝，同子野各赋一首》⑦：

裙带石榴红。却水殷勤解赠侬。应许逐鸡
鸡莫怕，相逢。一点灵犀必暗通。何处遇良工？琢刻天真半欲空。愿作龙香双凤拨，轻
拢。长在环儿白雪胸。

“一点灵犀必暗通”，指两心相通。语出李商隐《无题二首》其一：“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刘、余云：“‘身无’一联，谓彼此身份虽不能相亲相接，效彩凤之双飞，心则固如灵犀一线，相同相应。”苏轼深味“无”“有”之意，化为“一点灵犀必暗通”，可谓妙！

宋神宗熙宁七年甲寅（1074）九月苏轼作此词作于湖州。张子野与苏轼此词同时作有《南乡子·送客过余溪听天隐二玉鼓胡琴》，即能证明题目所云“同子野各赋一首”。但苏词具体内容似不易指实。不过，据词中“裙带石榴红”“一点灵犀必暗通”“长在环儿白雪胸”等语来看，则词中有男女情意深沉、心心相印这一层意思可无需怀疑；而李商隐《无题》诗对苏词造境、抒情的影响亦足令人吟味。其准确解者，则恰是苏词化李商隐诗“深婉朦胧”艺术特色之成功处。毕竟文学本是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是艺术，而非简单等同于科学。又如《诉衷情·琵琶女》⑧：

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分明绣阁
幽恨，都向曲中传。肤莹玉，鬟梳蝉，绮窗
前。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

此词于熙宁七年（1074）十月作于润州。“小莲”，《北史》卷一四《后妃传》下：“冯淑妃名小怜，大穆后从婢也。……慧黠能弹琵琶，工歌舞。”“小莲”即“小怜”。“素娥今夜，故故随人，似斗婵娟”，“素娥”，嫦娥，常代表月。“故故”，常常，频频。“婵娟”，姿态美好貌。语出李商隐《霜月》：“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主霜雪之神。纪昀评《霜月》曰：“首二句极写摇落高寒之意，则人不耐冷可知。却不说破，只以青女、素娥对照之，笔意深曲。”（《诗说》）姚培谦：“从无伴中说出有伴来，如此伴侣，煞是难得。”（《李义山诗集笺注》）刘、余：“此诗特点，在于不对秋夜霜华月色作静止刻画描绘，而着重抒写由景物所引起之感受与想像，善从虚处传神。次句虚写霜月交辉之景，已传出对空明澄洁境界之诗意图感受。三四在此背景下幻化出青女素娥竞妍斗美之场景，遂使无生命之霜月成为超凡脱俗、于幽冷环境中愈富魅力之精神美之象征。《高松》云：“无雪试幽姿。”此诗正写其对面。”苏轼化之写琵琶女如“小莲”一样技艺高超、容貌美丽，连天上的嫦娥也常常随之比试起来。词人不提所写女子，却直接以“小莲”代称，则其才貌之佳可想而知。“初上琵琶弦”即“弹破碧云天”，可谓不同凡响，耸动听者。曲中所传之“幽恨”自是分明可感，而屈沉下潦的苏子亦难免勾起“心中之幽恨”。下阙着力表现琵琶女之美：“肤莹玉，鬟梳蝉，绮窗前。素娥今夜，

故故随人，似斗婵娟”，由实而虚，由尘世至天上，由人间美女到神界仙女，形成一个神妙奇幻的境界。李商隐诗“却不说破，只以青女、素娥对照之，笔意深曲”“从无伴中说出有伴来”“着重抒写由景物所引起之感受与想像，善从虚处传神”“幻化出青女素娥竞妍斗美之场景”等特色与苏轼此词有不少相通之处。人们不难从中看到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当然，苏轼个性与李商隐有很大不同，故苏词继承中又融入作者不羁的天性才情，自是具有苏词之风格。因此，相比之下，苏轼此词深沉中带着“曲子中缚不住”的飞动之势，语言也显得明白晓畅，而非等同于李商隐诗的深婉朦胧。明沈继飞云：“后段夸女飞宕。”（《草堂诗余别集》卷一）这自然显示了苏轼的大家气魄，因为个人独特风格的形成乃是大家成熟的标志。又如《阳关曲·答李公择》⑨：

济南春好雪初晴。才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雪溪女，还作阳关断肠声。

熙宁十年丁巳年（1077）正月，作于济南。李公择，即李常，黄庭坚之舅，时知齐州。“雪溪”，水名，亦称雪川，在浙江吴兴县境。施元之：“李公择先知湖州，自湖移济南，故东坡以雪溪女戏之。”（转自《苏轼词编年校注》）“阳关断肠声”，语出李商隐《赠歌妓二首》之一：“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苏轼化用之，言雪溪女不忘公择，还在唱令人断肠的《阳关曲》，与李商隐诗皆有戏谑之趣。又如《浣溪沙》：

道字娇讹苦未成。未应春阁梦多情。朝来何事绿鬟倾。彩索身轻长趁燕，红窗睡重不闻莺。困人天气尽清明。（《浣溪沙·春情》）⑩

桃李西边驻画轮。鹧鸪声里倒清尊，夕阳虽好近黄昏。香在衣裳妆在臂，水连芳草月连云，几时归去不销魂。（《浣溪沙·又春情》）⑪

“夕阳虽好近黄昏”，出自李商隐《乐游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是李商隐诗中的名篇，历来受人关注。吴乔：“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况陆放翁乎？但有

偶然撞之者，如明道云：‘未须愁日暮，天际是清阴。’忠厚平和，不减义山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矣。”（《答万季埜诗问》）吴昌祺：“（三四）二句似诗余，然亦首选。宋人谓喻唐祚，亦不必也。”（《删订唐诗解》）姚培谦：“销魂之语，不堪多诵。”杨曰：“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引）纪昀：“百感茫茫，一时交集，谓之悲身世可，谓之忧时事亦可。”（《诗说》）管世铭：“李义山《乐游原》诗，消息甚大，为绝句中未有。”（《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刘、余：“此篇抒写登古原遥望夕阳时所触发之好景不常之慨。诗人既激赏极赞晚景之美好，又因其‘近黄昏’而无限低回流连、怅惘惋惜。唯其‘无限好’，怅惘惋惜之情便愈浓重，三句之极赞正所以反跌末句之浩叹。义山身处唐之末季，国运衰颓，身世沉沦，蹉跎岁月，志业无成，于好景之不常感受特深。……以为近黄昏之夕阳必指唐之衰晚、身之沉沦或时之将逝，则近于凿，失之拘，然不主一意，正缘包涵其丰富。……此诗最近兴体，妙在有意无意之间，若作比体，便全失语妙。”“同一夕阳，盛世之诗人则于赞赏其壮美之同时激发‘更上一层楼’之展望；衰世之作者则虽赞赏其美好而深慨其消逝沉沦。时代消息，固极明显。故此诗作为衰世带有病态社会心理之反映，自有其典型意义。而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美好而又行将消逝之事物固不乏其例，对此类事物之惋惜流连，实亦人类共同之情感。诗中所流露之无可奈何情绪，虽带有衰颓时世之特征，然特殊之中亦自寓有某种普遍性。”苏轼绍圣四年丁丑年（1097）二月作此词于惠州，同时作有《减字木兰花》（琵琶绝艺）⑫及《浣溪沙》（道字娇讹苦未成）。词与循守周彦质及其善弹琵琶的“小鬟”有关。周彦质罢归，过惠，与苏轼话别，苏作词赠之。从词的内容看，苏轼化用李商隐诗表达的似是一种戏笑之意。但在苏诗《循守（周彦质）临行出小鬟》后施注云：“墨迹笔札皆精绝，楮墨如新。而每诗皆丁宁至切：‘勿以示人’。盖公平生以文字招谤蹈祸，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吁，可叹哉！”可见，远离故土、被贬惠州的苏轼实际很难真正开心。苏轼《和陶答庞参军六首》⑬序曰：周循州彦质，在郡二年，书问无虚日。罢归过惠为余留半月。既别，和此诗追送之。其一云：“子非玄德，三顾我庐。”其五云：“顾我而言，雨泣载零”。在作于同时的《虞美人》（定场贺老

今何在)⑩中,他写道:“断弦试问谁能晓?……应有开元遗老、泪纵横。”可见,遭受人生重大打击的苏轼实际上并未“忘却营营”,蛮荒之地生活的困苦、有志不能伸展而流年虚度的忧惕,使他始终无法释怀;只是“乌台诗案”后的苏轼,“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写诗填词常常深隐其辞。因此,上述《浣溪沙》(桃李西边驻画轮)等词虽写“春情”,而作者内心却未必无深曲。至于“夕阳虽好近黄昏”之具体内含,读词者可自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苏轼对李商隐《乐游原》这样的名篇是仔细品味过的,对含有深刻意蕴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亦曾留意把玩;则他对义山此诗“销魂之语,不堪多诵”“迟暮之感,沉沦之痛,触绪纷来”“百感茫茫,一时交集”“消息甚大,为绝句中未有”“登古原遥望夕阳时所触发之好景不常之慨”“最近兴体,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等特点当有相当程度之会心,不然,岂能这样自如地化用?故苏轼对“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中,美好而又行将消逝之事物”产生“惋惜流连”的“人类共同之情感”跟李商隐很有相通之处。这也说明李商隐“诗中所流露之无可奈何情绪,虽带有衰颓时世之特征,然特殊之中亦自寓有某种普遍性。”再如《西江月》(闻道双衔凤带)⑪:

闻道双衔凤带,不妨单着鲛绡。夜香之于
阿谁烧。怅望水沈烟袅。云鬓风前绿卷,玉
颜醉里红潮。莫教空度可怜宵。月与佳人共僚。

“闻道双衔凤带”,出自李商隐《饮席代官妓赠两从事》:“新人桥上著春衫,旧主江边侧帽檐。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刘、余:“《后汉书·舆服志》:‘诸侯王赤绶。’《新书·车服志》有雁衔绶带。诗固借言之耳。”“‘新人’、‘旧主’不必定指幕僚,泛指新识、旧交可也。首二谓少年风流,故三四云愿化为红绶,为‘双凤’同时衔之。谑而近亵。”苏轼揉合“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稍加变化,成“闻道双衔凤带”,谓一女子在窗下待其所爱,而所爱已“双衔凤带”,另有他顾。故久待不至,惟怅望袅袅,空对明月皎皎。如此点化,甚好!

三

苏轼以借鉴李商隐诗歌的词语等其它方式作词的情况则更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苏轼不拘泥于所用之典而能在继承中自出机杼的天分才情。如《南歌子·楚守周豫出舞鬟,因作二首赠之》⑫:

绀绾双蟠髻,云敲小偃巾。轻盈红脸小腰身。
叠鼓忽催花拍、斗精神。空阔轻红歇,
风和约柳春。蓬山才调最清新。胜似缠头千锦、
共藏珍。

“才调”,才情。见李商隐《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此为苏轼称扬座中词客赞美舞鬟之词,清新绝妙,才调不凡。胡应麟评《贾生》等云:“晚唐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皆宋人议论之祖。”《诗薮》)可见,“纯用议论矣,乃以唱叹出之,不见议论之迹”(纪昀《诗说》)的《贾生》对宋人影响之大。但“不善学之,便成伧语”(纪昀《辑评》)。故苏轼对《贾生》应深得神髓,方出笔自如。又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⑬:

十年生死两茫茫……夜来幽梦忽还
乡……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
处,明月夜,短松冈。

“幽梦”,梦境隐约。李商隐有《银河吹笙》:“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刘、余:“重衾幽梦之欢,早断绝于昔年而无可追寻,昨夜别树羁雌,悲鸣惊梦,梦醒之后,益感身之孤孑凄清。”治平二年(1065)五月丁亥,苏轼妻王氏(王弗)卒于京师。苏轼曾作《亡妻王氏墓志铭》,高度评价王氏的才德,并致以深切怀念。熙宁八年乙卯(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作此词于密州,时王氏已去世十年整。“不思量,自难忘”,可见其思念之深。以致“夜来幽梦忽还乡”,苏轼仿佛又回到了妻子在世时的家乡;“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人生之凄凉,仕途之险恶,生命之短暂,于梦中见发妻乃欲一诉,却不知从何说起。蓦然醒来,更增断

肠之痛矣！此一“幽梦”之境，写尽万般辛苦。这与李商隐《银河吹笙》“昨夜别树羁雌，悲鸣惊梦，梦醒之后，益感身之孤孑凄清”之意境颇有某种可联想处。又如《洞仙歌·咏柳》^⑩：

江南腊尽，早梅花开后。分付新春与垂柳。
细腰肢、自有入格风流，仍更是，骨体清英雅秀。……断肠是，飞絮时，绿叶成阴，无个事、一成消瘦。又莫是、东风逐君来，便吹散眉间，一点春皱。

近人朱孝臧云：“细绎词意，与《殢人娇》词略同，非止赋物也。”（《东坡乐府》卷三）邹同庆、王宗堂云：“此词以柳比兴而写闺愁，似为代妓咏怀。”（《苏轼词编年校注》）李商隐亦有《赠柳》诗：“章台从掩映，郢路更参差。见说风流极，来当婀娜时。桥回行欲断，堤远意相随。忍放花如雪，青楼扑酒旗？”屈复曰：“此首有惜之之意。以如此风流，而花扑酒旗，何也？寓意深矣。”（转自刘、余《李商隐诗歌集解》）袁枚：“李义山《咏柳》云：‘堤远意相随’，真写柳之魂魄。与唐人‘山远始为容，江奔地欲随’，是呕心沥血而成，粗才每轻读过。”（《随园诗话》卷一）刘、余：“借柳喻人，咏歌伎之风流婀娜者。”可见，二者题目、意境及所用手法皆相似。看来，后者对苏词当有很大影响，则苏轼对李商隐“写柳之魂魄”的《赠柳》诗自当深会其妙。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春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南歌子·感旧》）^⑪

“冷灰”，原指蜡烛芯的灰烬，此比喻冰冷的心情。见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一座尽惊……因成二绝寄酬兼呈畏之员外》其一：“十岁裁诗走马成，冷灰残烛动离情。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诗赞韩冬郎（韩偓）诗“有老成之风”“雏凤清于老凤声”，同时“于‘酬寄’中见自伤憔悴之意”（刘、余按）。苏轼于元丰二年（1079）被控以文字谤讪君上，下御史台狱，达一百三十余日，险遭不测；次年二月赴黄州贬所，作此词。故苏轼此时的心境之灰冷可想而知。邹同庆、王宗堂评词题“感旧”云：“感慨已了之‘旧’事。

此指‘乌台诗案’。诗人不堪回首，让它成‘旧’事过去吧。人生苦短，为欢几何，且尽尊前之杯，并留曲一拍，以待亲人（指夫人王闰之）其来也。”（《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借用“冷灰”形容自己心情之悲凉，很形象。

其它如：《清平乐》（清淮浊汴）^⑫“清淮浊汴。更在江西岸。红旆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苑。……双庙遗风尚在，漆园傲吏应无。”“应无”，犹，曾无。见李商隐《柳》。《醉落魄》（分携如昨）^⑬“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漂泊……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羨归飞鹤。”“分携”，离别，同“分手”。见《李商隐《饮席戏赠同舍》。《殢人娇》（别驾来时）^⑭“别驾来时，灯火荧煌无数……坐望断、楼中远山归路。”“望断”，望尽。见李商隐《曲江》。《渔家傲》（临水纵横回晚鞚）^⑮“临水纵横回晚鞚。归来转觉情怀动……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歌送。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舞雪”，见李商隐《歌舞》。《念奴娇》（凭高眺远）^⑯“桂魄飞来光射处”，“桂魄”，月的别称。见李商隐《对雪二首》。《醉蓬莱》（笑劳生一梦）^⑰“华发萧萧”，“华发萧萧”，见李商隐《细雨》。《浣溪沙》（炙手无人傍屋头）^⑱“萧萧晚雨脱梧楸”，“萧萧晚雨”，萧萧秋雨使梧楸脱叶、早凋。见李商隐《明日》。《渔家傲》（千古龙蟠并虎踞）^⑲“千古龙蟠并虎踞，从公一吊兴亡处。渺渺斜风吹细雨”，“一吊”，见李商隐《览古》。“渺渺”，见李商隐《酬令狐郎中见寄》。《浣溪沙》（一梦江湖费五年）^⑳“归来风物故依然”，“风物依然”，见李商隐《别薛岸宾》。《满庭芳》（归去来兮，清溪无底）^㉑“画楼东畔”，“画楼”，见李商隐《无题》。《南歌子》（海上乘槎侣）^㉒其一“海上乘槎侣”，“乘槎侣”，见李商隐《海客》。《减字木兰花》（云容皓白）^㉓“风力无端”，“无端”，没来由。见李商隐《为有》和《锦瑟》。《戚氏》（玉龟山）^㉔“瑶池近”，“瑶池”，见《穆天子传》和李商隐《瑶池》。《浣溪沙》（花满银塘水漫流）^㉕“顺风环佩过秦楼”，“秦楼”，秦穆公女弄玉之楼曰秦楼，亦曰凤楼，此指少女或少妇所举之楼。参李商隐《无题》。上述诸例，未必有意模仿或直接袭用义山诗用语，但可以看出苏轼对义山诗的熟悉程度，因而用事措辞，往往暗合。

总之，苏轼词受到李商隐诗的广泛影响，词中所涉及的多为李商隐诗中的名篇名句或很见功力之作，可见作者取法乎上的眼光。在集句词中，所

引六句李商隐诗有两句出自《无题》诗，这是最能代表李商隐诗艺术个性和成就的类型；《燕台诗》、《碧城》也都非寻常之作，艺术成就极高；“一寸相思一寸灰”乃名句，“治叶倡条遍相识”、“吟断望乡台”、“明镜惜红颜”、“蜡烛半笼金翡翠”、“绣被焚香独自眠”则极见凝练之功力，亦较有名。可知潘游龙“熔铸之妙，几夺神功”、卓人月“句句精美”当非虚誉。在化用、揉合李商隐诗入词一类中，所引全是名句，其中《无题》之“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霜月》之“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乐游原》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尤其出名，可谓千古绝调；“红绽樱桃含白雪，断肠声里唱阳关”、“愿得化为红绶带，许教双凤一时衔”亦非等闲之诗，皆精品。至于借鉴李商隐诗的词语等其它方式作词的情况则取径更广，亦见所引之精。如《贾生》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无题》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东畔桂堂东”、《锦瑟》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俱为名句；《柳》、《曲江》、《赠歌妓二首》、《赠柳》、《歌舞》、《对雪二首》、《细雨》、《明日》、《览古》、《酬令狐郎中》、《海客》、《瑶池》、《有感》等等，有艳情、咏物、无题、准无题诗等多种题材；所用表达方式有抒情、议论、描写等多种；艺术上有“辞采清丽，情韵双绝”者、“用白描”者、“实境与幻觉揉合交融”者等等，不一而足。

可见，苏轼吸收了李商隐诗的多方面优长，尤其“任主观的内向化，取象的内心化，以及意象组合的非逻辑化”等艺术技巧，大大增加了苏轼的表达手段，拓展了苏词的意境，丰富了苏词的内涵。宋刘辰翁云：“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声也。”（《辛稼轩词序》）宋汪莘云：“词至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于言外；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渊明。”（《方壶词》嘉定元年自序）清刘熙载云：“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艺概》卷四《词曲概》）近人蔡嵩云云：“东坡词，胸中有万卷，笔无点尘。尤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

清丽纤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柯亭词论》）实际上，苏轼词因中有革，复古中有创新。正因为充分吸收了包括李商隐诗在内的晚唐诗等诸多前代文学的思想艺术精髓，再结合时代特点进行自己的天才创造，所以苏轼不但有“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于言外”“至东坡始能复古”的词，也有“清丽纤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的词，而二者都显示了苏词的个性，都是词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参考文献：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版），中华书局2004年版。

李一冰《苏东坡大传》，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论文注释：

①缪钺《诗词散论·论李义山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②刘学锴《李义山诗与唐宋婉约词》，《安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③、④、⑤、⑦、⑧、⑨、⑩、⑪、⑫、⑬、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
㉖、㉗、㉘、㉙、㉚、㉛、㉜、㉝邹同庆、王宗堂
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834、
835、836、95、125、191、794、796、731、789、
817、9、141、200、286、82、123、161、410、426、
428、481、515、539、568、620、651、728、848。

③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823页。

④余恕诚《从韩愈到李商隐——兼谈文学演进中的穿透和移位现象》，《文学遗产》1999年4期。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亭亭欲立东坡魂

——苏东坡与中国亭文化续篇（三）

吴继路

内容提要：本文选择苏轼诗歌中以亭为题材或者题旨的作品 80 篇左右，分为自叙、典故、唱和、景观四类加以记述、介绍和评点。苏东坡亭文化涉及作品本身、时代背景、风景名胜和人物品格诸多方面，很有意味。

关键词：苏东坡 亭 亭文化 东坡魂

三

苏东坡一生经历，大起大落；他三次在朝，三遭外放，其中两次是在政争漩涡中受人诬陷而被贬谪，最后流落海南岛。在种种坎坷困顿中，他坦然面对，而给他以支撑的内力，使他总保持乐观积极恬然适意的因素，有两方面最被后人钦佩，一是他足迹到处呈现的名胜古迹、自然风光，那是他施展才赋，在诗文书画诸领域出新创造的源泉，其中的乐趣远非寻常人所能领悟。另外一个因素是他的人格情性所构成的人气人脉，使他触处有旧交新识的朋友。这些长辈、同辈、晚辈友人，或艺文相交，或志同道合，每有逢会诗酒唱和，雅谈宴集，其乐融融，可以令他把一切困苦烦恼抛到九霄云外。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也能成为祛疾化病的清泉仙风。读《苏轼年谱》，人们会惊异他有那样众多的身份各异的朋友，他的诗词文章，许多都成为友情滋养的实录。他与友人的聚会唱和，多在各处建筑，如楼阁堂馆中进行，这当中有相当多是亭子。亭作为建筑较为简易，所以诗友雅集，也不少以亭为背景和平台。同时也可看到，中国的亭文化到了宋代可能达到相当繁盛普遍的程度。倘若有人感兴趣，这完全能成为一个相当新颖有趣的研究题目。我们耽读苏轼以亭题材的诗作，有相当数量记述他与朋

友在亭内雅集唱和，于是人以物传、物以文传，这些遍布各处哪怕当时只是普通的亭建筑，到几百年后，尽管亭已经无存，而文的声名或生命，也就恒久传播为后人所知了。

逸老亭

《礼记·曲礼上》记载：大夫七十而致事。“致事”即“致仕”，指官员离职退休。年龄未到七十，既使五六十岁休官，也称致仕。薛周，当时一位名士，他祖父薛颜，世家出身，葬于京兆万年县，后辈长居京师。薛周做过驾部员外郎、国子博士监上请太平宫。他性情恬淡旷达，能饮酒，好交友。他还不到退休年龄，只因厌倦官场，便谢任回家，安享隐逸之乐。他在自家庄园修造一座亭，以其名明志，叫“逸老亭”。那时候，苏轼刚受命凤翔府签判。他的好友刘敞（字原父，号长安）做了一首称赞薛周的诗，苏轼与弟弟子由都作诗唱和，诗题为《和刘长安题薛周逸老亭，周善饮酒，未七十而致仕》。诗同样称颂薛周毅然辞官，早退隐居，特别肯定他为实现“素志”的那种决然态度：“翻身拂衣去，亲爱挽不留”。诗曰：

近闻薛公子，早退惊常流。
买园招野鹤，凿井动潜虬。
自言酒中趣，一斗胜凉州。
翻然拂衣去，亲爱挽不留。
隐居亦何乐？素志庶可求。
所亡嗟无几，所得不啻酬。
青春为君好，白日为君悠。
山鸟奏琴筑，野花弄闲幽。
虽辞功与名，其乐实素侯。

至今清夜梦，尚惊冠压头。
谁能载美酒，往以大白浮。
之子虽不识，因公可与游。①

苏轼这首诗是仁宗嘉祐八年二月在长安作的，当时他二十八岁。从尾句看，他与亭主人薛周还并不熟识，诗只是对好友刘敞诗的奉和：“因公可与游”，表达了“以诗会友”的意愿。苏轼与薛周的兄弟辈薛向和侄子薛绍彭有交往。至于诗里表达的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那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人流传久远的时尚情绪，他们真正热衷的仍然是仕途功名前程，表达清高其实只是一种作派。

野翁亭

熙宁六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曾经到於潜造访县令“同年”刁璿。他被友人邀请游览胜景岝崿山。那里的两位县令，分别修建两座亭，东面的亭名“山翁”，西面的名“溪翁”。苏轼从朋友那里了解到当地的民情风俗，就借此引典抒情，作了歌行体咏亭诗《於潛令刁同年野翁亭》：

山翁不出山，溪翁长在溪。
不如野翁来往溪山间，上友麋鹿下鳬鷺。
问翁“何所乐，三年不去烦推挤？”
翁言“此间亦有乐，非丝非竹非蛾眉，
山人醉后铁冠落，溪女笑时银栉低。”
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耗。
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

②

苏轼诗里引用一个古典，称赏作县令的两位朋友政绩良好，境内长久平安无事。“吠犬足生耗”，用后汉岑彭的故事。岑彭做魏郡太守，百姓安定，夜不闭户，“吠犬不惊，足下生耗”。

垂虹亭

吴兴松江桥有垂虹亭，桥下松江、霅溪两水相会，为三吴胜景。“仙舟游漾霅溪风，三奏琵琶一舟监红”，这是苏轼好友杨绘（元素）寄苏轼的诗句，回忆早年畅游垂虹亭的情境。熙宁七年秋，苏轼受命赴密州任，曾经同一群朋友相约，雅聚清歌，给他留下极深印象。三年后，他在《阳关词三首·答李公择》一诗里，曾这样回忆垂虹亭聚会：

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

使君莫忘霅溪女，时作阳关断肠声。③

聚会时李公择，正任湖州太守，是此次诗会的东道主。

元丰二年，苏轼自徐州移任湖州作太守，得到重游松江垂虹亭的机缘。这次与挚友秦观、诗僧参寥相会，恰好关彦长（景仁）、徐安中也到了。旧地重游，兴会空前，五位好友分韵赋诗，苏轼得“风”字。他诗兴盎然，即席吟得七律二首《与秦太虚、参寥会于松江，而关彦长、徐安中适至，分韵得风字二首》，其一首联便忆及垂虹亭：

吴越溪山兴未穷，又扶衰病过垂虹。
浮天自古东南水，送客今朝西北风。
绝境自忘千里远，胜游难复五人同。
舟师不会留连意，拟看斜阳万顷红。④

今昔通连，情境俱胜，苏轼的诗句把垂虹亭风物绝景和朋友情怀描绘得淋漓尽致。

斗野亭

苏轼与古都名城扬州可谓素有渊源，他数次到那里，有诸多僧俗至友。元丰八年秋，苏轼受诏命赴登州太守任，重新路过思念已久的扬州。月底，他先往石塔寺拜会名僧又是至友的无择长老，话旧后，应邀为老僧题字，在竹西亭话别时题绝句一首《余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

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
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⑤

竹西寺又称上方禅志寺，曾是一处古迹。做过隋朝故宫，“惠照师”指梁代一位高僧。

第二天，八月二十九日，苏轼到邵伯埭专程拜会老友了元法师。了元法名佛印，他与苏轼十分投缘，禅语机锋流传许多故事。这一次二人“麾麈妙谈”，尔后又同去斗野亭，与另一法名僧荣的和尚晤谈。他们畅谈的斗野亭，地处城北名胜邵伯埭，原为晋代大诗人谢安所筑。因为扬州分野属斗星，那里的名亭便叫斗野亭。苏轼在此亭忆起五年前好友孙觉（莘老）曾经给他寄过咏亭诗，那时孙正做苏州太守，而如今莘老已调往京师任职。睹物思人，苏轼特地步朋友原韵，作了一首五言诗，题目叫《次韵孙莘老斗野亭寄子由，在邵伯堰》：

落帆谢公渚，日脚东西平。
孤亭得小憩，暮景含余清。

坐待斗与牛，错落挂南甍。
老僧如夙昔，一笑意已倾。
新诗出故人，旧事疑前生。
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
逢人辄自哂，得鱼不忍烹。
似闻绩溪老，复作东都行。
小诗如秋菊，艳艳霜中明。
过此感我言，长篇发春荣。⑩

孙莘老诗，起句为：“淮海无林丘，旷泽千里平。”结句为：“可待齿牙豁，归与谢浮荣。”

苏轼这首咏斗野亭诗，从容淡定，既抒发了本身对扬州“吾生七往来”的怀恋之情，也想念故人，思念弟弟（当时苏辙从筠州调往绩溪任职），慨叹人生不可知的命运。但结尾句“过此感我言，长篇发春荣”，显然透露出他一贯奋进向上、达观乐天的胸怀。这一篇完全可以成为“睹物思人，以亭会友”的代表作。

介亭

为世人发明了“欲将西湖比西子”的苏轼，似乎与杭州山水、与西子湖更有奇妙的天缘。自年轻到年老，他两度在杭州任职，亲近西子湖，也在那里结交了大批朋友。别的不提，单从一座亭和他两番为这亭所作的诗，后人就可以体验到这位天才诗人、艺文巨匠，与钱塘胜境那种得天独厚的因缘。

介亭在钱塘门外凤凰山顶，那里石丛林立，人们叫它“排衙石”。熙宁年间，太守祖无择修建了一座敞亭，取名介亭。亭西边有修篁苍翠、怪石萧爽的龙井岭，山下的桃源路，缥缈凭虚，是赏景吟诗的佳处。熙宁二年，年富力强，名满朝野的苏轼受命来杭州任通判。太守，他的顶头上司陈述古（襄），嗜爱诗友唱和。他凡有诗呈苏轼，苏轼必奉和。一次述古在重九召请诗友雅集，苏轼恰值染恙未曾参加，但他难却盛情，便作了诗，一首题为《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

西风初作十分凉，喜见新橙透甲香。
迟暮赏心惊节物，登临病眼怯秋光。
惯眼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
犹有梦回清兴在，卧闻归路乐声长。⑪

诗里也用了典故，如“云庵处士”说的是唐末隐士方干；“佳人锦瑟”引杜甫、李商隐诗句。但诗的主要意味在描述介亭之会的情境与兴致。第二

天是重九节，苏轼仍然因病未曾赴会，又写了一首同韵诗，也引述了“吹帽狂司马”，即讲晋代桓温故事；“亲眷老孟光”，讲后汉梁鸿妻孟光故事。而全诗主调还是颂赞介亭之会的友情，结句为“人间此会论今古，细看茱萸感叹长”，正是篇末点题。

有意思的是，人事沧桑，殊难预料。苏轼再次登临介亭，已经到了元祐五年。这期间他经历了命运的拨弄，大落大起，先贬黄州四年多，后来运气好转，再到杭州来，身份已经成了最高长官：太守。人非而物仍在，介亭仍然是同僚诗友雅集唱和的佳处。此时，苏轼留下不少以介亭为场景的诗文与会友的诗作。这一番与他唱和的主要搭档已经换成刘景文。景文名季孙，在杭州任文思副使，实际属于武官。他人很磊落坦荡，被人称作“胸有万卷书，笔下无俗气”。苏轼很赏识他，说他是“老来可与晤语者”。苏轼给他的以介亭为题的诗很长，题为《次韵刘景文登介亭》，可窥见他们之间友谊的浓浓兴致。另外一首次韵袁公济的介亭诗，则可以考察苏轼当时任职杭州的生活与心境。

再有一首题为《介亭饯杨杰次公》，可以作为当年与陈述古唱和的七言诗相对照来赏读，或者可看成前诗的“续篇”（杨杰时任两浙刑狱，号“无为子”，有诗名），诗云：

篮舆西出登山门，嘉与我友寻仙村。
丹青明灭风篁岭，环珮空响桃花源。
前朝欲上已蜡屐，黑云白雨如倾盆。
今晨积雾卷千里，岂畏触热生病根。
在家头陀无为子，久与青山为弟昆。
孤峰尽处亦何有，西湖镜天江抹坤。
临高挥手谢好住，清风万壑传其言。
风回响答君听取，我亦到处随君轩。⑫

景是介亭之景，情是挚友之情。情自亭处而发，响应千里之外，传千年之远。

垂云亭

前面叙同苏轼经历相关的亭诗，已经说过僧清顺的垂云亭。苏轼参与亭建设的全过程，诗中既赏建筑物又赞亭主人。那是熙宁年间的事。多年后，苏轼再来杭州作太守，旧朋友重逢，悲辛交集；而重游旧地，约朋友王忠玉（瑜）、张全翁（张璹）游西湖，一起到北山去叩访僧友清顺、道潜，又来到垂云亭，有诗《连日与王忠玉、张全翁游西湖，访

北山清顺、道潜二诗僧，登垂云亭，饮参寥泉，最后过唐州陈使君夜饮，忠玉有诗，次韵答之》，诗曰：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
西湖亦何有，万象生我目。
云深人在坞，风静响应谷。
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
竹间逢诗鸣，眼色夺湖绿。
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
故应千顷池，养此一双鹄。
山高路已断，亭小膝屡促。
夜寻三尺井，渴饮半瓯玉。
明朝闹丝管，寒食杂歌哭。
使君坐无聊，狂客来不速。
载酒有鷗夷，扣门非啄木。
浮蛆滟金碗，翠羽出华屋。
须臾便陈迹，觉梦那可续。
及君未渡江，过我勤秉烛。
一笑换人爵，百年终鬼录。①

苏轼的这一首以亭为题的诗，平实淳朴，描述友人，记叙景物，句句如话家常，一片知心朋友语气，读来十分亲切。“与君皆无心，信步行看竹”，将读者带入当时情境，感受气氛。至于结尾处的禅悟语：“须臾便陈迹，觉梦那可续”，“一笑换人爵，百年终鬼录”，也有轻敲重响效果，意蕴无穷。

梅氏园亭

苏轼一生品格高，人脉旺，朋友知交遍域中。他在杭州，身为地方最高长官，向来平易待人，接近他的下属，许多诗文往来，成为“僚友”。吴郡人梅子明，如同当年苏轼首次倅杭，也作通判，辅助太守。苏轼与子明有交情，也连带敬重长辈，曾经馈赠珍贵的白石（即产于洞庭湖、太湖、鼋山的贞石。）奉孝其父梅宣义。苏州人看重园林，梅家的园亭颇有名。梅子明卸任回乡，苏轼惜别，特地作了一首诗，以他向来倾情的“园亭”为题：《寄题梅宣义园亭》。前面叙园，后面抒叙情谊与自己的向往：

仙人子真后，还隐吴市门。
不惜十年力，治此五亩园。
初期橘为奴，渐见桐有孙。
清池压丘虎，异石来湖鼋。

敲门无贵贱，遂性各琴樽。
我本放浪人，家寄西南坤。
敝庐虽尚在，小圃谁当樊。
美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
爱子幸僚友，久要疑弟昆。
明年过君西，饮我空瓶盆。②

过溪亭

对于苏东坡的文化思想，学者专家有诸多精研论述。大体确认他是儒道释融通酝酿，取其精髓，制造出文化思想领域有独特意味的“东坡酒”。

他受佛教思想，特别是禅宗文化影响至深，而一生经历中结交过不少高僧禅友。因为两度在杭州任职，他在这里与名僧法師的交谊，不单创作诸多传世诗文，也流传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这里提到的东坡亭诗故事，和他与法名辩才的禅友和僧人修造的亭有关。而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不烦旁人记叙，就记载在苏东坡这首亭诗的长题里。题曰：《辩才老师退居龙井，不复出入。余往观之。尝出，至风篁岭。左右惊曰：“远公复过虎溪矣”。辩才笑曰：杜子美不云乎：“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因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亦曰二老，谨次辩才韵赋诗一首》，诗云：

日月转双毂，古今同一丘。
惟此鹤骨老，凛然不知秋。
去住两无碍，人天争挽留。
去如龙出山，雷雨卷潭湫。
来如珠还浦，鱼鳌争骈头。
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
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
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
大千在掌握，宁有别离忧。③

需要交代一下辩才法师的故事：大师自元丰三年从天竺寺退休于风篁岭龙井，在这里主持建筑了不少堂馆，使此处成为杭州名胜之冠。苏轼作此诗第三年，元祐六年九月，大师圆寂；苏轼弟子由撰铭纪念，而他自己写了祭文，刻石于山中。辩才的原诗有句“路穿乱石脚，亭蔽重冈头。湖山一目尽，万象掌中浮”，描写过溪亭景象。而此亭命名为“过溪”，则采用了东晋陶渊明的著名典故：高僧慧远，主持庐山名刹东林寺，声名远扬。一次高

士陶渊明同道士陆静修到寺中拜访慧远，三人谈兴极浓。临别主人送客，仍在谈说，不知不觉走过寺前的溪水，忽闻虎啸震心。原来高僧早有规定，他送客出山门，向来不过溪，否则他饲养的猛虎就要吼啸。现在庐山名胜东林寺仍然有景观名虎溪和三笑堂。而杭州龙井的过溪亭，则由于旧典和苏轼的诗，成为著名文物。

岐亭

现在湖北省麻城县，有个地方叫岐亭。以当今建制，不知属乡还是镇。原本是普通地方，不想由于苏东坡的作品而千载留名。最重要的作品是一组系列五言诗，题为《岐亭五首并叙》。要知道来历，最可稽考的原始资料，还要看作者的“诗叙”：

元丰三年正月，余始谪黄州。至岐亭北二十五里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则余故人陈慥季常也。为留五日，赋诗一篇而去。明年正月，复往见之，季常使人劳余于中途。余久不杀，恐季常之为余杀也，则以前韵作诗，为杀戒以遗季常。季常自尔不复杀，而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其后数往见之，往必作诗，诗必以前韵。凡余在黄四年，三往见季常，季常七来见余，盖相从百余日也。七年四月，余量移汝州，自江淮徂洛，送者皆止慈湖，而季常独至九江。乃复用前韵，通为五首以赠之。

从这里我们看到两个近千年、光彩熠熠感人至深的传奇故事，一为人事传奇，一为文学传奇。

苏东坡与陈慥原本是青年时代结识的朋友。苏东坡被授职任凤翔签判，而顶头上司知府的儿子正是陈慥。两人年岁相仿，性情投合，成为好友。可是此后际遇变换，天各一方，他二人并无往来。想不到苏东坡罹难，远放荒州，竟然他乡遇故知，半途欣然相遇。季常远离官场，成为隐者，却被周围乡人视为奇人侠士。他景慕苏东坡人品文品，自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情谊笃厚，非比寻常。而苏东坡自从受友人款待，作了第一首诗之后，如同天神差意，每见一面便用原韵作一首诗，直到再分别，共积了五首。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以诗达情从未有过的故事。《岐亭五首》焕放的人性光辉和文学华彩，都是极独异而又感人肺腑的。

岐亭作为一处村镇，东临举水，西有倒水，一条古道在两水间分了岔，即成为“岐”。当年那里

可能建有亭，而后来演变为村镇的名字。这里讲苏东坡从亭为题材而以友情为意蕴的诗，也便把这组诗采纳进来。

现在选读其二：

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
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
剗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
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
不见卢怀慎，蒸壶似蒸鴨。
坐客皆忍笑，髡然发其冕。
不见王武子，每食刀几赤。
琉璃载蒸豚，中有人乳白。
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
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
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
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

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①

纪昀评此诗：“纯是香山门径”，讲诗具白居易淳朴风格。诗里引用的古人故事，条条倡节俭。与诗之劝不杀生题旨极切。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⑪、⑫、⑬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
279、891、1549、1984、2870、2874、1004、3571、
3512、3613、3603、2521、2526页。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望湖亭)

苏轼寓言今译

林冠群

内容提要：选择苏轼代表性的寓言 30 则翻译，并揭示寓意，以便于理解。

关键词：苏轼 寓言 翻译

有疑问的罪从轻处罚

上古帝尧时期，皋陶这个人担任审案定罪的官。有一天他当着帝尧的面要定一个人的死罪，杀头！

皋陶拍案喝叫：“杀了他！”

帝尧急忙制止：“刀下留人！放了他！”

皋陶不听，连叫三次要杀；帝尧也三次制止，不让杀。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所犯的罪案还有疑问，证据不足，帝尧担心杀错了人。从此，天下人都畏惧皋陶执法的严酷而称道帝尧对罪人的宽恕为怀。

四个部落的首领们向帝尧推荐鲧担任首领。帝尧开始说：“不行，他虽然有功，但曾经违抗命令，残害自己的部落同胞。”过了一会，帝尧思考再三，说：“哪就让他试试吧。”最终同意提拔鲧为部落首领。

为什么呢？帝尧认为，有功劳的人，还是要看重他立下的大功，不要过多计较他的小过失。

古代的经典《尚书》里有这样的话：“有疑问的罪过，要从轻处罚；有疑问的功劳要从重奖励。与其杀害无辜百姓还不如违反现成的规定赦免他们。”

——《苏轼文集·刑赏忠厚之至论》

启示：法制的人性化就在于尊重生命、敬畏生命，不要把人当作草芥与牲畜；激励机制的目的在于充分肯定所有人的进步与成就。

千里马骐骥

有一种千里马名叫“骐骥”。

这种马奔驰起来样子很怪，马的脊背纹丝不动，四蹄好像不沾地，上坡时，不显得前俯后仰，下坡时，不见得前高后低，一般人都看不上眼。虽然它跑得极快，但大家都不认为它是良马。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只看不惯它奔跑的怪样，却没有相马的知识，不知道这样奔跑技巧卓越、速度极快的正是一匹千里马啊！

——《苏轼文集·上王兵部书》

启示：有特点与创造性的人往往会被误解，只有具备知人能力的人才能理解和赏识他们。

有病的人

有一个人身体不适，整天闷闷不乐，似乎得了大病，但又不能具体说出病的情况。看来他觉得自己的病已经不轻，很难诊断了。

但在一般平常的庸医看来，他这个人的起居饮食、言语动作又都与正常人一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因此都认为他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纯粹是“疑心生暗鬼”罢了。

等到名医扁鹊、仓公一看，才惊异地发现他真有大病！并且这病的起因很复杂，因此，医治起来可不是马马虎虎按平常的医治办法卤莽草率就能治得了的。

——《苏轼文集·策略一》

启示：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因此在看似平常、普通的表象下往往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养马人的心事

地方上有一个养马的人，他担心为他放牧的人欺骗他，暗地里偷了他喂马的草料、豆子，于是又委派了另一个人当“厩长”，负责监督喂马的人。但“厩长”上任之后，他的马却越来越瘦了。

——《苏轼文集·策别厚货财一》

启示：“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古代的经验教训。不懂这个道理，用人越多，事情越乱。

割瘤致死

有一个人颈下附近咽喉的地方长出一个肉瘤。因为这肉瘤生长的地方太险要了，不能随便动它，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但这个人生性顽劣，耐不住肉瘤的刺激又觉得颈下挂个肉瘤难看，一时激愤之下，竟自己动手将肉瘤割掉，可这肉瘤是割掉了，但他的性命也丢掉了！

一个国家，其中必定有一些占据了要害位置，而行为阴险、心地邪恶、违法犯罪的家伙，这些坏人就像颈部附着于咽喉的肉瘤一样，如果不顾利害，不讲方法，只想除之而后快，就有可能像上面自己割瘤的人一样，给国家带来危险。汉朝、唐朝都是因为这个缘故灭亡的。

——《苏轼文集·大臣论上》

启示：无论什么地方都有坏人，但坏人窃居了要职就可能产生毁坏一切的危险。因此当坏人窃居了要职之后，要想除掉他们就得特别小心，不顾一切、不看时机贸然行动往往祸国殃民，后果严重。

一头牛换五只羊

有一个人为他的主子放牧牛羊。有一天，他背着主子，用一头牛与别人换了五只羊，回来对主人说他换得了五只羊，但失去了一头牛的事他却隐瞒不报，却将得到五只羊的事说成自己的功劳。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启示：喜欢别人报喜不报忧的主子，很容易用表面的成果去欺骗他们。而善于报喜不报忧的人在这种人的治下常常会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善于养生的人

善于养生的人，注意作息时间，休息活动都要谨慎；吃东西要讲究，节制饮食；懂得气功导引的方法，活动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需要吃药的时候，要选择药品中质量好、药性良，可以长期服用而于身体无害的药物。这样，就可以做到五脏和平而寿命长。

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谨慎作息、节制饮食的功夫，等不得导引吐纳的效果，讨厌拣选上好药材而轻易使用劣质药品，损耗自身元气去助长表面的强壮，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本钱早已掏空，这样，他离死期也就不远了。

天下国家的大势，大概也是这样的，不善于调养，无端消耗，一味逞强，就会面临祸乱亡国的危险。

——苏轼《上神宗皇帝书》

启示：人需要调养才能健康长寿；国家也需要调理才能长治久安。国家的调理最主要的是减少浪费，藏富于民，不可穷兵黩武，好胜逞强。

喜欢骑马飞奔的人

有一个人喜欢骑着马飞奔，自觉很得意，看不起慢慢走路的人。有一天，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从此再也不能跑马了，只好走路。

这个人当初大概想不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不懂得慎重小心可以成就大事，而轻率妄为常常会导致失败的道理。

——苏轼《拟进士对御试策》

启示：一个人得意忘形的时候，往往轻视小心谨慎的行为，等到他跌倒摔跤了，他才会懂得轻举妄动的失败。

只信医药病不轻

有一个人犯了风寒，咳嗽不已。他去问医生，医生说你肚子里有虫，这是犯了“蛊毒”，要不及时治疗，就会有性命之忧。于是要了他一大笔钱为他治疗，用“蛊药”让他吃，攻击他的肾脏、肠胃，灼烧他的肢体皮肤，禁止他吃美味可口的食物。一个月之后，这个人百病发作，体内发热，外头怕冷，

咳嗽更厉害了，整个人消瘦疲倦，真的像个患了蛊病的人。

于是他又另找医生，这回，医生说他是得了热症，将治热症的寒凉药物给他吃。吃了这寒凉的药，早起就呕吐不已，到了晚上还在腹泻，这样连饭也不能吃了。这人害怕了，反过来专吃热药，将钟乳石、乌头等热性药物混杂着吃，因而身上竟长出蛇头疔、痈疽、疮疖等，弄得头昏眼花，好像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再三换医生，但病却越来越重。

村里的老人们指点他：“这是医生、药物害你了，你哪里有病啊！人嘛，一生下来，靠的是元气，再补充以食物，而你整天药不离口，苦臭的药味弄昏你的脑袋，有毒的药性腐败你的内脏，这样，元气不调，食物不补，怎能不病呢？你把那医与药都去掉吧，好好休息，吃你爱吃的东西，直到你元气恢复了，吃东西也有味了，这才是良医美药呀，这样坚持下去就会见效。”

这个人听了老人们的话，照着去做，过了一个月病就好了。

——苏轼《盖公堂记》

启示：缺乏常识的迷信和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都同样是失败的原因之一。

日 喻

一个生下来就瞎的瞎子不知太阳是啥样，就向眼睛好的人请教。

那人告诉他：“太阳就像个铜盘那样，圆圆的。”说完还特地操起一个铜盘敲响出声来。瞎子后来每听到钟声响便以为这就是太阳了。

又有人告诉他：“太阳会发光，就像人们点着的蜡烛光。”瞎子摸到蜡烛，以为这就是太阳的样子了。后来他摸到一根像笛子的“籥”，他以为这就是太阳了。

太阳哪里会像铜钟与“籥”呢？瞎子并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那是因为他从来没能见到过太阳，而是向别人请教的原因啊。

——《苏轼文集·日喻》

启示：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只相信别人的描绘就永远得不到真相。

南方很多会潜水的人

南方很多会潜水的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水边，七岁就能在浅水里走来走去；十岁就能在深水里游泳；十五岁就能下潜到深深的水底里。

能下潜到深深的水底里，这功夫是能够随便做得到的吗？这必定能懂得水性才行啊。居住在水边，天天与水打交道，这样活到十五岁了，也就算懂得水性了。如果从来没有见识过江河湖海，不知水性，虽然长得高大威猛，但见到了浮在水中摇晃的舟船也会心生畏惧。所以自小长大在北方的壮汉，问南方会潜水的人，按照他们所告诉的潜水方法便去河里学潜水，没有不被水淹溺的。

所以凡是不经过学习便想能掌握一种规律、懂得一种道理的，都像北方汉子的学潜水一样，结果都不能达到目的。

——《苏轼文集·日喻》

启示：实践出真知，这是永恒的道理。

刘伯伦装达者

刘伯伦（刘伶）出门时总爱随身带着铁锹，常扬着铁锹对跟着他的人说：“如果我死了，把我埋掉！”那神气显得十分旷达的样子。

东坡就此评论说：“我看刘伯伦这个人还算不上旷达。一个真旷达的人，即使死了，得到厚葬，用棺椁装着，衣衾裹着，那也不会妨害到你是一个真达者呀。假如真的认为这不妥，那么死了就算了，何必还想到要埋不埋的事呢！”

——《东坡志林·刘伯伦》

启示：只讲求形态去猎取宣传效果的，那是“作秀”，而发自内心的朴实才算得是真性情。刘伯伦的张扬显摆，不过是作秀而已。

威风无法施展

四川的忠县、万县、云安那地方多虎。有一个妇人白天把自己的两个小孩放在沙滩上，到河里去洗衣服。一只老虎从山上跑出来，妇人吓得惊慌失措，急忙跳进河水中潜水躲避。而两个小孩却若无其事地照样在沙滩上戏耍。老虎走到小孩身边注视着他们，甚至还用头去触碰他们，看他们怕不怕。

两个小孩痴顽不惧，一点也不知道害怕，还是照样玩他们的。最后，老虎还是掉头走了。想来老虎要吃人时，必先以虎威吓人，让人害怕，如果碰上胆大不害怕的人，它的虎威也就无计可施了。

有人说老虎不吃喝醉酒的人，必坐在旁边等候喝醉的人醒来。其实也不是等他酒醒而是看他酒醒了怕不怕。有一个人黑夜里从外面回家，看见有一个动物蹲在他家门口，他以为是猪狗之类，便挥动拐杖去击打它。那家伙随即跑开了，跑到山脚下月光明亮的地方，一看，原来是只老虎！其实这人也没有什么能战胜老虎的地方，只是那毫不畏惧的勇气镇住了那只老虎而已。

假如人们都不知畏惧，像那两个婴儿以及醉汉，还有那一时还未了解实情的人那样，老虎就会害怕他们，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苏轼文集·书孟德传后》

启示：无所畏惧是勇气的来源。对于惯耍威风的人来说，这种勇气就是能令他心虚胆怯的幽灵。

燕子与蝙蝠争论白天黑夜

燕子认为太阳出来了，就是白天，太阳落山了，就是夜晚；蝙蝠不同意，它认为太阳落山了才是白天，太阳升起了，才是夜晚。两家争论不休，一齐去向凤凰讨个决断。

途中遇到一只鸟，对燕子说：“你们不用去了，凤凰正在休假，不理事。”还有的说：“凤凰正在打瞌睡，哪管你们这闲事！”

——朋九万编《东坡乌台诗案》

启示：对于那些认死理而固执到底的人，最好不用跟他们论说是非，所以“凤凰休息”了。

小孩子拔牙

婴儿长大到要换乳牙的时候，一定要等到它松动以后，渐渐地摇撼它，这样，乳牙拔掉了，小孩也不觉痛苦；但是若不采取渐渐等候的办法，就想一下子将乳牙拔掉，那就有可能因拔乳牙而送掉了孩子的性命。

要想攻打一个国家，灭掉他腐朽的政权，这是一件大事，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定要像给孩子拔乳牙一样，渐渐地等候时机成熟。

——苏轼《代滕甫论西夏书》

启示：等待最有利的时机，是取得“事半功倍”效果的必要条件。

不打无准备的仗

国家因不得已而用兵打仗的时候，正像私人家造屋一样。大凡要造多少间屋，木材、石料要用多少，谷米要用多少，共需要多少钱，计算明白之后，工程的花费大概就可以定下来，工程完工后，不会有较大的出入。假如不是这样，等工匠进了门，刀斧锯凿之声响起来了，这也叫用钱，那也叫用钱，千百种费用像毛发一样多，那就无法再算计了。这是事先没有做好预算的过失了。等到工程开始了才去筹备粮食，等到扬起斧头要砍了才去寻求木材，这样费用就会成十倍的增加，工程也因此难以保证质量。

所以国家的用兵就像富人的造屋一样，考虑周到，事先做好计划，选取建设材料、积备粮食，都有办法，所以他经营准备的过程总觉得迟缓，但一行动起来却非常迅速，获得的成效以日计算，不会打乱了当初的计划。因为准备充分，常花别人一半的费用却赢得成倍的胜利。

——苏轼《答李琮书》

启示：把打仗比作造屋，这中间只有一件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有充分的准备。仓促应战，即使能获胜也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

河豚鱼

河里的鱼，有一种名叫河豚。这种河豚鱼常在桥底下游来游去，有时候它会碰在桥柱上，但它不会避开桥柱游远一点，却对桥柱发怒，认为桥柱撞了它。于是它张开鳃帮，竖起背鳍，鼓着肚子，气鼓鼓地浮到水面上来，表示它对桥柱的愤怒。河豚鱼在水面上长久地晾着肚子，天上的老鹰飞过，发现了，箭一般冲下来用利爪将它攫起，啄裂它的肚皮，将它吃了。

喜欢游玩，没有节制，因游玩触了霉头又不知反省自己，却任性发怒，最后被撕裂肚子而死，可悲啊。

——《苏轼文集》卷六十四《二鱼说》

启示：庸人常因为忍不了一时之愤而吃大亏。

乌 贼

海里有一种鱼，名叫“乌贼”。乌贼会喷水。海岸上有一群水鸟在戏耍。乌贼害怕岸上的水鸟发现自己，便不断地喷水，想借此掩蔽自己。海鸟看到了乌贼喷出的水迹，觉得奇怪，飞近去仔细观察，知道它其实是鱼，便把它抓走了。

唉，这乌贼只知道用喷水来掩蔽自己，却不知道喷出的水迹会引起水鸟的怀疑，结果行踪被发现而死。可悲啊。

——《苏轼文集》卷六十四《二鱼说》

启示：善于伪装的人常自以为得计，却不知他的吃亏往往就在这伪装上。

道人戏语

京城里有一位有“道术”的高人坐在相国寺旁向过路的行人贩卖所谓的“秘方”。他在一份封包好的“秘方”上写道：卖“赌钱不输方”。

有一个爱好赌钱的少年见了，花了一千金的高价买下他这份“秘方”。回到家里打开一看，里面写着：“这秘方只有开设赌场的庄家用了才有效。”

哈，这位有“道术”的高人着实会兜售“秘方”，只开了一个玩笑，便白赚了千金。不过照赌场的规矩，也只有设赌的庄家才“赌钱不输”，所以事实上他也没有欺骗这个少年。

——《东坡志林·记道人戏语》

启示：被骗的人往往不是因为那骗术的高明而是因为自己的贪心而受骗。

牧羊人做梦变成王侯

有个牧羊人做梦，从羊想到马，从马想到车，又从车想到有盖顶的高级车，于是在梦中坐着只有权贵们才能乘坐的有华丽盖顶的马车，觉得自己已经身为王公贵族了。

唉，从牧羊人到王公贵族，这差距也实在太远了，只有做梦才能实现。而做梦能变成王公贵族，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苏轼《梦斋铭叙》

启示：一个人虚荣心的满足，最高的境界就是在梦里。如果希望这种满足长在，那就永远睡着，不要醒来。

方轨八达之路

把一盆水泼在地上，水中有一枝小草浮着。一只蚂蚁爬到小草上，环顾四周，大水茫茫，不知怎样才能渡到岸上。

过了不久，泼在地上的水干涸了，蚂蚁急忙逃走，碰到了它的同类，惊慌得哭了起来：“差一点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这只小蚂蚁也太悲观了，天底下四面八方都是路，你看它不过是俯仰之间便找到出路了吗？想想也真是太可笑了。

——《苏轼文集·试笔自书》

启示：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他能想得开，就会发现其实有很多解决困难的办法。

生活在裤缝里的虱子们

看到生活在裤缝中的虱子了吗？逃走在那纵横交错的裤缝中，躲藏在那破棉败絮里，把那地方当成自家最吉利安全的住宅。来去不敢离开那裤缝，行动不敢逃出那裤裆，这样以为自己是很守规矩法度的模范，不会有意外的危险。然而，遇到了火山爆发，冒着火焰的泥石流滚滚而下，村庄城郭毁于一旦，虱子们躲在裤裆里，也免不了同归于尽。

“正人君子”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与虱子们生活在裤缝里一样吗？

——《苏轼文集·阮籍》

启示：对于恪守现存秩序，不思变革的人来说，眼前的生活当然是幸福的安全的，但是社会是变化的，当巨大的社会变革来临时，不思进取就是一种毁灭。

蝉与鸡

你也曾见过蝉与鸡吗？蝉爬在树上叫，一直叫个不停；鸡低着头啄食，连头都没有仰起过。他们本来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每当蝉蜕壳，鸡孵卵的时候，他们就伏着不动了，仿佛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不知肚饿，不知口渴，默默守候那

即将来临的丝毫变化于荒忽幽眇之中。这种本能就是圣人的智慧也赶不上啊。这岂是靠技术与练习所能达到的本领啊？

——《苏轼文集·众妙堂记》

启示：本能就是与生俱来的本事，这种本事总是与靠技术和练习得来的本领有区别。

瓮 算

有一个贫穷的读书人，家徒四壁，只有一个瓮陈放在屋角里，夜里便守着这个瓮睡觉。

有一天夜里，这读书人想入非非：假如有一天我获得大富大贵，一定要花大笔钱买田造屋，供养戏班歌妓，而且高级华美的车辆等等，都统统购置，一样也不缺。

这样想着想着，满怀高兴，不知不觉竟在屋子里手舞足蹈，跳起舞来，然而，一不小心，将那个唯一的瓮也踏破了！

——东坡诗注，见《梅磵诗话》

启示：空想会给人带来非常美妙的境界，但这种境界往往会被自己的得意所败坏。

野人得鹿

山野里的猎人捕获了一头鹿，就照平常的吃法将它烹煮来吃了，其后，又将一部分卖给集市上的人，于是便进入了公家的厨房里。厨师们采用成百种烹调方法制成美味，然而，鹿肉原有的营养价值之“美”，与猎人们平常的吃法一样，一点也没有增加。

——明赵开美刊本《东坡志林·袁宏论佛说》

启示：贪图形式美的人并不在乎内在的美，但内在的美对谁都一样的重要；懂得了内在美的重要性，外在的形式美有时会变成多余的浪费。

禄有轻重

王状元没有考中时，有一天喝醉了，失足掉进汴河里，被水神救了起来。水神对他说：“先生，你有三百千当官的薪水津贴，如果便这样死了，谁替你花费啊？”到了第二年，王状元便考中状元了。

有一个读书人，屡考不中，听到这个消息，也想效仿王状元的做法，希望也得到神助。他假装醉

酒，也跌落汴河里。河神果然也来将他救起。他高兴极了，急忙问河神：“那我当官的薪水津贴到底有多少啊？”河神却摇摇头，说：“这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有三百瓮黄酱菜还没人去消费呢，大概归你吧。”

——《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杂记》

启示：贪婪的本性会使人像疯子一样做出许多愚不可及的事情来。

德有厚薄

杜黄裳，少年时好善事，积阴德，看到原野上有死未能埋葬的枯骨，即亲手将它埋了。鬼们很感激他，常报以恩德，或使他获得宝剑，或使他获得人家藏在地下的银两。

有一个读书人也来仿效他的做法，看见雪地上有一根枯骨，便把自己的衣服当了，换钱来埋葬这枯骨。他忍着寒冷熬到三更，忽然有一个鬼来到他的屋檐下叫道：“秀才，秀才！你会唱《凉州》、《伊州》小曲么？我是唐朝开元年间专跳回旋舞的角色，让我和你跳一回曲破舞吧，只好用这个回报你的恩德了。”

——《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杂记》

启示：“施恩不望报”，是一种真诚的道德境界，缺少这种境界的行善其实是一种交易，所以有时会有亏。

海屋添筹

曾经有三位老者碰到一起，互相问起年龄。

一人说：“我究竟有多少岁已经记不得了，但只记得少年时与开天辟地的盘古有过交往。”

一人说：“海水曾经变为桑田的时候，我便记下一筹码，近来，那些筹码都快堆满十间屋子了。”

一人说：“三千年结一次果的长寿蟠桃我吃了无数，那吃剩的蟠桃核我都丢弃在昆仑山脚下，如今快堆得和昆仑山一样高了。”

在我看来，这三位自称长寿的家伙，与朝生夕死的蜉蝣、朝菌也没有什么区别。

——《东坡志林·三老语》

（下转第 63 页）

苏轼涉梦诗词探析（下）

刘丽姣

内容提要：真梦诗词有的记录其真实梦境，有的记录其在梦中的感受和状态，有的记录其在梦中所作诗词；喻梦诗词则主要抒发其古今如梦、劳生如梦的生命意识，而后者又主要表现为世事如梦和时间如梦两种形式。苏轼之所以大量创作涉梦诗词，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本人的人生经历、敏锐的感受力及前人创作多涉梦有关。

关键词：苏轼 涉梦诗词 真梦 喻梦

一、苏轼涉梦诗词解析

苏轼这 352 首涉梦诗词所指意思有很多，除了记录他睡中所作的真梦和意有所指的喻梦之外，还有指一般睡眠的，有指典故中梦的，有指地点云梦泽的梦的，有记录他人梦的，这些梦大多没什么重要含义，我们暂且不予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采用涉及苏轼所作的真梦和意有所指的喻梦之诗词。傅正谷在其著作《中国梦文学史》的总论中将古代梦文学的表现形式归纳为记梦之作、梦中之作、梦喻之作三类①，由于记梦之作和梦中之作皆与真实存在过的梦境有关，我们不妨将此两类归入“真梦诗词”，将“梦喻之作”归作“喻梦诗词”，来探讨苏轼的这些涉梦诗词。

（一）真梦诗词

真梦诗词是作者对自己有过的各种梦境的真实记录。在这些诗词中，作者似乎可以与神相通，与天意会，顿悟天理。如《赠写御容妙善师》有句云：“天容玉色谁敢画，老师古寺昼闭房。梦中神授心有得，觉来信手笔已忘。”②苏轼认为皇帝的天容玉色无人能画得出，只有在睡梦中因为有神传授才得以拥有此画技，而这画技“觉来信手笔已忘”，一旦醒来便不复存在，因为醒来便不再

能与神相会。《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韵》表达了一样的意思，“闹里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③苏轼说在黄昏时与朋友游玩饮酒作乐，醉态中能入真境，“发天藏”，顿晓天机，醒来却达不到梦中状态，梦中所得之诗句早已随风飘逝，只闻到风中弥漫的草木香。类似的还有《书林逋诗后》：“吴侬生长湖山曲，呼吸湖光饮山绿。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儿贩妇皆冰玉。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瞭然光可烛。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不言寒，书似西台差少肉。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盏寒泉荐秋菊。”④苏轼很是欣赏林逋，羡慕他“梅妻鹤子”足迹不至城市的不慕荣利的恬适生活，甚至觉得林逋生活之处的佣儿贩妇也超凡脱俗不同凡响，赞赏之情如此之深，以致之前虽不相识却能于睡眠中梦见他，还能细致说出林逋外表“瞳子瞭然光可烛”，他认为这是只在与神际会的梦魂中才会有的美事。这也是梦之神秘之处。

真梦诗词还记录了苏轼在梦中可以灵魂出窍，预知某些未来之事。《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今年果起故将军，幽梦清诗信有神。马革裹尸真细事，虎头食肉更何人。阵云冷压黄茅瘴，羽扇斜挥白葛巾。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⑤诗首句的“果”字，说明之前作者肯定说过乔禹功（即乔太博）将被启用之类意思的话，而苏轼之前确实做过一首《铁沟行赠乔太博》，诗末二联云“老去同君两憔悴，犯夜醉归人不避。明年定起故将军，未肯先诛霸陵尉”，“故此云‘果’，（施注）”⑥。现在苏轼“幽梦清诗”又一次梦中有诗表示乔太博将被再起用之意，且

于现实中已然应验，故曰“信有神”，冥冥中似乎有神以某种不易觉察的方式告知一般。《杭州故人信至齐安》也显示了梦的此种不可思议，“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朝来闻好语，扣户得吴饷。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故人情义重，说我必西向。一年两仆夫，千里问无恙。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王注子仁曰‘先生《答陈师仲书》云：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⑦杭州人不忘苏轼，苏轼亦常梦至杭州，昨晚梦境又再次重现，更巧的是，第二天清早便收到来自杭州友人的信和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西庵茶等礼物，苏轼觉得又是“梦魂去”灵魂出窍的结果。在《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其略曰：“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横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盖实梦也。昨日又梦伯固手持乳香婴儿示予，觉而思之，盖南华赐物也。岂复与伯固相见于此耶？今得来书，知已在南华相待数日矣。感叹不已，故先寄此诗》：“扁舟震泽定何时，满眼庐山觉又非。春草池塘惠连梦，上林鸿雁子卿归。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⑧《归朝欢》（我梦扁舟浮震泽）：“我梦扁舟浮震泽，雪浪摇空千顷白。觉来满眼是庐山，倚天无数开青壁。此生长接淅，与君同是江南客。梦中游，觉来清赏，同作飞梭掷。明日西风还挂席，唱我新词泪沾臆。灵均去后楚山空，澧阳兰芷无颜色。君才如梦得，武陵更在西南极。《竹枝词》，莫摇新唱，谁谓古今隔。”⑨一诗一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认为潜意识的梦中可以预先知晓现实生活中还未发生之事，好像人真的有第六感似的，而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无法用常理解释，但就是知道。这也是梦之神奇之处。

真梦诗词还记录了苏轼在梦中的某些心理感受。《宿九仙山》“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玉室金堂余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岩冷逼身。夜半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⑩，苏轼梦至一世外桃源，岩石之间倍感冷气逼人，当此之际被老僧唤起夜半赏月，见到的却是山峰相接之间涌现的“冰轮”，感觉连月亮都是那么的冰冷。这是梦中之冷。《永

遇乐》（明月如霜）、《醉落魄》（轻云微月）：“轻云微月，二更酒醒船初发。孤城回望苍烟合，公子佳人，不记归时节。巾偏扇坠藤床滑，觉来幽梦无人说。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⑪则表现的是梦中之寂寞与失落。两首词一个“寂寞无人见”一个“觉来幽梦无人说”，可见寂寞之深失落之重。而《江神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诉说的则是梦中之悲伤与哀痛。“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⑫与妻子王弗生死相隔已十年（实为九年），在梦中妻子生前的一言一行历历在目，仿佛从未离开过。但现实中自己却已是满面灰尘两鬓苍苍的外放之人，与十年前有你相伴的春风得意于京城之岁月里的我已是判若两人，我们纵使再相逢也许你也认不出我来了。梦中面对生前亦妻亦友的深爱之人，也只是相对无言，泪流千行，其间之艰辛与疲惫难以言表。思妻之悲与人生之累，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沧桑！这是梦的自知之处。

另有《石芝并引》诗：“空堂明月清且新，幽人睡息来初匀。了然非梦亦非觉，有人夜呼祁孔宾。披衣相从到何许，朱栏碧井开琼户。忽惊石上堆龙蛇，玉芝紫笋生无数。锵然敲折青珊瑚，味如蜜藕和鸡苏。主人相顾一抚掌，满堂坐客皆卢胡。亦知洞府嘲轻脱，终胜嵇康羨王烈。神山一合五百年，风吹石髓坚如铁。”（引文为“元丰三年五月十一日癸酉，夜梦游何人家，开堂西门，有小园、古井，井上皆苍石。石上生紫藤如龙蛇，枝叶如赤箭。主人言，此石芝也。余率尔折食一枝，众皆惊笑，其味如鸡苏而甘，明日作此诗。”）⑬，说的则是自己在梦中的一种状态“了然非梦亦非觉”，在这种状态中，苏轼似乎半睡半醒，意识也是半清醒半模糊，在做梦时能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然后就觉得梦中一切就像是真实发生过一般。有的时候，梦与人生，假亦真，真亦假，真真假假难以辨清。后面要讨论的喻梦诗词很多也表达出这一感受。这是梦之虚幻性与真实性的结合之处。

真梦诗词（或诗句）有一些是苏轼于梦中创作的，且这类诗词的数量还不少。如《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十》：“我归自南山，山翠犹

在目。心随白云去，梦绕山之麓。汝从何方来，笑齿粲如玉。探怀出新诗，秀语夺山绿。觉来已茫昧，但记说秋菊。有如采樵人，入洞听琴筑。归来写遗声，犹胜人间曲。”⑭南园是苏轼与弟弟考完制策之后与父亲苏洵在京师宣秋门内买的住宅，作此诗时，苏辙随父亲居于园内，苏轼在凤翔府任内。苏辙便寄《赋园中所有十首》给苏轼描绘南园内的景观，苏轼收到后就作了这《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其实只有十首即前九首和第十一首是和苏辙的诗，第十首是苏轼在作完第九首后于睡眠中梦见与其弟游南山，弟弟示之新诗数十首（因为是苏轼所作之梦，诗当然也就是苏轼作的了，只是梦中托由苏辙说出而已），苏轼都非常喜欢，但醒后只记得“蟋蟀悲秋菊”一句，于是作了这第十首诗以发挥此句。类似情形的还有《记梦回文二首并叙》，其叙“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始晴，梦人以雪水烹小团茶，使美人歌以饮。余梦中为作回文诗，觉而记其一句云乱点余花唾碧衫，意用飞燕唾花故事也，乃续之为二绝句云”中说明又是因为醒后记得梦中一句“乱点余花唾碧衫”，从而写下两首回文诗。另《十一月九日，夜梦与人论神仙道术，因作一诗八句。既觉，颇记其语，录呈子由弟。后四句不甚明了，今足成之耳》、《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两首单从诗题即可看出也是为了成梦中之句而为之诗。当然，也有记得梦中作的整首诗醒后记录下来的，如《金山梦中作》、《破琴诗并叙》、《往年，宿瓜步，梦中得小绝，录示民师》、《梦中作寄朱行中》。苏轼特意记录了如此多的梦中所作诗与诗句，可见其是很喜欢梦中所作的诗的。也许是梦中诗句本天成，觉得潜意识里作的诗是为神授，这应该算是自然的最高境况了，而苏轼一直崇尚“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南行前集》序）的创作理念，非常强调创作之“自然”，故对梦中诗句的喜爱之情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也是梦的创造性。

（二）喻梦诗词

喻梦诗词在苏轼涉梦诗词中占很大一部分，这部分诗词中的“梦”并非实指，而是以梦为喻，抒发自己的人生感触，表达他对生命的体验及人生的思考。读这部分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透露出浓烈的“人生如梦”的生命意识。苏轼喻

梦诗词中的这种如梦意识，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今天的眼光看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感到似有还无的古今如梦；一种是以跳出人间的一种开阔眼光看自己和周遭人等的所为，感到恍惚虚无，一切现实的意义都变得微不足道的劳生如梦。而且我们可以说，古今如梦是劳生如梦长度上的延伸。

要体会古今如梦，我们先看《永遇乐》（明月如霜）：“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下景，为余浩叹。”⑮在一个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的夜晚，苏轼醒来行遍小园，看到的是佳人不再、楼门紧锁的燕子楼，不禁觉得从古至今都只是一个梦，这个梦以前不曾醒来，今后仍将延续，中间变化的只是往日的欢声笑语成了今日的忧愁怨恨。再看《念奴娇》（大江东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⑯站在历史的江边，曾经有多少豪杰在此谈笑风生，最是那雄姿英发的儒雅周郎，曾是那么的器宇不凡，如今他们都哪去了呢？随滚滚东去长江水逝去的，不仅是昨天，同样还有今天。我们以今视古，他们一个是燕子楼中深情的佳人，一个是“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雄姿英发的豪俊，然而无论是绝代的爱情还是惊世的功业，都只是烂漫一时，到最后，都不得不被时间的流水静悄悄地带走，而空留给后人想象的碎片。以后视今，一如以今视古：“异时对、黄楼下景，为余浩叹”，并由古今如梦推知到劳生如梦：“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于是苏轼从个人体验和历史事件里真切体悟出了“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和鲜于子骏鄂州新堂月夜二首，其一》）的道理。

第二种劳生如梦更是在诗词中反复出现，表现为两种形式，一为世事如梦，一为时间如梦。在苏轼那里，聚散交游如梦、去来旧游皆梦、旧

事成梦过，历历来路是梦、回首西湖是梦，肉身是梦、身世是梦、身外也是梦，万里家山一梦、繁华一梦、万事到头是梦，世事一场大梦、人间如梦。最明显的是里面虚化了的时间，确切的数字和虚幻的梦相结合，在苏轼眼里便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年是一梦、三年是一梦、五年也是一梦，七年是一梦、十年是一梦、十五年还是一梦，甚至二十三年、四十七年乃至千岁都是一梦。梦成为一个变化无定的数字，它甚至可以包容所有的岁月——无论今生还是前世(就像传说中壶公那只装满良辰美景和繁华滋味的酒葫芦一般)。可以说苏轼的这种如梦意识，是贯穿了其整个的一生。黄氏《蓼园词评·南乡子(霜降水痕收)》：沈际飞曰：……东坡升沉去住，一生莫定，故开口说梦。如云‘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君臣一梦，今古虚名’，屡读之，胸中鄙吝，自然消去”。⑩这种如梦的时间感使苏轼把现实人生放在一个更其宽广更其高远的视界中认识，从而使其心灵更加趋于宁静，以宠辱不惊的心境面对人生沉浮，以返归自然的态度对待现实人生。也正是由于苏轼的人生态度，使其涉梦诗词具有了独特的审美意蕴与艺术魅力，也让中国历代文人在事业受挫和人生悲困时找到了一个新的归宿和精神家园——梦。

二、苏轼涉梦诗词探因

苏轼涉梦诗词的作品数量如此可观，且内容丰富，大大反映了苏轼丰富的心灵世界，折射着他审美的人生观。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为何在诗词创作中对“梦”情有独钟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四点主要原因：

(一) 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当时社会风起云涌，为官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惨遭陷害，“乌台诗案”之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落在了自己身上，即使是直言如苏轼者也不能不稍加注意。故苏轼所作诗词，在表达某种特别的观念想法时，也会春秋笔法一把，刻意隐晦其意。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说：“若东坡先生之诗，则援据闳博，旨趣深远，渊独不敢为之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

某谢不能。”⑪陆游与范至能论东坡诗，至能建议陆游作书以发明东坡诗中之深意，陆游推辞，认为苏轼诗中有太多由于当时政治环境所迫而没说出来的意思，并举了两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现象。如此则可以看出，苏轼于当时是有很多难言之隐的，但他话语权又是那么的强烈，不吐不快，那么就只能换一种比较委婉虚化的方式，而“梦”以其虚幻性之特色可谓是虚化真实意图的最好手段了。

(二) 与其多变的人生经历有关

苏轼一生波澜起伏、坎坷不定，大起大落、变化莫测：他是名震京师的才子，又是被捕入狱的阶下囚。苏轼在乌台诗案之中饱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他经历过带罪任职黄州等地的贫困潦倒生活，也享受了集荣誉于一身的京都大臣的华丽生活。这种种人生中的幸与不幸的亲身体验，再加之苏轼的才力，使苏轼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起起浮浮如梦般的人生，让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人生如梦。而这一切将会影响到苏轼的各个方面，就更不必说会影响到他的梦，影响到他的涉梦诗词的产生了。事实也是如此，苏轼是一个多梦之人，这一点从他的《东坡志林》等作品可以看出。《东坡志林》中的《梦寐》等篇就记载了苏轼梦中作诗、梦中论文等各种奇梦怪事。可见，梦是很青睐苏轼的，苏轼也喜用梦来表达生活与内心。

(三) 与苏轼个人生活感受的敏锐度及其达到的思想高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过的一段话：“诗人是一个人，比一般人具有更敏锐的感受性，具有更多的热忱和温情，他更了解人的本性，而且有着更开阔的灵魂。”而苏轼这样的天才诗人比之一般的诗人，感受力只会来得更为的敏锐、强烈。如上面提到过的《永遇乐》(明月如霜)，水里偶尔的鱼跳、露珠从荷叶落下的声音，这种常人一般不会注意到的声响苏轼却听到了，并且还是那么的清晰，甚至连落叶飘零的声音在他听来都是铿锵有力的，此种感受力，无一定的敏锐谁能做到？另外，其自身的思想高度达到的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苏轼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反省自身，探索自我，解读人生、宇宙，又积极修行学道，融会贯通儒释道三教思想，已能站在历史、宇宙的高度来审查自我、审视人生。

如此，在时间的洪荒中和宇宙的浩瀚中，个人的存在是多么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匆匆几十年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四) 与前人文学创作多涉梦的影响有重要关联

从先秦至魏晋至唐宋，有无数的文人创作了大量的涉梦文学作品，屈原的《离骚》可以说是千古绝梦，庄子的梦蝶更是引起无数文人的探讨与赞同。此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等都有一些写“梦”作品。前人的这种对“梦”的大量描写势必会对苏轼产生影响。苏轼对自己的创作曾做过明确的说明：“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南行前集叙》)。可见，贤人君子之遗迹对其的影响。

论文注释：

①傅正谷《中国梦文学史》(先秦两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⑩、⑪、⑫、
⑬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70、1898、1343、682、601、1090、2408、492、1047、200、2833页。

⑭、⑮、⑯、⑰、⑱曾枣庄主编《苏东坡词全编汇评本》，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88、140、152、38、87页。

参考文献：

苏轼著，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张振玉译，林语堂著《苏东坡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傅正谷《中国梦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郑园《东坡词中的时间与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李霞《浅论苏轼之“梦词”》，《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8卷B6期。

周方《寄寓与超拔——解析苏轼言梦词》，《晋中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李杰虎《苏东坡“梦”词新探》，《洛阳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上接第58页) 启示：与永恒相较，任何事物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这是任何大话都改变不了的事实。但是说大话恰恰就是不讲事实，所以它具有虚构的美感。

讲假话劳心

贫苦人家连草编的席子也没有一张宽的，太短小了，宁可露着头面也要先盖住两只脚。

这人家的小儿子不晓事，有人问他：“你们家晚上盖什么呀？”他便老实说：“盖草席子。”家人嫌他说得太丑陋丢人了，便揍了他一顿，告诫说：“以后有人问起，就说我们盖着被子。”

有一天，这人出门去会客，而胡须上竟挂着几丝草席子拉下的草根，小儿子见了，追在后面喊道：“老爹，快把你胡须上的被子去掉！”

唉，看来说谎话也真是劳心费力，难得圆满的时候。

——《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杂记》

启示：说慌的苦恼在于编造的漏洞，堵不住漏洞就容易露出马脚。

两个大傻谈志愿

有两个大傻互相谈起各自的志愿来。一个说：“我平生感到最不满足的，只有吃饭与睡觉这两件了。他年我若得志，一定要顿顿吃饱饭，吃饱了便睡，睡醒了又吃……”另一个则说：“我跟你不同。我吃了又吃，一直吃个不停，哪还有时间睡觉？”

我来到庐山，听说这里的马道士最会睡，能够于睡梦中悟出什么妙道，但在我看来，还是比不上两个大傻真懂得“吃饭三昧”啊。

——《苏轼文集》卷七十三《杂记》

启示：傻蛋的“志愿”总是一种大实话，所以马道士的所谓睡觉的“妙道”，其实是骗人的鬼话，比不得傻蛋的“吃饭三昧”。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海南日报》原总编辑助理)

读《东坡志林》(二)

徐 康

悲天悯人的平民情怀

赵郡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名采莲，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俭，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与轼，养视轼之子迈、迨、过，皆有恩劳。从轼官于杭、密、徐、湖，谪于黄。元丰三年八月壬寅，卒于黄之临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黄之东阜黄冈县之北。铭曰：

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

——苏轼《乳母任氏墓志铭》

苏东坡虽然历经仕途，为官一世，但他并非高高在上而瞧不起平民百姓，而是以一种平和、挚爱的心境看待普通劳动者，对他们寄予同情，有时甚至流露深挚的怜悯与牵系。作于黄州贬居之所的《乳母任氏墓志铭》便是一例。

宋神宗元丰二年秋天，苏东坡因作诗讥讽当时的新法，被革职下狱；后于除夕奉旨谪居黄州。次年即元丰三年二月初一到黄州后，几经周折，定居于临皋亭。当年八月十二日，跟随他家三代、患难与共的老乳母任氏病逝。十月葬埋之后，苏东坡为她写了这篇墓志铭。

苏东坡开篇便直奔主题地叙说：“苏轼子瞻之乳母任氏”，直截了当地叙述这位来自家乡眉山的普通劳动者的身世：姓名、籍贯、父名（任遂）、母名（李氏）和简历——“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哺乳姐姐八娘和“我”，并养育照顾“我”的儿子苏迈、苏迨、苏过，且“皆有恩劳”；还跟着“我”的宦迹，一路到过杭州、徐州、湖州，最后谪居到

黄州。元丰三年八月十二日，乳母病逝于黄州的临皋亭，享年七十二岁。十月间，埋葬于黄州东边，位在黄冈县北边的土山。这一段看似语言平淡、直白，实则如实记写，使这位老乳母的身世不至湮埋。这足见苏东坡感念乳母恩德的良苦用心。而且，从中可看出这位乳母侍奉苏门三代，名分虽为主仆，感情却形同家人，亲如骨肉。“工巧勤俭，至老不衰”，可谓对其一身德行、劳绩的“盖棺定论”；而“皆有恩劳”则概而言之，总体似地予以褒奖，“恩劳”二字，既精练恰当，又饱含深情，寄托着苏东坡对这位普通劳动者的感念与厚爱。

作为“墓志铭”的最后一段“铭文”，饱含苏东坡对乳母的深情厚谊：活着的时候有人奉养她，不必是她自己的儿子；逝去之后有人葬她于墓地，不必是她自己的故乡。我希望您永远享用我们深情的祭祀，您的精神、魂魄将长存于世，弥漫于天地之间。

如此淳厚情怀，无疑地深藏着苏东坡对乳母的沉重缅怀与无尽哀思。通篇文字充满了人情味，洋溢着“家庭成员”似的依依追念之情。苏东坡尊重劳动者的悲天悯人的平民情怀，由此篇中亦可见一斑也。

追忆故友，感慨系之

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明年，余谪居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

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苏轼《忆王子立》

这一篇追忆文章作于元祐四年（1089）开封，又名《记黄州对月诗》。

苏东坡早年（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即1077～1079年），曾在徐州任知州。他在此文中追忆的，就是为官徐州时的几位年轻的朋友。王子立和王子敏兄弟俩，苏东坡在诗中曾称之为“王郎昆仲”，二人均在苏轼官舍，供职于书馆，也就是从学于苏轼。（其中王子立是苏轼之弟苏辙的女婿）。其时四川人张师厚因喜好诗词，与苏轼要好，也常来过访。那时候王氏兄弟正值年轻少壮，常常吹着洞箫，与苏轼饮酒于杏花树下。第二年，苏轼贬谪黄州，孤身一人，心境落寞，自然追忆旧友、感怀过往欢聚之事。想想那些旧游之地，想想曾一起欢宴的旧友，或许也是一种安慰。对月独饮，不禁思念当年与两位小老弟（二王）饮酒时的欢乐情景，曾有诗云：

“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花发忆故人，风露飒飒，小院孤寂独闭门！忆起与二王饮酒时的欢乐，苏轼不胜感慨系之。特别是念及好友、词人张师厚已去世多年，而今年王子立又遽然而逝，这真是令人悲哀之至啊！

苏东坡写此文时，友人王子立的死讯传到耳中，又勾起对另一位已逝友人张师厚的怀念，旧友“复为古人”怎能不令人徒添悲伤，伤感叹息呢！

这篇忆友之作，抚今思昔，语言精练，有浓郁的感情色彩和较为强烈的感染力。

知英州（今广东英德），接着一月之内三次贬官降职，最后贬为建昌司马惠州安置。当时的政局，正是元祐党人因反对变法而遭致报复惩戒的“风雨飘摇”之际。苏轼这篇文章便写于“始至惠州”之时，记叙了王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的风光景象。

那时候，苏轼寄寓于嘉祐寺松风亭。松风亭在归善县（属惠州）东面，周边有松树三十余株，亭则建在山上，临近嘉祐寺。此时苏轼年已六十，出行须用手杖，故有“杖履所及”之说。他几乎天天在此地散步，以至稔熟于斯，连鸡犬均能与之“相识”。次年，又迁到惠州东江、西江汇流处的一处行馆（“合江之行馆”），站在江楼上，能享受到明亮开阔、目极千里的疏朗景观（“得江楼豁彻之观”），而忘却了峡谷的幽静与深邃（“忘幽谷窈窕之趣”），也再不见往日的喜乐与忧虑（“未见其所休戚”），这也可见：岭南（峤 jiào 南，山道之南，指此地）与江北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同时可看出苏轼处于贬谪的困窘之中，仍能远观“江楼豁彻”的开阔胸襟。

苏轼用了大段文字描写他贬谪惠州、再迁合江之行馆，一路所见的景观，然后才突出正题——虔州（今江西赣州）鹤田山的处士王原（字子直）不远千里，来到这边地惠州探望他，一住七十日，现在才离去，这真是值得纪念的友谊啊！不嫌地处偏远，而又居留良久，足见王子直对苏轼的仰慕之情。临别依依，苏轼特作七律一首《赠王子直秀才》：“万里云山一破裘，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海上何人识故侯。”诗中既渲染了二人的友谊，更突出了王子直千里来访的不易与执著，读之可为本文拾遗补缺也。

困窘中仍见“江楼豁彻”

绍圣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于嘉祐寺松风亭，杖履所及，鸡犬相识。明年，迁于合江之行馆，得江楼豁彻之观，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见其所休戚，岭南、江北何以异也！虔州鹤田处士王原子直不远千里访予于此，留七十日而去。东坡居士书。

——苏轼《别王子直》

这篇文章写于绍圣元年（1094）。此年苏轼贬

重情亦好酒，送别醉陶然

子开将往河北，相度河宁。以冬至前一日被旨，过节遂行。仆以节日来贺，且别之，留饮数盏，颓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纸，故为作草，露书数纸。迟其北还，则又春矣，当为我置酒、蟹、山药、桃、杏，是时当复从公饮也。

——苏轼《别子开》

读此篇先得解题，弄清“子开”为何许人也。曾肇，字子开，建昌南丰（今属江西）人，为苏轼好友曾巩（字子固）之弟。宋神宗时，曾任吏部侍郎，后迁徙徐州、江宁等地为官。为政期间，直言敢谏，颇多善政。《宋史》列有小传。更重要的，他也是苏轼的朋友，此篇即是曾肇调任河北，苏轼往贺，喝酒送行，即兴写下的一篇札记。

苏轼开篇就说，“子开将往河北，相度河宁”（相度：观察测量；河宁：黄河安全可渡），而且写明“以冬至前一日被旨（接到调职的圣旨），过节遂行”（过完冬至就准备出发赴任）。苏轼作为老朋友，便趁冬至节日前往祝贺，饮酒饯别。在席间，“留饮数盏（杯），颓然竟醉”，可见朋友在一起，送别情深，又喝高兴了，难免弄成那副醺醺然的样子。二人正觥筹交错，喝得醉意陶然的时刻，忽见书案上放有好纸，于是操笔，起草书札数纸。此时苏轼仍在醉态中，想到朋友（曾子开）下次从北方归来，则已是明年春天的事了；那时候，当为我置办好酒，并以蟹、山药、桃、杏等春天佳果佐酒，我一定再陪主人（曾子开）痛饮，一醉方休啊！

因送别友人而饮酒，一饮而醉，醉后信笔而书，趁着醉意写下的全是醉后语。此番酒酣耳热之际，又想念着朋友归来时再备好酒酌酌一醉的状态，而且一一开出了下酒的菜单。如此描写醉态，实在酣畅淋漓，逼真传神。由此可见，一、东坡好酒，从告别酒想到重逢酒，酒兴甚浓也；二、东坡重情，冬天送别朋友就企盼着春天时老友重逢，别有一番浓情厚意在其中也。“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唐·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唐·李白《送友人》）。离别饱含深情，浓情自在酒中，文短而愈见情浓也。

这是一篇探讨学问、谈作文经验的文章。苏东坡虽是文章高手、作文奇才，然而却不以自己的经验为范本，而是借助于他人、尤其是借助于师长辈的为文诀窍，从中借鉴学习，引以为宝贵的财富。

苏东坡开篇就说，不久前（“顷岁”）有一个叫孙觉（字莘老，皇祐元年进士，官至御史中丞）的高邮（今属江苏）人，认识了当时的文学大家欧阳修（即欧阳文忠公），找机会（“尝乘间”）求教其作文之道。欧阳文忠公回答他：“作文没有别的高明之道或捷径之术，惟一的办法是：勤读书、多实践，自然会（将文章）写得漂亮、精彩。世间一般人以为文章字数不多，唾手可得；又懒于广读书，而是急功近利，每写一篇文章，即求超过别人。如此急于求成，便少有将文章写得精彩的成功者。其实呢，文章的毛病，不必等别人批评指正，只要自己多写多实践，便能自察而认识到。”欧阳修用自己亲自尝试与实践的经验告诫他人，所以这些话听起来特别有味道。

苏东坡借助孙觉（孙莘老）从欧阳修学习著文章所得到的教诲，如实道来，看似平凡质朴，实则寓理深刻。苏东坡记下的欧阳修的这段话，对学习写作的人是很有启发性的。我们平时写文章，总希望自己出手不凡、一鸣惊人，养成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毛病。其实，要写得一手好文章，没有别的诀窍，惟一的途径是勤读书、多练笔。我在学生时代曾经总结过“为文八字”：广读、精记、多想、勤练。除此之外，岂有它哉！在这篇《记欧阳公论文》中，说到“为文之道”，欧阳修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之，很实在，也很得体，因而在苏东坡看来，这比泛泛而谈更有滋味。这也说明了苏东坡所崇尚的，正是这种来自于实践的老老实实的经验之谈。

（四川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现名誉副主席）

勤读多写乃“自工”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tī），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天砾斯人

——《张志烈文录》序

张天健

初夏，桐阴向午，开始浓绿狮子山校园，应四川师范大学老校长皮朝纲之约，张志烈、王重纲和我去狮子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小聚。学子来归，文学院用一间清静闲雅的屋子、一杯清茶的简朴接待了我们。

志烈要我为他新近将出版的书著，写一篇序文，我难堪重任又盛情难却。

时光回溯五十年，我和志烈都受业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素心相契，最慕他天资绝伦。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川师中文系良师满庭，汤炳正、王文才、屈守元、徐仁甫……学生受业除师长课堂口讲指画而外，更多还须自我意识觉醒，去跋涉书山、伐柯琼林、采珠大海。志烈的作为定然有备，他平时除校授一门外语，另还自修一门外语，英、俄并进，在他，还不满足于一位普通师范合格生院校需求，志存高远。学业中，他对各门功课无一偏废，基础、专业全部精进，不落后尘。凡此种种，并不证明志烈为死钻学业百事不顾掉书袋的学生，他兴趣广泛，出任校文工团乐队队长，校内外演出，服务社会，炼自己多方面能力。那时候，我眼中的志烈，还只认为他成绩优异突出，精力弥漫而已。年级渐高，对于志烈，从我接触温江籍同学中，知道他的情况渐多，他毕业于温江中学，那是整个专区十余县共有的一所重点高中，学生来源又从各县重点中学拔尖保送，可谓重点中重点，志烈属于温中重点尖子班的尖子生。他曾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并在中学阶段读完了资本论，他的理科成绩也十分优异，曾在全专区物理统考中荣获第一。毕业后立意考北大哲学系，本以为对于志烈，只不过探囊取物，结果录入第六志愿，入选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是他高考临场失误吗？是川师独具

慧眼选中了他吗？那是政治灼热的年代，谁也不敢也不会询问因由。

狮子山的垂柳情牵志烈，他心无怨艾，青年英锐，一路风华，同学几年，他相处和睦，有几件事我深深感佩。一是在三年级受业古代文学时，元代杂剧作家关汉卿大悲剧作品《窦娥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誉为“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因此，要求全文背诵这部代表作品，同学们都以皓首穷经姿态全力投入，一时，琅琅书声成天在楼廊回响，唯有志烈，邻室室友来告知，他读了六遍就全文背诵。我暗暗吃惊，这种强记能力实属少见。志烈属于用记忆读书的人，又是用思考读书的人。六十年代，对古代诗词，中文系大学生是盲区，导师讲古代声韵、韵书，很多人没有弄清，不只是学得艰难，课业也不作要求，所以，中文系大学生毕业后不通声律，不懂诗词，遑言创作？一次，我偶然走进志烈寝室，见他临窗用小字书写贴了一首自撰的小令词《西江月》，只记得末二句：“清风明月半壶茶，那管长冬短夏。”大约抒怀写他读书问学状态，这已见他迥出时流的水平。

岁月匆匆，四年大学生活行将结束，凡学子都必须接受洗礼，红专兼备，表态的汇报都要贴在墙头，相互观摩，志烈的纸页十分简明，要以全优总成绩向祖国汇报，这四年的所有功课，包括非专业的公共课，他都做到了全优，我一惊回首，这不仅令同辈汗颜，而且惊异；我深为感佩、仰慕，心中总想，志烈可算奇才。

1963年，国家忽然公布，收录研究生，凡应届大学毕业生均可报考，将是规定合格的师范生只能作中学教师的打破，对于志烈，将是天降奇缘，转

变的机遇。绝大部分同学自感大学毕业也是可望不可及的遥远，要与全国五年制名校那么多高材生争胜文场，都望而却步。志烈以一个四年制普通师范院校应届生资格参考应试，考的四川大学中文系庞石帚教授门下的唐宋文学研究生，谁也没有料到，他的考分竟高列龙虎榜，一时间惊爆了锦官城教育界。据传，北京大学两位考生考分总和，才与志烈相匹。川大自己推出的高材生应考，都无法与之竞争，自称“考不赢狮子山”。初录仅是第一关，其次尚有论文、面试答辩，师范院校毕业生并无论文必备，对于志烈，应当是慌了手脚！志烈不然，却从容面对，在系主任屈守元教授亲自指导下，志烈潜入书海，师高弟子强，时川师名师雷履平在课堂神采飞扬讲道，没有想到我们教出了敢与所有名校争胜的高水平学生。现在，学校甲级图书室（只有中文系教师才能进去的善本、秘籍书室）为他单独开放，享受这样规格的待遇。志烈论文的选题是《论孟浩然》，在短短的两月时间，研究便出成果。临暑假前，我因大儿子出世回崇州老家看望，返校后，同组陈开良同学告知我，志烈意欲请我帮助抄誊论文，可惜等不及而未果。我后来曾问及志烈，他说已完成答辩。我再问及考研情形，他说中山大学的考研题为陈寅恪制定，就是将李白的一首绝句诗按平仄临场翻作，据说，将考生才情、智慧、辞章、文法都一一考核。这很新鲜，确实也难坏了当年的高材生。我想，如果志烈，也绝不会被难住，他离校前自作律诗有句：“雄心欲与秋鹰奋，令节思成菌桂香。”才情、学识、志向都能以见一斑。

天砾斯人，扬旌分袂，志烈如愿入四川大学深造，我分配大邑县山乡鹤鸣中学，从此殊途各异，几年后又逢文革，天下混茫，我在乡野，暮云春树，秋水蒹葭，与志烈相与书函，时有诗作切磋，他有：“白卷人生过，青春纸上流”之句，知他心情不适，源于川大城府深宅，颇有门第观念，但可知志烈秉赋与实力，劝他与庸流决裂，与成见断交，“板凳宜坐十年冷”，他的诗中有“汉史闲评空激情”，“十年碌碌”，“梦醒扬州”之句。

志烈守正教坛，其教学踔厉风发，激扬慷慨，深得川师名家教授的蓄养。他1979年参与《宋文选》选注，并撰写前言，游历京华，在全国众多前辈学者欣许下起跃、腾飞。

三十年过去，时间检验，历史认同，志烈的成果已如“生平简表”略述，广为国内外学界认知，

他受任前辈学者重托，身挑杜甫学会与苏轼研究会会长重任，主编《杜甫研究学刊》、《苏轼研究》，主编《杜诗全集今注本》，承担古籍整理项目《苏轼全集校注》等重大工程。

志烈为人，坦诚爽直，上世纪九十年代，我认识志烈乡友杨作章（温江某乡中学校长），谈及志烈从前，都分外感叹。1958年灼热的政治，已悄然伤及身心，他虽出身农家子弟（贫农），却不容于时，那年秋收，中学生参与劳动收割，稻谷过秤上报产量，一挑挑过秤，都以惊人数字填报，这是为了放“卫星”。志烈少不知事，在田间放言，是换了秤砣？是谷挑藏了石头？本意揭露虚报浮夸，可是听到乡、村、大队干部耳中，变成攻击大跃进和三面红旗，风声鹤唳，反映到校中，高考，志烈已铸定为政审材料，大学不录取是必然的。据杨作章说，是校领导惊动温江地委领导，去省招办力争，才成为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入学的由来。我的母校慧眼识灵根，一代奇才，几乎取湮当代。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昌盛繁荣，我也从蓬窗茅户乡村中学调入教育学院（成都大学），一些书著与志烈交流。2005年，我的又一部《唐诗答疑录》新著出版，其中几篇关于研究杜甫之作，都曾经由志烈主编的《杜甫研究学刊》先行发表，感谢故友相知，我寄赠志烈书时，并撰《赠志烈》绝句一首：

诗花笔砚浪风流，宦海情场两罢休。
一剑横天曾笑傲，风霜忽老少年头。

志烈以和诗回赠：

笑说沧桑岁月流，纵横健笔自难休。
青城高卧轻千乘，几度红尘未白头。

两诗后来载入我出版的散文集《逝水流伤》，我与志烈无杯酒接殷勤之欢，诗来书往，记录我们弥足珍贵的交谊。

2010年秋，我受邀去湖北黄冈参加“2010年中国·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其时我寓居上海，长天寂寞，秋水怀人，想此次将与志烈重逢，叙旧。去黄冈后，方知他因事未临，会间得识四川大学邱俊鹏、曾枣庄二位教授，他们莅会是为黄州“苏东坡纪念馆”揭幕剪彩，邱俊鹏、曾枣庄、张志烈先

后都是苏轼研究会会长。对于1963年志烈考研事，邱教授还知一些备细详情。他当时是文学史教研室副主任，参与其事，取录志烈时，另有教授以为志烈属师范院校生，虑其先天不足，主张另择名校高才，这种门户观念，几乎葬送志烈一生。听邱教授所述，更感真金火炼，人生多艰。1965年，庞石昂教授病逝，两名研究生改由文学史教研室主任杨明照和副主任邱俊鹏指导。

小聚已过去一个多时辰，我向老校长古典美学家皮朝纲汇报说：“志烈是川师大学子中翘楚奇才，学术精英。”校长高兴地笑了说：“是的，师大校史承载了光荣，都记录了他。”回头我问志烈现在还忙什么？他有些无奈，辞谢了很多工作邀请，包括全国最有影响的古代文学刊物《文学遗产》邀他写文，他都辞谢了。我恍然一悟，是他的家庭。志烈大学时，与曾繁萍相恋，繁萍是中文系我班级的淑女，品貌温文娴雅，临毕业，恋情似才公开。据传，因为志烈是农家子，并不被她的家庭看好和接受，在世俗观念城市接受乡村的矛盾中，尽管他才华出众，如果一旦分配中学教师，远走天涯，所以要求志烈必须考取研究生为前提，志烈作到了。志烈入川大深造，繁萍被分配成都市28中任教，1967年二人才走入婚姻殿堂，伉俪携手。记得那时期，我的爱人因病远从县城来住省人民医院，他们二人同来看望，我从心里希望他们或如陆（侃如）冯（沅君），或如程（千帆）沈（祖棻）珠联璧合，或充满红袖添香的助学情事。当然，繁萍的付出又是不同，中学的繁重教学，子女的生育教养，她完成了贤妻良母的职责，也就支持了志烈事业的成功。时代的波峰浪涌，她们风雨同行，携手四十余年。谁料风云莫测，繁萍几年前身患癌症，直接撞碎了志烈身心，事业的盛年，夫妻的濡沫，他一起兼顾，但必有主次，他首选照料繁萍，分担痛苦，亲侍汤药，须臾不离，这使繁萍生命至今已延续数年，我曾经于前两年两次到他家看望，繁萍形色虽减，健康仍在，令人欣慰。当我问及繁萍近况，志烈伤情地说，近已多病沉疴，失忆，痔疮交并，他抄与我一首诗作，并说小聚后他将尽快回到繁萍身边。诗抄录如下：

2011年冬，与繁萍住东大肛肠医院，深夜，繁萍忽又失忆，因彻夜不眠，流泪书此。

上帝怜卿太苦心，删除记忆赐安宁。

春蚕蜡炬前身梦，死别生离对面情。
两小无猜俱白首，如宾相敬念青衿。
诚知此痛人间有，一寸光阴一寸金。

志烈苦心，繁萍病状，读来荡气回肠。

人生是一场圆梦过程，穿越50多年时光，我惊叹、感喟：春去秋来，多少人浑浑噩噩生老病死，没留印记；潮起潮落，多少人随波逐流，不著痕迹。然而志烈，怀揣梦想，让命运与灵魂碰撞，擦出一束束明亮耀眼的火花，让生命的豪迈气度在春花秋月里谱写了壮美的豪华篇章，虽然明明暗暗有那么多曲折，过来了，成功了，过程的经历是一笔沉甸甸的财富。临别，我对他说：“人生能够如此，朝华夕秀，案牍劳形，足矣。”

时间让我考述了志烈的人生碎片，完整起来，我只为志烈的学术人生写了生活的旁面，无能直及他的学术成果。序说是自由的，因此，不避高下，不避琐屑，申说愚衷，希望有片羽吉光，能为知者采撷。“文录”的内容分为“杜甫研究”、“苏轼研究”和习学丛稿三部分，都是志烈数十年教学之余艰难笔耕的成果，读者一览便知，我就不再多说了。是为序。

2012，春末于都江堰市成都大学板房屋

（成都大学中文系教授）



（5月19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教授应邀访问山东诸城时接受电视台采访）

《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出版弁言

杨胜宽

《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是我2001年获得的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立项课题。这个课题是在《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1996年四川省社科规划课题,2001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基础上的进一步扩展与深化研究。读者可以从我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苏轼人格研究》所体现的研究基本思路:即从苏轼本人的研究逐步扩展到苏轼周围文人圈子的研究;从苏门文人的总体扫描到苏轼与这些成员关系的个案研究,从而把我对苏轼及北宋后期文坛的关系研究引向深入,并由此加深对苏轼本身的认识了解,更加准确地评价他在北宋文坛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这种研究方式始终贯穿了我从最初就力图实现的一个研究理念:即对苏轼这样的文化巨人,必须从文化学的广域角度切入,才能真正看清他的多个侧面与层面,更加接近于他的真实面目。

由于本课题与《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的密切关联性,需要对《概观》的有关情况作一介绍。1997年,作为乐山行政管辖县份之一的眉山,获准升格成立地级市,正式从乐山分离出去。眉山是北宋文学世家“三苏”的故乡,有“千载诗书城”的美誉。眉山的地方领导从建市之初就确立了“传承三苏文化、弘扬东坡精神”以彰显地方文化特色的发展战略,1998年春,着手纪念苏轼去世900周年暨全国第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的准备事宜,决定组织编撰《三苏文化丛书》,分别邀请眉山、乐山、成都等地的专家学者撰稿。该丛书2001年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共计12册,我的《苏轼与苏门人士文学概观》即其中的一种。当丛书组稿者跟我商量选题时,我的立项课题的研究已近尾声,将其列入丛书,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但由于《三苏文化丛书》12册统一定价(268元),每册不能零售,所以给一般只想购买其中感兴趣的某分册的

读者造成不便,反而不利于该书在市面上的流布。

《概观》分为“鸟瞰苏门”、“苏门形成的历史条件”、“苏门人士的政治遭遇与人生经历”、“苏门人士的文艺思想”、“苏门人士的文学创作与成就”、“苏门门风与苏门特征”共六章,对涉及苏轼与苏门文人群体的总体情况和主要内容进行了扫描,根据古今研究者开列的北宋后期受苏轼影响的文士名单,提出苏门文人群体有名姓可考的人员约有五十名左右;又根据《宋文鉴》几种代表性文体所收录的苏门文士的作品进行统计,确知其数量约占全宋三百余年作家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接近一半,证明了苏门文人群体在宋代文坛上的强大实力及其无可争辩的代表性。这样的总体鸟瞰和定量分析,对于我们了解苏门文人群体的文学特性及其在宋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然而,鸟瞰与扫描研究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容易忽略为数众多的一般性作家,即便提及他们也往往是“蜻蜓点水”,语焉不详,难以深入到某一个作家的许多“细部”进行考察,尤其是他们各自与苏轼的关系如何,往往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遗憾。于是,在《概观》出版以后,我就有进一步对苏门文人群体作更深入具体研究的打算,2001年的课题立项,就是基于这样的目的。

《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的研究方式与过去所采取的注重学术著作总体篇章节次设计的做法有所不同,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由于我自己长期从事学校行政管理工作,可供支配的时间比较分散,能够自主安排的时间多为节假日,时间的非整体性与非连贯性,使我决计采用分散时间作“个案研究”来推进课题开展,这不能不说这是行政工作性质对研究工作造成的客观限制。二是课题内容本身的特点适合“各个击破”似的分散研究。因为苏轼与苏门每一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情况各有不同,只

有逐一加以考察才能把各自的异同之处搞清楚。所以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单篇论文的组合，也许“整体效果”不很理想，但有助于那些对苏轼与苏门文人关系感兴趣的人们，弄清一些深入具体的问题。比如同样是苏轼评价很高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和秦观，虽然他们在文学和仕途上都受到苏轼的深刻影响，但他们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存在明显差异，从二人在贬谪中的表现和最后的结局看，黄庭坚在逆境中的豁达乐观更与苏轼相近，而秦观始终没有摆脱“古之伤心人”的悲情困局，所以英年早逝于贬所，为宋代的党派纷争付出了生命的沉重代价。又如苏轼与黄庭坚在宋代诗歌史上以“苏、黄”并称，在诗歌理论上都提倡“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而他们各自所赋予在这一口号上的内涵并不完全一样，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二人创作道路和文学风格各有不同。这样深入和具体的“细部”问题，是鸟瞰和扫描似研究难以着力的。

自然，形式的分散不等于课题内容的散乱和缺乏“聚焦”。我在分别考察苏门人士与苏轼的关系时，始终关注他们交往的时代政治背景、各自的人生处境、他们交往的内容和形式、这种交往是靠什么共同价值取向维系的、这种交往的作用与影响如何等等核心问题，以这些因素作为评判他们是否构成同一文人群体的重要标尺。苏轼自己说过，“君子和而不同”，他与苏门人士的确是因为有共同的思想信念与人生价值观，以及相同的爱好追求而走在一起的，而不是由于有某种利益动机或肮脏交易，这从苏门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在苏轼处于仕途逆境之时走近苏轼并与之缔交可以获得验证。比如“苏门四学士”，在苏轼元祐初仕途显达前就已经订交，陈师道、毕仲游、道潜、米芾等，均与苏轼交往很早，并且交往的动机，都不是因为苏轼在政治上能对他们有什么帮助，而是仰慕他的文学才能，希望得到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指点和评介。通过苏轼与苏门人士交往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坚信：苏门文人是以追求共同的文学事业而自然形成的文学团体，这是他们聚合的真正和主要目的，他们的作用与影响也在于此，这是该群体与宋代其他派别或群体最明显的不同；当时洛、朔党人攻击他们以政治为目的，并不遗余力地对苏门人士进行打击迫害，那纯粹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是苏轼与苏门文人群体所具有的性质与特征。

本书由“苏轼论”、“苏轼与苏门人士论”和两

篇“附录”构成。“苏轼论”收入近年所作研究苏轼的论文 10 篇，内容比较宽泛，涉及苏轼的哲学思想、文化观念、经学著述、艺术个性、人生经历与政治变革的关系以及对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等，反映了我对苏轼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巨人的思考与关注点。“苏轼与苏门人士论”由 21 篇论文构成，分别研究了苏轼与 14 位苏门人士的关系，有的探讨的问题较广，如苏轼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异同比较，还有他们在政治、军事、变法、文风以及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广泛考察；对苏轼与秦观、张耒、李之仪诸人的关系也有不止一篇的论文进行探讨，这并不表明他们在苏门成员中特别重要，而是感到有些话题需要另文讨论。迄今为止，苏轼与苏门人士的相关研究对我而言并未结束，日后还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其他对象与话题进行研究，本次结集出版，只反映了之前的研究成果。《苏轼研究方法漫谈》作为“附录”之一，是希望帮助读者了解我研究苏轼所重视和采用的基本方法，如果能够对研究者有所启迪，那当然是大喜过望了；《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的形成》则希望帮助读者对该群体的概况建立一个轮廓式印象，以利于再对本书谈及的话题的深入理解。

本书汇集的论文多数已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中与同行交流时，有对苏门文人群体感兴趣的朋友希望能够将分散不便查找的相关论文汇集在一起以便观览，这对我既是鼓励又是期待，因此有此次整理出版之举。在该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得到了曾枣庄、张志烈等先生的热情指导与大力帮助，使我的研究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并不断修正完善；我的妻子黄永一女士阅读过我的多数论文，并从资深编辑的专业角度对文章的形式规范提出了许多建议，并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为该书的出版大力提供了财力支持；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基藏书库为我使用《四库全书》提供了特别服务，——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于古嘉州之乐山师范学院谦学斋
二〇〇九年仲秋月

（乐山师范学院教授、纪委书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敢立潮头亲浪花

——赖正和先生苏学研究述评

孙开中

一、其人印象

赖正和先生素以作家编审名世，究竟何时迷上苏东坡研究，之前我并不知晓。因为学术研究本身就是苦事、难事，特别是像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巨人，要真正读懂他，熟悉掌握“庞然大物”式的研究对象，不是靠几本普及宣传读物就可以办到的。因而，王水照先生在《永远的苏东坡》说，苏东坡是“说不完”、“说不完”、“说不透”的，但总得有人接着说呀！否则，学术研究就会中断，社会就会停滞。

我向来认为：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应该在于有所发现和有所创新。否则，只会给后人留下一堆需要清扫的垃圾。

赖正和先生关于苏东坡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和《苏东坡政治主张探究》两本书中。苏东坡与北宋政治变革的关系，特别是他的政治主张的价值判断，在苏学研究中，难度大、忌讳多，可以说是个费力不一定讨好的大题目。幸好当今讲究实事求是，思想解放，提倡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可是真正实行起来，人为的新、旧障碍还是很多的。这支大螃蟹，多数聪明的研究者绕道走了；另一些见解卓越的专家教授在充分肯定苏东坡的文学成就的同时，也逐渐试探着肯定苏东坡“思想家”、“改革家”的有限贡献。但真正有分量、有说服力的专著一本也没有。眉山建地区（市）不久，高瞻远瞩的新班子领导着意组织部分学者分专题研究，推出了《三苏文化丛书》。尚在乐山市工作的赖正和先生，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日以继夜，不惜挑灯苦战，应约按时向在三苏故里眉山召开的“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暨全国第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提供了这方面的开山力作《苏轼与北宋政

治变革》。柳絮在序言中评价说：“书中有好些观点，当属苏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赖正和先生系苏东坡的同乡，退休后回眉山定居。他比我略大几岁，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历史文化名城中，我算是被苏东坡吸引几十年来扎根落户眉山的外乡教育工作者。由于社会兼职工作的需要，也应约、应邀写点以弘扬三苏文化和东坡精神的微型研究文章。退休后，被荣幸聘为“三苏文化研究院”首批“特约研究员”，为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干一点打杂的活儿。于是，和赖正和先生的学术交往多了起来。

赖正和先生很勤奋，不管什么体裁的作品文章都能写，但是，丁是丁，卯是卯，不哗众取宠，不要花枪，不搞“合锅闹”。在学术研究方面，我很佩服他的认真、执着和严谨。十余年间，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提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热心奔走于苏轼遗迹遗址地徐州、黄州、常州、杭州等地，因系退而不休的作家身份，为来往路费和出版经费的筹措，伤脑筋则是不言而喻的事。

按说，我和赖正和先生既不沾亲，也不带故，是纯而又纯的学术之交、文化之交。可是我佩服他对人对事的真诚。每当看到他，我就会想到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的：“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在苏轼研究这个领域，我一直把他和有过文笔交道的“无冕学者”孔凡礼先生并列，和近代“笔下常带感情”的文化大师梁启超相比，赖正和先生的学术文章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保持一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

说服力强，没有多少漏眼可抓。这种功力可不是那种心态浮躁、急于成名成家的青年学者短期内所能达到的。

在我看来，好的学术文章关乎世态人心，影响社会和历史的走向。由于各种原因，含金量真正高的学术文章不一定大家都欣赏，因为它往往淡乎其无味，近于老生常谈。赖正和先生阅尽繁华，偏偏喜好上了这一口。已过古稀之年的他精神矍铄，说话写文章有板有眼，心态年轻着呢！

二、其人苏学研究成就

在当今苏学研究领域，赖正和先生不是那种坐拥书城、所谓桃李满天下的大师，而是敢讲真话、开拓进取的骁将和黑马。

像苏东坡这种被西方人确认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文化巨人，如果国内的研究还是把他局限于文学成就和人为限定的政治思想框架内，岂不损害了研究对象的真实价值和完整性？

赖正和的《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十七万字，共有五章，分别为：一、苏轼提出政治变革主张的社会背景；二、儒家学说是苏轼政治变革主张的理论依据；三、苏轼政治变革主张的具体内容；四、苏轼与王安石变法；五、苏轼一生关心救助民间疾苦。逻辑严密，首尾钩连，语言通俗易懂，有书卷气却无自我卖弄的腐儒气和痞子气。其中精华是“苏轼与王安石”，具体内容有：“苏轼和王安石都主张改革”、“苏轼强调富民，王安石强调富国”、“苏轼强调任人，王安石强调任法”、“苏轼主张渐变，王安石主张急进”、“苏轼全面批评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苏轼主张以害不害民作为衡量法该不该变的标准”。文章条理清楚，论据确凿，对比鲜明，评判公道。读了之后使人会联想到作者在写学术文章之前，是否作过账房先生和断案法官，不能不使人会意称奇。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张志烈会长评价说：“《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一书，集中研究苏轼的政治主张，书中对苏轼改革主张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具体内容作了考论，并用以和王安石变法主张相比较，非常清晰地说明了苏轼政治思想形态和其历史价值，对于在这个领域借鉴前人，发扬华夏优秀文明传统，很有现实意义。”

在俗人眼中，赖正和先生的学术著作登上大雅之堂，即获得如此高的评价，应该说是一件非常荣幸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可是赖正和先生异常平静，他对诱人的物质利益看得很淡，对“俗儒”看重的虚名也能正确对待。他说话写文章，依然像山中汩汩的泉水那样清澈、透明和自然。

翻开赖正和先生《苏东坡政治主张研究》一书，就会知道他对苏学的研究很深入，涉猎的范围很广。他认定的事实和观点，会坚持不懈地宣传，敢与名人、高手磋商。也许这正是当今文化界，特别是学术界需要弘扬的风气和精神。那种自说自话、光鸣不争的作法能促进文化和学术的繁荣吗？见识有限的伯乐能相出千里马吗？

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综述”高度评价赖正和提交的论文：“赖正和的《读〈康震评说苏东坡〉后与康震商榷》一文用大量事实，对北师大教授、文学院副院长康震关于苏东坡政治保守、反对改革以及打击报复改革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对苏东坡、王安石二人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比较研究，更加突出了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合理性。这样的文章针对性强，观点鲜明，可读性强。我们应该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比较和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学研究才能出更多人才、更多力作。”康震先生是我国近年来涌现的青年学术明星，其《康震评说苏东坡》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播出后，影响巨大。2009年8月5日，他本人亲自来到眉山听取意见，我作为赖正和先生的“挚友”，当众和当面转达了赖正和先生的意见和个人的一些看法，会后他亲口向赖正和表示“完全接受”和感激，并当众宣布自己将加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承诺日后重新改写苏东坡评传。

有学者私下讲，苏轼研究似乎差不多了。从有关苏轼历史资料的整理、发掘看，可以这么说；但真正从研究的角度看，则不以为然，因为中国学者的视野正逐步开阔，研究的方法、手段也在更新，苏轼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定位需要进一步巩固和确立，学者们研究成果的流布和运用可以说刚刚起步。苏轼研究的前景无比美好，说任重而道远还差不多。

三、众多的知音和同道

赖正和研究成果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

以往介绍一个学者成就的时候，侧重于个人的努力和打拼。赖正和先生似乎不能这么评说。

当初如果没有独具慧眼的伯乐的引荐，他可能止步于文学创作、编辑的本职工作，加上苏东坡的粉丝而已。我以为，一辈子没有用上的学问事实上等于零。然后才能说，他的《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得力于个人的“厚积薄发”。此书由此产生的社会作用不是瞬发即收的“轰动效应”，而是悠远绵长的“浸润效应”。他的知音和同道是逐渐增多的。他言了大专家言到而未言透的大话题，启发了更多的知音和同道一起弹唱起来、议论起来。他不仅发出了今日眉山人的声音，而且在苏学研究及整个中国思想界发出了新时代的声音。难能可贵的是，已经得到国内众多地方学人的支持和响应。

1980年9月眉山，第1次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上杨明照教授讲：“苏轼又是一位既有识又有为，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的政治家。”国内外知名的学者如朱靖华、王水照、曾枣庄等，在他们的学术著作或作品中都表达过同样或类似的观点。

1982年11月黄冈，开幕词说：“前年秋天，我们在北宋文豪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开了第1次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苏轼研究会。那是一次为苏轼恢复名誉的大会，着重讨论了政治上如何评价苏轼的问题。”“综述”说：“一种意见认为，苏东坡反对新法是错误的，但他有别于司马光。他能勇于纠正错误。在旧党执政时，反对尽废新法。另一种意见认为，苏东坡反对新法虽是错误的，但其讽刺新法的作品如政治诗则应当肯定。”

1986年11月平顶山，第4次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中说：“关于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问题，代表们也展开论争。有的代表认为，苏轼是站在保守派的立场反对变法；有的代表认为，苏王都是革新派，两人的不同是渐进与激进之别；还有的代表认为，苏轼、王安石分歧的焦点是变更吏治还是变更法治。”

1988年11月杭州，第5次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吴战垒、唐玲玲等学者表示：“苏轼是东方文化、东方精神的典型，应将其置于世界文化背景中，从中寻找其位置，以便进一步把握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1990年8月凤翔，第6届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说：“有的代表还从经济的角度评述了苏轼文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农商并重节人口、颂廉崇贤

争民富的经济思想。认为博通经济史重经济，农商并重节人口是苏轼的经济创见。苏轼关于‘人多为患’，重视人口发展与经济的关系；重视经济政策与法制对解放生产力、稳定社会、活跃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及提出预购、赊销能扩大商品流通的观点等，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我国的经济思想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1992年9月烟台，第7届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说：“对于苏轼这样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名人来说，他所奉献给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他的意义和历史地位，对我们今天的作用和关联，我们的研究还是很不够的。我们需要继续加强苏轼研究的现代意识，努力寻找苏轼和当今社会实际存在的内在的联结点，古为今用，以期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也需要继续加强历史感，更能贴近宋代的整个历史文化环境，努力还原苏轼的本来面目。”饶学刚先生“主张注意借鉴东坡民为主体、农商结合的经济思想来增强我们的改革意识和公仆意识；借鉴东坡人际和谐的伦理观念来完善我们现代行为科学的激励机制；借鉴东坡天地人三者融和的空间文化理论来建立我们当代的生态环境学、旅游文化学体系。”

2000年8月栾城，第12次苏轼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张志烈会长在总结发言提到的论文题目有：《议论常公于身后——宋人对苏轼的评价》、《〈六事廉为本〉是苏轼政治思想之精髓》、《苏轼是宋朝务实的改革家》、《苏东坡：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等。

以上我粗略钩画了与赖正和先生学术专著相关或相近的研究情况，目的在于说明其学术研究不是孤立的，他植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学术土壤，他有众多的同道和知音。我们在评价任何一个学术成果的价值时，总要把它纳入具体的学术环境和范畴，进行认真的比较、分析甚至鉴别，这样，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判断。那种靠市场吆喝声大小、或名人权要个人偏好定是非高下的作法是不科学的。

我想，像赖正和先生这样宝刀未老的学者今后是否可以“再立新功”姑且不论，但“敢立潮头亲浪花”的精神不能丢，而且年轻的学者，应该主动学习，争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那么文化强市、省以至整个国家的梦想早迟会变成现实。

（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七）

池泽茲子

二 苏文注评及其意义

在江户时代随着《古文真宝后集》、《文章轨范》、《续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读本》等总集的流行，很多人爱好苏轼的文章。这些总集的注释书或评论书也陆续出版了。在此分别介绍一下，先看苏文。

古文真宝后集

如上所述，在江户时代初期受到五山文学的影响，《古文真宝》非常流行。它的版本较多，其中在日本最流行的是在室町时代传到日本的元本（黄坚编，至正二十六年林以正删定、注释）。在室町时代翻刻这元本出版了《魁本大字诸儒笺解古文真宝》前后20卷（前10卷，后10卷）。这本书在室町时代已经很流行，不少五山僧讲过这本书，做过注释。据柳田征司的《桂林德昌讲一元光演闻书〈古文真宝抄〉、彦龙周兴讲某闻书〈古文真宝抄〉》①，现存五山僧写的《古文真宝抄》如下：

文明十四年（1482）左右（据柳田氏推测），
桂林德昌讲一元光演闻书《古文真宝抄》；

同时，彦龙周兴讲某闻书《古文真宝抄》；

大永五年（1525）笑云清三抄《古文真宝抄》；

天文三年（1534）祖良编《古文真宝抄》；

天文十年（1541）彭叔守仙抄《古文真宝抄》；

柳田氏云，《古文真宝后集》比《前集》流行更广泛，因此注释《后集》的书比注释《前集》的更多。在《后集》的抄本中传播最广的是笑云清三的《古文真宝后集抄》。首先根据柳田氏的研究，简单地介绍一下该书的情况。

笑云清三《古文真宝抄》有几种。一种是抄写本，现在收藏在米泽图书馆、蓬左文库、静嘉堂文

库、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等地方。一种是古活字版，现在收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米泽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尊经阁文库（以上元和三年即1617年刊）、龙谷大学（无刊年）等地方。另一种是江户时代前期的版本（制版），现在收藏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东京大学史料编撰所、庆应义塾大学三田情报中心、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地方。

《古文真宝后集》的编辑方法和《四河入海》相似。笑云清三首先收集几个人的注释，然后加上自己的看法。他主要收入的是桂林德昌（笑云引用时写作“松”）、湖月信镜（“湖”）、一元光演（“一”）、万里集九（“梅”）的注释。桂林德昌是临济宗大觉派的僧侣，法讳是德昌，道号桂林，室号地名武陵，别号松窝。永享四年（1432）五岁时在建仁寺为童行，学内外经典，以英俊名驰天下。后来在伯州安国寺嗣和甫忍的法，后来他住在江州石头庵和建仁寺西来院。延德元年（1489）为建仁寺的住持。他在建仁寺西来院的时候，埋头读书，写《史学提要抄》、《古文真宝》和《三体诗》的注释。

湖月信镜，字湖月，号蓑庵、楠溪、丰阜等。小时入桑门，以东福寺商霖信佐为师，后来奉幕府之命为东福寺的住持。不久退住在大慈院，为学徒讲佛、儒典籍。他经常讲《古文真宝》，亲自写《古文真宝抄》。

一元光演是势州人，曾住在真如寺。他曾听桂林德昌的《古文真宝》讲解，抄写《古文真宝抄》（关于此书，在柳田氏论文里有详细解释）。

关于万里集九，请参看第二节。

笑云清三《古文真宝前集抄》和《后集抄》现在收入博物馆《汉文丛书》第11卷和第12卷里。

在江户时代庆长十四年（1609）和元和宽永年

间（1615～1644）出版了活字版书，宽永年间（1624～1644）出版了木板书。本文根据《国书总目录》，列举《古文真宝前集》、《后集》的注释本和校订本（☆只有存目②）。

《古文真宝抄》10卷，林罗山著。☆

《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20卷，林罗山解 鹅饲石斋（信之）补，寛文四年（1663）刊。

《古文真宝七卷抄》7卷，松永尺五。☆

《鳌头评注古文前集》10卷，宇都宫由的著

《古文真宝家传受集》3卷，亮典著，延宝二年（1674）刊。

《古文真宝后集合解评林》10卷，毛利贞斋（虚百）著，延宝七年（1679）刊。

《古文真宝后集备考》4卷，毛利贞斋著。☆

《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17卷，越原篁洲著，天和三年（1683）刊。

《古文真宝后集旧解拾遗》3卷，长泽粹庵编，贞亨三年（1686）刊。

《古文真宝讲述后集》10卷，梅康著，元禄五年（1692）刊。

《古文真宝后集俚谚抄》20卷，毛利贞斋著，元禄十七年（1704）刊。

《古文真宝注本误字》，时见中著，享保九年（1724）识语。

《古文真宝后集国字解》20卷，穗积以贯（能改斋）著。

《古文前集余师》4卷，森伯容著，冈本东皋校，天保七年（1836）刊。

《古文真宝后集悉注》6卷，富田畦臣注，富田久臣校。

《古文真宝颠末考》，冈本保孝（况斋）著。

《古文真宝不审》，东樵问，明人答。

安政年间（1854～1860）铃木益堂校订《古文真宝》前集3卷、后集2卷，以后这个体裁的《古文真宝》最流行。在这些注释中，评价最高的是越原篁洲著的《古文真宝前集谚解大成》和林罗山解、鹅饲石斋（信之）补的《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都已收入早稻田大学的《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里。下面介绍一下《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

林罗山解、鹅饲石斋（信之）补的《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20卷，寛文十三年（167

3）刊行。林罗山是江户时代初期的程朱学学者。名、忠。信胜，字子信，幼名菊松磨，通称又三郎、

道春，号罗山。又号浮山、罗浮、罗洞、四维山长、胡蝶洞、瓢巷、梅村、夕颜巷、尊经堂、麝眠、云母溪。祖先是加贺人，罗山的父亲领着一家人搬到京都。他小时候，家母去世了，伯父理斋抚养他。罗山秉性聪明，13岁开始注释日本古典籍，背诵演史稗说，读中国书。14岁去建仁寺大统庵随慈稽学习。他后来精细地研究经籍，驰骋百家，终于开创了洛闽之学。他收集门弟讲四书新注。这是民间讲书的创始。后来他拜访在洛北的理学学者藤原惺窝，成为高足。庆长十一年（1606）德川家康召他为“博士”，为顾问。后来他落发，号道春，被封为民部卿法印。德川家康开创了德川幕府时，罗山创始朝仪，制定律令，起草幕府的文书法度。被赐予上野忍冈之地，建立孔子庙（后为汤岛圣堂）。明历三年（1657）75岁时去世，谥号文敏。被赠正四位。著作很多，有《四书集注抄》38卷（刊）、《四书序考》1卷（刊）、《四书要语抄》1卷、《论语解》4卷、《论语摘语》1卷、《大学解》2卷、《大学抄》1卷、《大学要略抄》1卷、《大学要旨》1卷、《中庸解》3卷、《孟子养气知言解》1卷、《周易手记》6卷、《周易题说》（一名《周易抄》）6卷（刊）、《孝经见闻抄》3卷（刊）、《古文孝经抄》1卷、《春秋劈头论说》4卷、《小学私考》1卷、《老子经抄》3卷（刊）、《五经要语抄》1卷、《老子经首书》2卷、《吴子抄》6卷、《吴子谚解》1卷、《孙吴摘语》1卷、《孙子谚解》1卷、《尉缭子抄》9卷、《司马法抄》5卷、《二礼谚解》2卷、《古文真宝抄》10卷，（未完）、《三略谚解》1卷（刊）、《阳明攒眉》5卷、《经籍倭字考》1卷、《经典题说》1卷（刊）、《经典问答》1卷、《儒佛问答》1卷（刊）、《儒仙》1卷（刊）、《儒门思问录》4卷（刊）。还有关于日本神道、日本历史、朝鲜、中国诗文、和歌、本草等的各种著述。

鹅饲石斋也是程朱学的学者。名信之，初名方正，字子直、石斋，号心耕子。江户人。他多年研究五经，后来以历史学闻名。他仕宦于尼崎藩（今兵库县）。仕宦后在京师讲书，在诸书上做校点，颇有名声。寛文四年（1664）50岁去世了。谥号贞节。他的著作很多。有《四书存疑考异》1卷（刊）、《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20卷、《本朝编年小史》7卷（刊）、《运气论句解》5卷、《和汗珍书考》3卷、《柴田战记》2卷、《自省录》2卷。还断句刊行《诗林广记后集》10卷、《朱子语类大全》、《朱

子学的》1卷、《淮南鸿烈解》21卷等书。

在《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第12卷《著者小传》里云：“林罗山取舍五山僧青松万里等诸说，著《古文后集谚解》。其说虽然恰当，但有时候只说义理，省略事证。因此鵠飼补充修改其遗漏，写《古文真宝后集谚解大成》。”《谚解大成》把诗的本文和原注都翻译成日文。翻译成日文的时候，《谚解大成》大大地利用笑云清三《古文真宝后集抄》。笑云抄本，湖月信镜的注释用平易的日文解释原诗的意思。《谚解大成》参考湖月的讲解和其他人的词句解释来做翻译。有时候鵠飼比较五山各僧和林罗山的注释来进行考察。他还加上自己的看法、词句解释，写成很详细的《古文真宝后集》的注释。

唐宋八大家

据清水茂氏的《唐宋八大家》（《中国古典选》38，朝日新闻社）解说，五山僧中岩圆月（1300～1375）受到中国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正子》中，以韩、柳、欧、苏氏兄弟称为传古道之人。到了江户时代昌平坂学问所收集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集》中的欧、苏三父子、曾等五人之文刊行官版（《昌平丛书》所收）。但在江户时代最流行的是清人沈德潜选的《唐宋八大家读本》30卷。寛政年间（1789～1801）传到日本，文化十一年（1814）在昌平坂学问所翻刻该书，出本（官版）之后，在藩校和私塾做为教科书被广泛地使用。安政二年（1855）出版了在此书官版上加上赖山阳的评论本。文政八年（1825）村瀬海辅著《续唐宋八家文读本》18卷。在《国书总目录》中的《唐宋八大家》注释本、校定本如下（☆只有存目）：

《唐宋八大家文楷》3卷，石川安贞编，寛政十三年（1791）刊。

《唐宋八大家文法》4卷，斋藤鑑江。☆

《唐宋八家文翼》24卷，柴野碧海。☆

《唐宋八大家读本文格》5卷，川西潜（涵州）编，天保十年（1839）刊。

《唐宋八大家读本文格纂评》，天保十年（1839）序，川西潜选、片山勤纂评。

《唐宋八大家文读本考异》2卷，野本耕（万春），天保十三年（1842）刊。

《唐宋八大家集注释论》，石野樵水著。☆

关于赖山阳的评论在下面一起论述。在此介绍一下《唐宋八大家读本文格》。这是川潜按照“文格”新编八大家之文的著作。其《自序》云：

又私自谓古之人养之于衍义，磨之于事业而奋发于文章，言出为文，文成而格立，未始就格求文也。虽然格之既立，后之人未必袭之，而不能出其范围。则讲而明之则而仿之。溯源探本，而极其奥。人孰谓之不可也？……顷者抄其显格者，欲锓之梓。而原选次序间见错出，不便翻阅。及类而编之，得格七十，文百四十七篇，名曰文格。将以与世之同余患者共焉。若夫大雅君子，德立言随者，何取于此。刻成，是为序。

文章轨范

对江户时代的日本儒者来说，用中文做文章、作诗是必要的知识。当时以《文章轨范》作为写作文章的教科书。首先介绍一下在《国书总目录》中的《文章轨范》注释本、校订本（☆只有存目）：

《文章轨范余录》，贝原益轩著，延宝五年（1677）。☆

《文章轨范国字解》63卷，穗积以贯（能改斋）著。

《文章轨范评林》，伊藤龟年著，寛政三年（1791）。

《文章轨范揭》3卷，堤它山著。☆

《文章轨范口授》，海保渔村著。☆

《文章轨范讲义》1册，海保渔村著。

《文章轨范补注》7卷，海保渔村著。

《文章轨范纂评》7卷，安藤秉著，安政五年（1858）刊。

《文章轨范标记》14卷，茅原虚斋著。☆

《文章轨范揭历》2卷，田中履堂著。☆

《文章轨范讲义》7卷，田中履堂著。

注释：

①《续抄物资料集成》第5卷，大冢光信编，大坂，清文堂出版，1980年8月。

②据《近世汉学者著述目录大成》，下同。

（未完待续）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十）

——王安石的新法

雷金贵

三七 为什么是如此结局

解读政治的苏东坡，极有必要对王安石的变法，有概貌的认识，因为毕竟，他们的政治冲突，首先导致了苏东坡在政治上的失势，而至于仕途坎坷。

宋朝承五代残唐的纷争杀戮而立国，至于神宗时候，已逾百年，但是，拥有四大发明的宋朝，却一直没有能够强盛起来，还不断的受到辽、西夏的侵扰，而挺不起脊梁，而不得不拿出大笔的银子来买边界安宁。在这种背景下，一大批志士，像范仲淹、像苏东坡、像王安石等等，都力图荡涤刷新，挽救国家颓势。

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却没有得到年迈的仁宗皇帝的坚决支持，结果只是昙花一现。

苏东坡怀才不遇，一整套的治国方略，既因为阴差阳错，也因为不能吹糠见米，而付诸了东流。

激进的王安石，遇到了激进的神宗皇帝，虽然情景是如神宗皇帝向王安石发的问——为什么会闹得人仰马翻？为什么所有的大臣、御史，甚至于全朝的读书人，都群起反对新法？——但是，王安石的一揽子新法，急风暴雨一般，席卷了原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北宋。

王安石的变法内容，我以为主体是三类，关于三农的，关于工商业的，关于国家财政税收的，核心是国家财税——取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

王安石的三农变革，最著名的就是“青苗法”。他的实质和造成的祸害，我在前面的文字里已经说过了，我现在想说的是，这项原本动机很好，甚至可以说是为农民利益而设置的，很有些像现在的针对农业的专项贷款，甚至有专业银行的影子。

一个很好的设想，不但没有办成好事，反而却成了扰民之举，而且骚扰得很凶，弄得很多农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为什么会是如此结局？

后面我要用专门的文字来说，现在只说结论性的东西，一是利息实在高得离谱，就是现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也达不到那样奇高的水平。二是强迫，并且与官员的政绩、升迁挂钩。王安石认为干得好的，无不强行把任务分配到一家一户，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三是更加强势了豪强。

在农业社会里，王安石的一揽子变法举措，免役法也好，保甲法也好，保马法也好，方田均税法也好，几乎都涉及到了三农，而每一项，都是要农民掏腰包的。

如此一来，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几乎不能透气，加速了大批农民破产。农民，作为农业、农村的基础组成，他们的破产，导致农业、农村的相继破产，结果是必然的。

农民破产了，小手工业者——那个时候，没有工业，以及小商人——那个时候，没有大商业，同样破产了。均输法、市易法等，以及朝廷垄断盐、铁、茶的生产经营，实质上是朝廷把所有的市场经营，全部高度垄断起来，王安石的理论很清楚，富商和地主，他们能以自由企业的方式，获取利润，现在由朝廷来经营，利润就是朝廷的了。

按王安石的设想，凡是能够赚钱的，现在都由政府垄断了，理论上朝廷获利应该十分丰厚，而实际上在几年后，农民的破产，工商业的破产，朝廷的税收，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惊人的锐减了。税

收是正渠道的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断流入朝廷腰包的，是一个又一个新法开辟的钱路。

如此这般，皇帝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而是与老百姓争利的贩夫走卒。

这一切，要归咎于王安石空想的财政思想。

北宋朝廷，到仁宗末年，衰象已呈加速之势。连年的汗涝蝗虫灾害，不仅严重影响了百姓的生产生活，而且国家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来看三组数据，就很能说明问题。

——太宗至道末年，即公元997年，建国仅仅十七年的北宋，财政收入2224.58万银两，支出后有赢余。

——真宗天禧年，即公元1017年，北宋建国五十七年，收入：1.585亿银两，支出：1.267752亿银两，收支有三千多万的赢余。

——仁宗皇佑元年，即公元1049年，入1.0625亿银两，而所出无余。

——英宗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也是神宗即位的前两年，财政收入为：1.1613亿，支出为：1.234亿，而且还有没有列，如计划盘子的非常设支出1152万。其收不抵支的窟窿已经很大了。

这样年甚一年的庞大开支，大部分用于养活庞大的军队，以及庞大的官吏队伍，而皇家的非常开支，比如每三年一次的郊祀，皇帝用来赏赐官员的赏钱，一般是五百多万，只要皇帝高兴，多到七、八百万，甚至上千万，皇帝是眼皮都不眨一下的。

国库空虚，王安石要让国库充盈，出发点相当美好。富裕国家财政，是做臣子者的必然职责，所以对王安石的动机，我们无须指责。

长此以往的收不抵支，实质是经济的不发展。正如苏东坡正告皇帝——山川之利取尽了，所以财不藏于民，而百姓日益贫困；国库又年年的亏损，所以财也不藏于国，而国家因此日益的贫困。

民贫国贫，各种社会矛盾的爆发，那是盖不住的。

改革思潮在北宋中叶风起云涌，是自然而然的。

虽然我们不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们以一个一般人的想法，都能够得出一个结论，富裕国家财政，一是扩大物质生产与消费，二是再分配财富。而在北宋的中国，工业是为零的，农业也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王安石想要急速地充盈国

库，并不在生产方面着力，而是在分配上“钱平”。我们仔细研读他的一揽子新法，无不是为了多多的收钱，达到其“尽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王安石充裕国库的目的，可谓成效显著。到了哲宗时，有大臣给重掌朝纲的司马光报告说，收归在州县的各种款项，以数十百巨万计，如果全部交给财政部使用，二十年都使不完。

而且不止一个大臣这么说。

所以事实应当不是掺了水的，不虚。

但是，从民间归来的苏东坡，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

苏东坡说，仅所谓宽剩钱一项，只十六、七年时间，全国就积累了三千多贯石。而这个收钱的名目，仅仅是免役钱和助役钱之外，按每户总数的两成的额外征收。

“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这是遭遇了乌台诗案后，苏东坡重回朝廷，与司马光讨论时政要务时所说，苏东坡是不敢说假话的。

哲宗皇帝上台三年后，苏东坡再次被围剿，被逼出朝廷，出知杭州。二十年后再莅杭，天堂之地，竟然“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斜，商贾不行，市井萧然”；不仅如此，而且，“浙中州县市井人烟，比二十年前不及四五。”

神宗死了七、八年了，民间居然还欠着他无数的银子，名目繁多的欠帐，折射的是新法对民间的榨取，简直就是敲骨吸髓一般；新法的敛财，朝廷是有银子花了，皇家可以大把大把的竟豪奢了，皇帝也一车一车的把银子拿去买边境的一时之安宁了。

而北宋的釜底之薪，已经被抽尽了。

我很赞同后来人的一种说法，那是入木三分的精彩——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北宋的人民。

(未完待续)

(眉山电视台副台长)

会长一行应邀访问诸城

本刊讯（超然台）5月18日至5月19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张志烈教授，名誉会长邱俊鹏、曾枣庄教授一行，应诸城市原人大常委会主任、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李增坡的邀请，莅临诸城市参观访问。

5月18日，张志烈会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复建之后的超然台（苏轼纪念馆），并在超然台会议室，举行了小型座谈会。张会长认为超然台是苏东坡生活中最关键的地方之一，超然台是理解苏轼文化的重要场所。各位专家教授一致认为，复建后的超然台，坚持了“归其旧制，修旧如旧”的原则，基本还原了苏轼当年超然台的本来面貌，对超然台的成功复建给予了高度评价。张志烈、曾枣庄教授还亲笔为超然台题词。期间张志烈会长还为诸城市“东坡学校”——东鲁学校，题词留念，并与学校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各位专家学者对诸城市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对苏轼文化研究从当代文化中突起倍感欣慰，对超然台的进一步完善，以及诸城市苏轼文化建设也提出了宝贵

意见。下午张会长一行到常山，参观了雩泉。

5月19日一早，张会长一行首先到苏轼为之写下《卢山五咏》的卢山脚下进行仰苏活动，眺望饮酒台、圣灯岩。上午9时，在潍坊工商职业学院进行“苏轼在密州”学术报告。诸城市各界专家学者和潍坊工商职业学院的大学生们一千余人聆听了曾枣庄教授的《苏轼知密州十题》学术报告。报告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反响，纷纷表示今后要加强苏轼研究，叫响诸城苏轼品牌。报告后柳金东院长陪同张会长一行参观了校史馆，张会长为潍坊工商职业学院题词留念，并接受了诸城电视台的采访。

在此期间，诸城市委书记陈汝孝、市长张洪全、宣传部长陈盛、副市长许传平还分别与三位教授进行了深入交谈。张会长说诸城人文荟萃、历史悠久，近几年文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陈书记和张市长提出有机会诸城将再次举办全国苏轼学术研讨会，为中国苏轼文化研究做出贡献。

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 学术会议在广东湛江举行

本刊讯（流水）4月2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和广东海洋大学共同主办的“流寓文化与雷州半岛流寓文人研究学术会议”在湛江海滨宾馆举行，来自上海、四川、广东、香港和台湾等地区的60多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

在会议开幕式上，湛江市政协主席邓碧泉、广东海洋大学校长何真、广东省社科联专职副主席林有能分别致辞。会议由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学松教授主持。

会议吸引了中国社科院的蒋寅教授、复旦大

学的陈尚君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曹旭教授、华东师大的胡晓明教授、暨南大学的蒋述卓教授以及台湾中央大学、台湾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的多位知名学者。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委派刘清泉副秘书长参加会议。

会议提交论文三十多篇。与会专家学者们还围绕流寓文化和流寓文人做了分组讨论。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老师和湛江市专家学者在会议上主要围绕雷州半岛的流寓文人和雷州文化做了会议发言。特别是对苏轼雷州行迹的研究，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